

理论与实践

LILUN YU SHIJIAN

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月刊
ZHEXUE SHEHUIKEXUE ZONGHEXING YUEKAN



6
1958



目录

毛澤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对 馬克思主义辯証法的重大发展	张江明 (1)
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伟大的实践意义和理論意义	唯 思 (5)
論发展地方工业	杨 繁 (12)
論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自由 (下)	黄 辛 (18)
党的知識分子政策的伟大胜利	黄煥秋 (23)
資产階級个人主义必須抛弃	王燕士 (28)
紅与專的辯証关系	东方明 (33)
我扭轉了“只專不紅”的錯誤思想	陈汝懋 (39)
論本質屬性	圓 足 (42)
关于陈白沙的哲学思想問題	夏 振 (45)
1647年广东人民的抗清斗争	彭伊洛 (49)
1924年的广州沙面罢工	金应熙 (56)
李始美的道路	高天放 (59)
“自尊”？ 还是“自卑”呢？	一 戈 (61)
編者的話	(41)

动态

“上游”理論杂志將于“八一”創刊
广东省积极开展科学活动
陶鑄同志到华南师范学院講課
中大山学学报改进編輯工作

毛澤东同志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对 馬克思主义辯証法的重大发展

張江明

毛澤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是一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著作，是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总结实际經驗而又指导革命实践的典范。在这部著作里，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問題作了创造性的发展，特别是关于两类社会矛盾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学說，是馬克思主义辯証法在当代的重大发展。我现在就这个問題，发表一点不成熟的意見，抛砖引玉，希望大家共同研究。

一 关于两类不同性質的矛盾的原理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經典作家一开始从事革命运动，就明确地提出分清敌我，要用革命的办法来解决敌我矛盾。在实践中也論述到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指出工人和农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他們之間还有差别，因而也存在矛盾。共产党在劳动人民中間进行工作时必須采取民主的說服教育的方法。由于当时对敌斗争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人民内部矛盾还不突出，所以对人民内部矛盾問題来不及加以总结。毛澤东同志根据新的历史条件，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总结了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运动的經驗，把紛繁复杂的社会矛盾，从最高的哲学原則上概括为两类不同性質的矛盾，全面地闡明了这两类矛盾的性質及其根本区别；科学地說明人民和敌人的不同概念和定义；指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同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关系；揭示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表现；論述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斗争（包括两条道路斗争）的关系；指明混淆两类矛盾的可能性和严格区别两类矛盾的原則性；分析划分两类矛盾的界綫和标准；闡述人民内部矛盾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內容及其特点；說明正确認識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性。这是应用馬克思主义辯証法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地分析实际問題，找出它的发展規律，作出了指导革命实践的理論性的創造。

有的人不承認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人民内部矛盾，或者認為只是在社会主义建設初期才有人民内部矛盾，到了剝削阶级消灭以后，就沒有人民内部矛盾了。人民内部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誰也抹煞不了。不正視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民内部矛盾，就会造成自己在社会矛盾面前縮手縮脚，陷于被动，不能很好的解决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長期存在的，不是暫时的現象。从時間上說，它比敌我矛盾出現得更早，历史更長。敌我矛盾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也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随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消灭，它就失去了阶级基础，不再是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現象。而人民内部矛盾，即使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可以說，只要有人和人之間的关系存在，就有人民内部矛盾存在。正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揭露和不断地得到解决，推动着我們的社会向前发展。帝国主义分子一听见社会主义国家有人民内部矛盾后，就“幸灾乐祸”，异想天开，以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巩固，会发生分裂。其实恰恰相反，这是我們国家强大和巩固的表现。我們承認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并用正确的方法来解决，这就使我們的国家更团结，人民的思想 and 行动更一致。帝国主义想利用人民内部矛盾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是必然失败的。

毛澤东同志关于两类不同性質的矛盾的学說，对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运动和制定党的綱領、政策，有极大的实践意义。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必須明确的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根据矛盾的性質，提出政策。这是取得革命胜利的最根本的条件。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中，无论任何时候，把这两种性質不同的社会矛盾混淆起来，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的錯誤。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澤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分清敌、我、友，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中国革命全部实践經驗証明：这个論据是完全正确的。

我国这次整风运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同时并存。如果把它们混淆的话，就会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害。由于整风运动是在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指导下进行，始终严格地区别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用不同质的方法，解决不同质的矛盾。因而经过这个运动，使我们既解决了敌我矛盾，打退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又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全国日益形成了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出现了全国性生产高潮和社会主义大跃进的形势。这是正确地处理两类不同矛盾的丰盛之果。

修正主义所以比教条主义更危险，在于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属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而反对教条主义则属于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正确方法和错误方法的斗争。修正主义是披着羊皮的狼，他们也在那里反对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反对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现代修正主义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企图解除工人阶级的革命武装，以便保存或恢复资本主义。很明显，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正是反映了帝国主义世界同社会主义世界的尖锐的斗争。

教条主义也是错误的，必须反对。但是我们和教条主义者的争论，并不是要不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而是用什么方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一般而论，教条主义者还是想为革命做事的，只是方法不对头，走上错误的道路。当然，方法上的错误，也会引导到方针、路线上的错误，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严重的恶果。但是两种方法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性质上是不同的（虽然也有联系），不能混淆。由此可见，要分清那一种思潮对马克思主义更危险，必须从实际出发，运用两类矛盾的学说对它们作深入的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二 关于矛盾转化的原理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不是凝固不动的。对立面的双方可以依据一定的条件而转化。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以及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转化，已作了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的问题”中，运用这个思想来分析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辩证原理。毛泽东同志深刻地阐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转化，指出如果对人民内部的矛盾处理不当，或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就可以转化成为敌我矛盾，而在敌我之间，如果处理得当，或矛盾双方找到了新的利害一致的共同基础，也可以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说明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除了有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这两个阶级的矛盾，既可以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也可以转化为敌我矛盾；指明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好事也可以变成坏事，毒草可以变成肥料，右派可以当反面教员，同错误思想斗争可以增强免疫力；说明矛盾的转化必须有一定的条件以及主观能动性和矛盾转化的关系；指出要促进矛盾的转化向着进步的方向发展，必须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依靠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实行正确的政策。

有的人认为不是一切矛盾都能转化，只是某一部分矛盾能够互相转化；他们认为象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和死等现象，它们之间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不可能互相转化。实际生活表明，一切矛盾都是互相转化的。因为每一种矛盾的两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并且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相反的方面转化。当然各个不同性质的矛盾转化是各有特点的，但这些特点并不是否定矛盾转化的存在，只是表明矛盾转化的具体性和特殊性吧了。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说，在苏联，过去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经过社会主义革命转化为统治阶级，过去是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转化为被统治阶级。在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过去在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统治下过活，经过人民民主革命转化为国家的主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转化成为专政的对象。至于生和死，也是互相联系互相转化的。不但生转化为死，死也可以转化为生。例如一切有机物（包括生命）都是由无机物转化而来。上一代之死转化为下一代之生，下一代之死又转化为再下一代之生，这样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连续无穷。那些认为矛盾的转化不是普遍现象，只是部分现象，认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能互相转化，完全是错误的。

毛泽东同志关于矛盾转化的学说，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作用，正如他在“矛盾论”中论述关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研究一样，应该“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

定其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針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员都应当注意的。”

既然两类不同性質的矛盾可以互相轉化，我們在对敌斗争时，既要严格划清敌我界限，不能模糊；又要講究策略，善于利用敌人內部的矛盾，尽力分化敌人，与敌人营壘中可以和我們合作的部分建立联盟，最大限度地孤立当前的主要敌人，爭取敌我矛盾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轉化。这是革命斗争中的一项重要政策。大家知道，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它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但由于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接受党的团结、批評、教育的政策，因而使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轉化为人民內部矛盾。我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和平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就是依据这种实际情况来决定的。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說明党的这个政策的正确。同样，既然人民內部矛盾也可以轉化为敌我矛盾，我們就應該經常注意调节人民內部的关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加强对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不能麻木大意，失去警觉。而当着有坏事出现时，必須力争上游，有大无畏的精神，敢于克服一切困难，迅速地摆脱被动的局面，积极地利用坏事来作为改善工作和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使坏事变成好事。这也是根据辯証法原理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政策。

三 关于用不同方法解决不同性質的矛盾的原理

根据矛盾的性質来确定解决矛盾的方法，这是毛澤东同志在“矛盾論”中规定的基本思想之一。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思想，并且运用它来具体处理人民內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問題，創造了运用唯物辯証法来解决政治生活和实际斗争中不同性質的矛盾的光輝范例。

毛澤东同志系統地闡明在人民民主專政下解决敌我矛盾用專政的方法，解决人民內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指出專政的作用、目的和專政的行使；說明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及其相互关系；指出帶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和用說服方法去解决人民內部矛盾的相輔相成；揭示整风和解决人民內部矛盾的关系；特别是极其精辟地闡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公式：团结——批評——团结。这是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毛澤东同志指出，从团结的愿

望出发，經過批評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同“左”傾教条主义者从前所采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是根本对立的。这个公式是总结長期的革命实际經驗而得来，既适用于解决共产党內部这一部分同志与那一部分同志之間的矛盾，也适用于解决这一部分人民同那一部分人民之間、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間的矛盾。这是一个普遍真理。

毛澤东同志关于不同性質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的学說，給我們指出了解决矛盾的鑰匙，使我們懂得要用一把鑰匙开一把鎖的方法来解决各种不同性質的矛盾，打破教条主义和經驗主义的束縛，克服机械論的形而上学的方法。

我国的人民民主專政，即无产阶级專政，从哲学上来說，就是矛盾规律在政权工作中的应用，它是把对敌人的專政和对人民的民主这样两个对立方面統一起来，担負解决敌我矛盾和解决人民內部矛盾的任务。无产阶级專政的学說，是建立在辯証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完全符合于客观辯証法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把资本主义国家看成是“超阶级”的国家，把社会主义国家則看成为官僚主义的国家，并且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今天就消亡，取消无产阶级專政，混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界限，抹煞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質区别，这些“理論”，不是别的，而是否認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用詭辯代替辯証法，从政治上麻痹工人阶级，为保存搖搖欲墜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效劳。

四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原理

“馬克思主义的哲学認為，对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毛澤东）。由于一切事物普遍地自始至終存在着又統一又斗争的矛盾运动，因而推动事物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本質不一样。

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在这个社会里有什么基本矛盾，很長時間以来，人們的認識是不明确的，或者說还未真正从辯証法的观点找到这个动力。

有的人片面地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統一，否認社会主义社会有人民內部矛盾的存在，認為政治上思想上精神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很明显，这种否認人民內部矛盾的論点是不符合实际的。当然，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思想、精神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是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可能有的。

然而，并不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政治上思想上精神上的一致，就可以否認矛盾的又統一又斗争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这一规律。事实証明，正由于不断地处理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民内部矛盾，才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团结统一日益加强，使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

还有的人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片面地把斗争看作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他們把統一性从矛盾中排除出去，孤立的講斗争。这种观点也是錯誤的。誰也不能否認斗争的绝对性，因为即使在矛盾的統一时也存在斗争。矛盾的斗争固然推动事物的前进；而矛盾的統一也能促使事物的发展。否認統一性在矛盾中的作用，就会造成机械的过火斗争，把矛盾扩大化，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

毛澤东同志既反对只要統一否認斗争的片面性，又反对只要斗争否認統一的片面性。他紧紧地掌握矛盾的統一和斗争这个规律，深入地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找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毛澤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中科学地闡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矛盾，說明这些矛盾的揭露和解决，推动社会的发展；論述这些矛盾的基本內容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的根本区别；分析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如何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指明不断地正确处理 and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我国的全民整风运动，在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深入进行整改，开展“双反”运动，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动群众改革规章制度，克服官僚主义等等有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措施，使全国人民的思想得到解放，出现了新的精神面貌，发挥了冲天的干劲，形成了波澜壮阔、空前热烈的社会主义大跃进，无论在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和文教工作等方面，都一日千里、生气勃勃地飞速前进，各种发明创造象潮水一样四面八方涌现出来，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毛澤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学說的真理性的証明。

毛澤东同志关于两类矛盾的学說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說，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回到客观实际得到証明的理論。他总结了我国長期的革命經驗，特别是总结了我国从1927年在南方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来这三十年的經驗，以及总结了世界工人运动的經驗而成的。这是我們时代的智慧之花，是对人类解放事业的重大贡献，是照亮我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指路明灯。

有的人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看作是一般时事政策文件，不把毛澤东同志的著作看作是經典著作；他們認為学习毛澤东同志的著作会影响他們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經典。这里表明：他們的思想被教条主义束縛得多么紧！在他們看来，似乎政策是无足輕重的，只有古典理論才值得重視。当然，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經典著作是需要很好学习的，但不能把經典著作的学习同学习党的政策和毛澤东同志的著作相对立；应该把这两者密切地結合起来。他們不懂得政策就是理論的具体化，就是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和实际工作相結合，用以指导工作的原則。列宁說：“无产階級專政是无产階級对政策的領導。无产階級这領導階級，即統治階級，应当善于这样来规划政策，首先解决最刻不容緩最‘迫在眉睫’的任务。”^①那一項工作违背了政策，就要犯原則性的錯誤，就是离开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从政策的实質來說，它既是指导工作的原則，又是活的理論，即行动中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澤东同志的著作所以具有高度的思想性、科学性、創造性，就在于它既是理論，又是政策，它是这样完美地把两方面溶合起来，成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結合的經典著作。

我們决不可以片面地从数量上来估量“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科学价值。它的字数虽少，但句句是珠玉，意味深長，引人入胜，集中了人民群众的智慧 and 經驗，閃射着万丈光芒，令人越讀越感到有一股无穷的力量，促使人們的思想解放，推动社会的前进。

毛澤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发表了一周年，已經給我国带来了丰硕的政治果实和经济果实。我們可以預料，随着毛澤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說的深入人心，为广大群众所掌握，一定发挥更大的作用，取得更丰硕的成果，因此，我們一定要加强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科学的研究，認真学习毛澤东同志的著作，广泛进行通俗性的宣传，用毛澤东同志的科学思想，即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結合的思想武装干部和武装群众，为贯彻社会主义建設的总路綫而斗争。

^①“列宁斯大林論社会主义經濟建設”，第354—355頁，1950年解放社編。

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偉大的 实践意义和理論意义

唯 思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會議，确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这就是：“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这是我們党创造性地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地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經驗的結果。它正确地反映了我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和迫切要求，反映了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冲天的革命干劲，同时也体现了我們党对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和伟大的共产主义的革命气概。这条总路綫就象是光芒万丈的灯塔，它将照耀着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上不断跃进，高速度地把我国建設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从过渡时期总路綫 到社会主义建設的总路綫

大家知道，早在一九五三年，即当我国完成国民經济恢复时期，开始进入大规模有计划的經济建設时期，党中央和毛主席曾适时地提出了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綫，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內，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綫现在还在繼續执行，因为资产阶级还繼續存在，资本家还在拿定息，国家资本主义性質的公私合营經济必須进一步改造为全民所有制的完全社会主义經济；极少数的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还需要帮助他們合作化，已組織起来的合作社也要全部发展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設成功之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

爭，始終还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是基本的方面；但是，另一方面，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九五六年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已經取得决定性胜利，去年以来，經過全民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我們又取得了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所有制問題基本解决以后，就使我們能够更好地集中力量，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以更大的规模和更高的速度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設。党在这个时候提出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就是适应新的社会生产力从旧的生产关系中彻底解放出来后飞跃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是适应六亿人民迫切地要求彻底改变“一穷二白”的状况，加速建設自己的幸福生活的愿望。这就是說，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是从实际出发，从群众中来的，是一条完全正确的路綫。誰如果离开了和违背了这条总路綫，誰就是离开了群众，违背了客观真理，誰就要犯錯誤。

过渡时期总路綫和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又各有不同的重点。首先，过渡时期总路綫和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有着一个共同的目的，这就是把我国建設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們的不同的重点是：过渡时期总路綫着重解决的是生产关系的改造，即所有制的变革問題；而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着重解决的，則是生产关系改变以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問題。自然，由过渡时期总路綫到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并不是絕緣的、相截断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是过渡时期总路綫的发展，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綫的灯塔照耀下，我国六亿人民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斗争經驗的总结，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設道路和蓝图的更明确的描繪。党中央和毛主席及时地提出

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将鼓舞人民群众始终保持昂扬的革命斗志和饱满的革命热情，明确自己前进的方向，使革命事业不失时机地从一个胜利前进到另一个新的更大的胜利。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订 及其基本内容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突然的。它是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体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实质，就是如何更快更好地在我国建设成功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存在着两条路线、两种方法的斗争，一种是进行得快些和好些，一种是进行得慢些和差些。由于我们在国外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在国内，基本情况是“一穷、二白”，六亿翻身人民都迫切希望早日建成社会主义，以便迅速摆脱落后和穷困。因此，不论从国际环境和国内情况出发，我们都应该采取又快又好的方法和路线，抛弃又慢又差的方法和路线。毛主席就是一贯主张前一种路线而反对后一种路线的。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著作，批判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象小脚女人走路”的右倾观点，促进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并由此而带动了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在很短的时间内又快又好地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中国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接着，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又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解决以后，突出的问题是如何扩大和提高工农生产的规模和速度的问题，是如何使商业和其他经济部门、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和经济事业的发展相配合的问题，应该批判在这些问题上的右倾保守思想；要做“促进派”，不要做“促退派”。同时并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由于执行“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方针的结果，使一九五六年整个经济文化事业来一个巨大的跃进。工业生产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一，基本建设工作量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二，农业生产虽然遇到严重的灾荒，却仍然增产了百分之四点九。但是，一些右倾保守主义者却认为一九五六年的跃进是“冒进”了，平地刮起

一股“反冒进”的风，多快好省的方针受到一些人的怀疑，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受到一些人的怀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损害，因此一九五七年这一年工农业生产虽仍有一定的发展，例如，工业生产比一九五六年增长了百分之六点九，农副业总产值比一九五六年增长百分之三点五；但是，一九五七年各方面的条件比一九五六年都要好，特别是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极有利于新的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如果不是右倾保守思想作怪，如果坚定地执行“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肯定能够实现更大的跃进。

就广东省、广州市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情况来看，问题也正是这样。广东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共增产粮食五十五亿斤，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九，其中有三十亿斤是在合作化前三年基本上依靠土改中和土改后小农经济的积极性增产的。而在合作化那一年即一九五六年，虽然一手办社一手生产，年成也不好，但是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却增产粮食二十亿斤。一九五七年由于“反冒进”和闹地方主义的结果，虽然年成不坏，却只增产了五亿斤。去冬以来，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坚决贯彻多快好省方针，今年春收作物就增产了二十亿斤，今年全年增产六十亿斤是完全有把握的，还可能大大超过。^①又如广州市一九五六年全市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五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六点六，这是跃进的速度。而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吹起的“反冒进”的歪风，使一九五七年客观条件虽然比一九五六年好，工业总产值却比一九五六年只增长了百分之一十六点二，今年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坚决贯彻多快好省方针，工业总产值跃进百分之四十的指标看来完全有把握实现。^②这种情况和全国一样，出现了“马鞍形”的发展。

党中央和毛主席及时地纠正了“反冒进”的错误，开展了反“反冒进”的斗争，在去年下半年，重新强调了坚持多快好省的方针，同时重新公布了经过修正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又提出了在十五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振奋人心的号召，加上全民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后出现的生动活泼、朝气蓬勃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卓

① 赵紫阳：“粮食生产速度可以加快”，人民日报 1958年5月30日。

② 朱光：“思想大解放、生产大跃进”，——在广州市第三届一次人代会上的报告，1958年5月26日广州日报。

命干劲空前昂扬，到处出现学先进、比先进、赶先进的力争上游的革命空气，形成去冬今春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全面大跃进的形势。这样，党中央和毛主席及时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特别是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到一九五八年生产战线上出现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这一“马鞍形”发展的经验，充分地反映了当前工农群众冲天的革命干劲和力争上游的英雄气概，从而在“多快好省”的基础上，发展成完整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较详细地说明一下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一方面说明，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中取得胜利从而发展起来的；正确的方针路线总是在和错误的方针路线作斗争，并经过群众的实践和现实的考验而发展和完整起来的；也正因为这样，它就能够充分反映群众的意志和愿望，保证它的正确性，并对千百万群众起巨大的鼓舞和动员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力地说明了，要使我们不脱离群众，要使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由一个胜利到另一个新的更大的胜利，就一刻也不能离开党的路线、毛主席的路线。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刘少奇同志在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八大”二次会议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已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概括来说，可以归纳为：第一、在国内，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国外，要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以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为基础的无产阶级国际团结，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第二、必须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最后消灭资产阶级和剥削制度；同时要继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允许任何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第三、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以提高工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全国人民的文化水平。第四、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原则下，使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使工业和农业互相支持、互相推动、共同跃进。第五、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使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实行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以加快工业化的速度。通过这些，最后目的即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出发点，就是要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为了加强全国人民在“兴无灭资”的基础上的团结。这一要求，通过全民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正在逐步实现。各级干部的“三风”“五气”大大扫除，领导和群众的关系空前密切。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人民群众表现出空前的精神振奋，斗志昂扬。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发展过程中，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情况还会经常出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还是过渡时期国内的主要斗争，至于先进思想和落后思想的斗争，更就是一万年以后也还会有。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还是我们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长期任务。我们还必须继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就是把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改造为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最后完成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彻底消灭阶级剥削和剥削阶级；使合作社经济完全发展成为高级合作化组织，以彻底解放社会生产力。

在经济建设方面，必须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这一方针是及时地总结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特别是今年以来全面大跃进的经验的成果，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不仅农业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占很大比重，农民的人口更在五亿以上。一切建设事业，如果不从这种基本情况出发，就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也就不可能取得巩固的胜利。建设工业，必须依靠农业生产取得原料，更必须以广大农村为市场，因此，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的发展这个基础。自然，工业的发展，又将反过来推动农业的现代化和农业生产的更大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五年农业大丰收，就带来了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六年工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大跃进；而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六年农业歉收，就影响到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七年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今年工农业生产的全面大跃进形势，也是去冬开始的农业建设首先是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有力推动下出现的。因此必须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这是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的支柱），坚持工农业并举的方针。这样就能鼓舞

全国人民（其中五亿多是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热热闹闹地而不是冷冷清清地进行建设，就能使建设事业多快好省地发展。

在工业建设中，实行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也是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的。我国是有六亿人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大国，人口比整个欧洲大陆还要多，土地也几乎相等，由于“一穷、二白”，人民群众的革命性特别坚决，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特别高涨，蕴藏潜力更是无穷无尽。在进行工业建设时，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因素。例如钢铁生产，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钢的产量由九十万吨增加到五百二十四万吨，这已是很高的发展速度。但在提出中央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型工业同时并举后，我国今年一年内将建设上万座中小型高炉，产铁能力将超过二千万吨。①四川一省到今年年底就将建成总生产能力一百多万吨的小高炉五百多座。三座中等规模的钢铁厂和近十六座小型炼钢厂也将分别筹建②。我国自然资源无比丰厚，例如我国就是世界上水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总蕴藏量达到五万四千万瓩，光是长江水系各河流的水力资源，就比美国全国的水力资源还多。在中央提出大中小并举方针和以水电为主的电力工业发展方针以后，全国各地农村都根据多快好省精神，绝大部分由群众自筹资金，大搞农村电气化。据统计，去年全国农村发电能力只有二万多瓩，今年将超过九十万瓩。四川省最近两个月已动工和完工的小型水电站就有六百多个，安徽已建成的小型水电站有一百二十四座。③这些农村小型水电站的建设都本着就地取材、因陋就简、由简到繁的原则，好处是投资少、技术简单、易建设、收效快，既有利于鼓舞群众的干劲，又有利于多快好省地发展。由此可见，所有建设事业只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按照多快好省的方针，使中央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我国工业就一定会以高速度向前发展。自然，这同时必须加强集中领导、全面规划与分工协作，注意综合平衡，以保证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防止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党中央在这个时期提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口号，也是十分适时和英明的，这是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度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列宁早就说过，“社会主义需要有广大群众自觉地在资本主义已达到的成绩基础上前进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又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条件”。要战胜资

本主义，前进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就必须进行技术革命，使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转到最先进的技术基础上。关于技术革命的主要任务，在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中，已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概括地说来，就是要在工业中实行高度的机械化，农业和手工业也要逐步过渡到机器生产；要实现全国城市和农村的电器化；要把全国的大中小城市都建设成为工业生产城市，并在条件具备的地方建立新的工业基地，要使全国的县城和乡镇都建立自己的工业；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现代化的交通运输网和邮电网。这是一个极其宏伟的机械化、电气化和工业化的纲领。在进行技术革命的同时，必须进行文化革命，扫除全国文盲，使工农劳动人民早日在文化上大翻身，同时培养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大军和技术力量。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都必须走群众路线，把它变成一个伟大的群众运动。

有人还在怀疑，“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行得通吗？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和当前大跃进的形势，都有力地打了这些怀疑论者的耳光。事实上，多、快、好、省是彼此互为联系、互为条件、互相制约的整体。多、快是指数量和速度而言，好、省是指质量和成本而言。抛开数量而一味讲求质量，就将使建设事业停滞不前，质量也失去现实的意义；抛开质量而片面追求数量，其结果仍然是妨碍建设的速度，造成更大的浪费。从数量与质量的辩证关系的正确认识出发，全面贯彻多快好省的方针，就一定能够保证建设事业的高速度发展。

有人担心，苦战经年，不断跃进，人民群众会不会“太紧张”、“太疲劳”了？这表面上好象反映“群众利益”，事实上却是脱离群众的表现。我国的工农劳动群众长期过着受剥削受压迫的非人生活，今天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明白看到了自己的劳动正就是建立自己幸福的新生活和保卫革命胜利成果的可靠依据。因此，他们就产生出“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革命气概和英雄干劲；和“一年辛苦，十年幸福；十年辛苦，万年幸福”的信心，这是“一

① 见1958年6月7日北京新华社讯。

② 见1958年5月25日北京新华社讯。

③ 见1958年5月15日北京新华社消息。

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 偉大思想和理論意义

天等于二十年”的偉大革命时代的常规，如果不充分估計群众这种冲天干劲和无穷潜力，就要犯右傾保守的錯誤。自然，我們在工农业和其他各項工作全面大跃进中，必須注意生产的节奏和安全，以及必要的休整；还要通过技术革命和生产工具的改革、劳动組織的合理調整、生产管理的改善，来降低劳动强度，改善劳动条件。但从根本上說来，社会主义的劳动本身就是英雄豪迈的事业，劳动者的社会地位的根本改变，保證他們具备着无比的建設热情。

也有人說，高速度的发展，总会有个間歇。既然一九五六——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出現过高潮——低潮——更高潮的“馬鞍形”，往后也会再出現类似的“馬鞍形”吧？大跃进总不能够沒有止境呀。我們認為，根据社会主义經濟規律中的有計劃按比例发展的規律，在一定时期对某些生产部門作必要的調整和收縮，这是会有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就整个国民經济的发展速度來說，就不應該有什么間歇。过去三年所出現的“馬鞍形”的教訓，我們一定要很好接受，社会主义經濟由高潮到低潮又到高潮的曲折发展本来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經濟規律所决定的，只是由于我們某些人的右傾保守思想作怪，沒有正确掌握客观存在着的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沒有最充分地利用社会主义这一新制度所提供的、使新的生产力无限发展的最大可能性。只要我們坚决地全面貫徹执行“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綫，坚决地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綫，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就一定能够跃进再跃进，保證在十五年以至更短的时间內赶上和超过英国。

总的說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高速度发展，是具有充分的主客观条件的。在国外，“东风压倒西风，东风繼續压倒西风”的国际形势，极有利于各社会主义国家和我国的和平建設。在国内，社会主义的經濟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胜利向前发展；我們有着光荣、偉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領導；有着勤劳勇敢、富有智慧、在革命斗争和对大自然作斗争中都具有光荣传统的六亿人民；有着第一个五年計劃胜利执行所积累的經驗和物質基础；有着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无私援助，我們完全相信，在“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綫的照耀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一定会不断跃进，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新的更大的胜利。

“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綫，不仅在社会主义建設的實踐上具有偉大的指导意义，同时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宝庫中也具有巨大的理論意义。

在我国这样一个偉大而复杂的国家，沒有馬克思主义的創造性发展和运用，就不可能把6亿人民的偉大力量动员和組織起来，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也不可能取得建設的胜利。正是由于毛澤东同志創造性地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密切結合着中国的实际，因而不但取得了我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取得了由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也正在取得社会主义建設的胜利。毛主席在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曾經給馬克思主义增添了新的內容，而“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綫及相应的方針政策，又在社会主义建設問題上給馬克思主义增添着新的內容。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是毛澤东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設問題上的发展和体现。

第一、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生动地反映了我們党的光荣传统，反映了毛澤东思想的特点，这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結合的思想。

列宁、斯大林根据馬克思主义“再生产論”的基本原理，在社会主义建設問題上會着重強調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問題，从而保證苏联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下，以高速度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毛主席从我国具体情况出发，在保證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則下，提出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大力地发展农业，这就为重工业和輕工业产品开发着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同时动员世界上最大的支劳动大軍为工业生产提供原料和粮食及各种副食品，創造着无限的财富，为国家建設积累大量的資金，并直接在农村发展小型工业。这样，大力发展农业，正推动着工业的加速发展，推动着整个国民經济的发展。工人阶级与农民結成同盟，是我国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的根本問題，也是社会主义建設能否取得胜利的根本問題。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則下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針，正是在社会主义建設时期解决工农联盟問題的正确道路和生动体现，是

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贡献。

毛主席从我国具体情况出发，提出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也是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灵活运用结果。既然发展工业生产，迅速改变我国落后状态，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迫切要求，因此就必须执行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的方针，打破只能由少数人办工业的神秘观点，使全国的办工业的无穷潜力充分发动起来，不是少数人搞，而是大家动手；不是冷冷清清，而是轰轰烈烈；这就能大大加快工业的发展。大和小、多和少是统一体的两个对立面，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小可以转化为大，大可以转化为小；小的多了就是大，大的少了也就小。这是实际生活中生动的唯物辩证法。大企业具有产量大、技术高、能起骨干作用等优点；也有投资多、时间长、技术力量要求高等限制。而小企业虽然没有大企业的优点，但也没有大企业那样的限制，却具有投资少、分布广、技术力量和生产设备要求不高等优点。贯彻执行中央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就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掘各方面的潜力，多快好省地加速工业的发展。

党所提出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号召，也是从我国具体情况出发的。我国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状况都非常落后，要建设成功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将国民经济有计划有步骤地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来，转到现代化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党一方面规定了技术革命的宏伟纲领，一方面又从实际出发，对我国当前的在全国城市和农村中广泛开展着的改良工具和革新技术的群众运动给予极大的支持和极高的评价。同样，在进行文化革命中，特别强调扫除文盲，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文化；完成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和改革，积极进行汉字改革；消灭四害，讲究卫生；开展群众文艺活动，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培养新知识分子，改造旧知识分子，这些不仅都是从我国实际出发提出的任务，同时在过去的工作中早已取得显著的成绩。

总之，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正是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的”的结晶。毛主席所提出的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在进行技术革命的同时进行文化革命，既解决经济贫困问题，又解决文化落后问题，这些都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在

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创造性运用。

第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还充分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党的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应用和发展。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阶级路线，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所赖以取得胜利的工作路线，今天，也将是我们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所赖以取得胜利的工作路线。贯彻群众路线，就是要具有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并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中，把集中领导和分散经营充分地结合起来，把中央的力量和地方的力量、国家的力量和群众的力量充分地结合起来，把大型事业和中小型事业充分地结合起来，在技术革命中把奠定新的技术基础和群众性的工具改良及技术革新运动充分地结合起来，在文化革命中把提高工作与普及工作充分地结合起来，这一切，都体现了群众路线的精神，大大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多快好省方针的指导下，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全国解放后又经历了新的革命斗争，党和群众结成了血肉不可分的关系，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光荣的历史传统。不然的话，就不能设想我国能够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不断地大跃进。跃进是要靠群众动手的，只有发动了群众，依靠了群众的积极性，才能跃进。因此，总路线不能不充分体现党的群众路线的精神，在贯彻总路线过程中，也必须彻底实行群众路线。

第三、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另一个伟大思想，就是强调在先进的社会制度下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强调严肃的原则精神与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首创精神相结合。

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十二个字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都是对人而言，都是指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是值得我们深刻体会的。我们不是主观唯心主义者，抛开客观社会条件去空谈人的主观作用；我们也不是机械唯物论者，降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成为客观世界和客观规律的奴隶。我们是战斗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充分估计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作了自己命运的主人，人民群众的劳动是为自己的劳动而不再是为他人的劳动，当人民群众在党的教育和

領導下一旦認識到這一點，他們所潛藏的無窮的力量就會被解放出來，他們所具有的無窮的智慧就會被發揮起來，叫高山也要低頭，河水也要讓路，使凡是不適合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陳腐觀念和舊制度都要死亡；使凡是適合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新思想新制度都充分展示自己的生命。在工農業生產大躍進，在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中，千千萬萬工農羣眾所創造的各種奇蹟，正就是人民羣眾主觀能動性和革命首創精神的表現。毛主席這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創造性思想，在他的“介紹一個合作社”的具有偉大意義的著作中有了明確的闡明。毛主席說：“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干劲大。從來也沒有看見人民羣眾象現在這樣精神振奮，鬥志昂揚，意氣風發。”又說，“除了別的特點之外，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些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除了無產階級的偉大領袖以外，再沒有別

的人會對自己的人民寄以這樣大的希望和信心。對人民羣眾的革命干劲和無窮的偉大力量的充分估計，正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生命威力的所在和表現。它的實踐意義已在我國全民大躍進的形勢中慢慢顯明起來，將來還會更顯明起來。

為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鼓舞羣眾的鬥志和熱情，我們要大力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說敢作敢為的精神，敢于堅持真理、為真理而沖鋒陷陣的氣概；反對迷信古人、迷信外國、迷信權威，徹底拋除恐懼、自卑和萎靡不振、甘居下游的精神狀態。

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的實踐意義和理論意義都是極其深刻和豐富的。這裡只是我自己學習總路綫的初步的膚淺的體會，寫出來就教於同志們。宣傳總路綫，學習總路綫，貫徹總路綫，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同時也讓我們自己在總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和偉大的祖國一起前進。

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



“上游”理論雜誌將于“八一”創刊

中共廣東省委決定舉辦一個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雜誌，定名為“上游”，每月出版一次，今年八月一日創刊。

這個由省委舉辦的理論雜誌，將具有鮮明的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性、鬥爭性和革命的、批判的風格，又具有地方性的特點。它的任務是結合實

際，研究和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開展思想、理論批判，討論全省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實際問題和學術界中提出的理論問題，使之成為總結實際工作經驗和指導實際工作、提高幹部思想理論水平的有力武器。

論发展地方工业

楊 繁

“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这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基本点之一；这是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规定的最快最好地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路线。早在前年四月，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就已经规定了这样一条工业建设的路线。经过三年的实践——即前年的高潮，去年的低潮和今年的更高潮的马鞍形的发展的考验，证明凡是正确地执行这个方针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事业便会飞速地前进，否则便陷于停滞。今年以来，这条路线在全国范围内已日益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促使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势如破竹、一日千里地跃进着。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在十五年或是更短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由落后的贫穷的农业国家，变为富强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国家，是我国人民的一致愿望，也是我国人民在革命胜利后的基本任务。大家知道，我国工业长时期以来处于落后、停滞的状态中。近百年来，从清朝同治年间官办制炮局（一八六二年）、江南制造局（一八六五年）开始，直到解放之前，工业在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中只占很小的比重，在一九四九年，使用机器的工业的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只占百分之十七左右。不仅重工业少得可怜，而且轻工业也很不发达，整个说来，现代工业残缺不全，基础极其薄弱，这是我国

多年贫困、落后、备受帝国主义欺凌的主要原因。为什么旧中国工业这么落后？这又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重重束缚所致。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了长期的、艰苦的革命斗争，终于推翻了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山，为我国发展现代工业扫清了道路。经过了三年恢复和五年建设，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的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已经奠定了。可是，已有的工业水平，同我国作为一个拥有六亿人口的大国比较起来是极不相称的，即使就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来说也落在世界许多国家后面。如钢铁的产量，我们还不及欧洲的小国比利时。无论从国内及国际形势来看，无论从经济和政治情况来看，我国人民最大的利益都是要尽快地发展工业，尽早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我国有没有最快最好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条件呢？发展工业有两个条件，一是社会条件（这是决定性的条件），一是自然条件。就社会条件来说，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实现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在公有制之下，大家为着共同的需要而生产，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没有生产过剩、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破坏资源等破坏生产力的现象，生产发展的障碍被排除了。这一切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保障了公有制，堵塞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最充分地利用和发展科学技术。就自然条件来说，也是极其良好的。我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和众多的人力，这是生产力发展不竭的泉源。此外，再加上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援助，加上党的英明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勇敢劳动，这就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不是很慢，也不是平常，而可能是最迅速的。但是，问题在于实现社会主义

工业化的条件具备之后，如何利用这些条件，采取什么办法，走怎样的道路来促使工业化飞跃前进？

毛澤东同志所提出的并为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所确定的：“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这条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路线，就是一条能够达到最快最好的路线。前一个“并举”就是说：不能孤立地发展工业，在迅速发展工业的同时，必须迅速发展农业，使工业化在原料、市场、劳动力以及资金方面获得可靠的保证。后两个“并举”是就工业本身说的，只有坚决打破少数人办工业的圈圈，实现全民办工业、使工业遍地开花，既发展中央工业又发展地方工业，既发展大型工业又发展中小型工业，才能使工业办得又快又多又好又省。这三个“并举”是互相结合、互相促进的，是我国高速度实现工业化的具体道路。

现在我不打算全面来论述这条英明的工业建设的路线，我只就发展地方工业的角度和范围来说明这条路线。

发展地方工业是这条工业建设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地方工业在加速整个工业化的过程中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大二次会上的报告中说：“地方工业的迅速发展，是今年工业发展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只要全国二十几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一百八十多个专区、自治州，二千多个县、自治县，八万多个乡、镇，十万多个手工业合作社，七十多万多个农业合作社，都能够发展工业方面正确地充分地发挥积极性，那末，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各种工厂就会象星罗棋布那样分布在全国各地，而我国工业的发展，当然要比只靠中央管理的若干个大企业快得多。”

正确地充分地发展地方工业，就可以更有成效地贯彻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使工业和农业互相支援，既可以加快工业化的速度，又可以加快农业技术改造的速度。工业和农业是国民经济中两个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一切物质资料都要经过这两大部门生产出来。农业供应人民以粮食，供应生产消费品的工业以原料，基本上是属于消费资料的生产。工业产品中，一部分是利用农产品或其他原料加工制造的消费资料，一部分是经过采掘和加工后，供给工业或其他国民经济部门（包括了农业在内）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料。农业和工业这两个部门，是有着极密切联系的，它们互相推动又互相制约。没有农业为工业提供粮食、原料和市场，则工业

就不能发展；没有工业为农业提供装备和消费品，则农业也不能发展。工、农业是密切不可分的，问题是在于根据我国工农业的具体条件，适当地调整它们的关系，正确地规定它们发展的比例。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我国六亿多人口中有五亿多是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占全国生产人口的绝大多数。我们国家富裕不富裕，就看六亿人口的劳动生产率高不高。假使农业劳动生产率不能得到很大的提高，仅仅是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整个国家的国民收入还是不多的。毛澤东同志说：

“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从六亿人口出发，五亿多农民就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必须看到两点：第一、农民不仅在革命斗争中，而且在生产建设上，都是一支很伟大的力量，是我国工人阶级的伟大的同盟军。刘少奇同志说：“农民同盟军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仍然是这样。无论在什么时候，政治上犯错误，总是和这个问题相关联的。”第二、农业生产的丰和歉，关系着整个经济建设。农产品的产值比重在目前还占很大比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农产品产值约占三分之二（按净产值计算），在工业产值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又占一半；在我国出口品中，农产品或农产加工品占百分之七十五；在市场商品物资中，农产品和农产加工品占四分之三以上。因此，我国的财政收入和农业的关系十分密切，农业税、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税或上缴利润占全部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农业丰收，收入就增多，建设投资就得到增长；农业歉收，收入就减少，建设投资就相应减少。同时，农业的丰歉也影响到工业生产，目前我国的轻工业主要以农业为原料，农业丰收，轻工业也就得到相应的大发展。农业同重工业也有关系，重工业是生产生产资料的，农业丰收以后增多了基本建设的投资，用钢、用机器、用电都多了，重工业生产也就多了。因此，能否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农业，在于能否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所以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这是为扩大再生产所必要的），大力发展农业，就能够动员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对于重工业（包括机械、电力、化学肥料，建筑材料和运输工具等）和轻工业（包括食品，衣料，日用品等）提出巨大无比的要求，动员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大军发展粮食生产和工业原料生产，以供应工业的要求，动员他们贡献无限的劳动，创造无限的财富，为国家工业化进行巨大的积累。因此，从工业的角

度看来，采取什么办法来支援农业生产，解放农业的生产力，使它发出巨大的力量，这是有十分重大意义的。而发展地方工业就能给农业大发展以有效的支援，因为地方工业同农业有更为直接、更为密切的关系，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农民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多半仰赖地方工业的供应，而农业生产的经济作物又多给地方工业作原料和加工，因此，发展地方工业，就能更好地支援农业。实践证明了一条规律：农业发展起来了就推动了地方工业的发展，而地方工业的发展又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发展地方工业（主要是中小型工业），解放了对办地方工业的束缚，解放了对办中小型工业的束缚，就可以把地方办工业的积极性、人民群众办工业的积极性更广泛、更充分地调动起来，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工业化既是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是全国人民的共同事业，就不应该和不可能由少数人包办，只有由中央和地方各级直至合作社一齐动手，并且在大中小企业方面分工合作，才能把事情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着重地发展了中央管理的工业，发展了大工业，这是完全必要的，这就使我国在短短时间内打下了工业化的基础。但在这期间，对发展地方工业，发展中小型工业却注意得不够。无疑的，兴办一定数量的产量大、技术高的大型工业，对于解决国民经济中有决定意义的关键问题，并成为带动全国工业的骨干，是有重大意义的。今后也仍然需要兴办各种大型的现代化工业。但是，只有大型企业是不够的，还必须大力举办中小型企业。因为中小型企业也有大型企业所难于具备的优点：投资少，便于吸收分散的资金；建设时间短，投资效果发挥快；可以自己设计和供应设备，便于因陋就简；分布广，便于就地取材，就地推销，便于平衡全国工业发展，促进全国技术力量生长；易于按照工作的多少而灵活地使用农村劳动力和其他非专业工人，因而缩短了工农之间的差别。可以设想，只要把全国各地办工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大办地方工业，大办中小型企业，那末它的前途就正如刘少奇同志所指出的：一、加速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二、加速农业机械化的进程；三、加速缩小城乡差别的进程。

二

地方工业的任务，是为农业服务，为国家大工业服务，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为出口服务（主要

是加工农产品和土特产品）。而为农业服务是地方工业的基本任务，这个基本任务是根据上述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和工农业发展的相互关系提出来的。应当指出，大力发展地方工业的新任务，首先是随着农业生产汹涌澎湃一日千里的大跃进而提出来的，农业的大发展迫切要求工业赶上去给予支援。所以发展地方工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迅速地发展农业，没有工业的大发展，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就不可能；而工业不为农业服务，没有农业的大发展，工业也就不可能发展起来。

地方工业为农业服务的任务有两个方面。第一，是要尽可能又快又好地把农业装备起来，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第二，发展轻工业，为农副产品加工，满足广大农民的生活需要和出口需要。这两个方面首先要强调的又是第一个方面，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是全体农民争取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最迫切的要求，也是地方工业是否办好的标志。千方百计地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就是发展地方工业的纲，抓住这条纲，就可以达到实现工农业并举的目的。在农业生产大跃进中，工作量大和劳动力不足的矛盾，是十分突出的，而且不是暂时存在的。以广东为例：农村各项基本建设、农业生产技术改革和农田耕犁管理所需的劳动力，估计全省全年约需六十亿个工以上，按现在全省农业劳动力一千五百万人计，每人每年做工二百五十个，合共可作三十七亿五千万个工，对比尚缺二十二亿五千万个工，即缺九百万劳动力，实际上怕还不只此数。本来广东自采取一年三熟的增产措施以后，农民几乎是四季不闲，现在更出现了人力畜力缺乏，劳动力过分紧张和许多事没有人做的现象。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技术革新，逐步地积极地过渡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用机械代替了人力之后，就可作到许多人力所难于办到的事情，农业生产水平就可以飞跃地提高。现在，如火如荼的、群众性的农具改革运动，正表明了农民对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的迫切要求。农具改革运动是逐步过渡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的桥梁。地方工业的任务就是要赶快跟上去，适应农民的迫切要求，促使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早日实现。

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的标准和规格，是使主要农事活动的百分之七十用机械代替人力。这就是说：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实行机耕；除自流灌溉外，凡可用机械灌溉的农田，全部用机械

排灌；農副產品及飼料等百分之七十用機械加工，農村交通運輸實行改革，用各種車、船代替肩挑；防治病蟲害的操作，基本上用機械進行；以及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農業社都建有小型發電站。這就是令人振奮的農業機械化的美麗而粗簡的藍圖。要達到這個目的，一方面要有大型的機械，如拖拉機、聯合工作機、大型排灌和加工機械、汽車、汽船、電站等等；一方面又要有小型機械和半機械，如小型農械、小型動力、小型加工廠、手推車，膠輪車等。這兩方面是互相補充的，不可偏廢。沒有大型機械就不可能進行農業生產技術的根本改造，但是小型機械輕便易搞，可以大量普遍推廣和切合當前農業大躍進的迫切需要。因此要做到大中小結合，目前還是強調以小型為主，配合以適當數量的大型和中型。這些農業機械的製造，除了一些大型的和技術要求較高的要依靠中央供給之外，一般的要由地方工業製造，因此，地方工業的任務，並不是為一些人理解的只是進行一些新式農具的製造和農副產品的小型加工，而是製造大量的中、小型機械，如中小型拖拉機、聯合耕耘機、動力設備等任務都落到地方工業的肩上了。

要製造大量為農業所需要的機械，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例如：要製造一台中型拖拉機，就要一噸多鋼鐵，二十多種金屬原料，一千多種零件，還要有精密的技術和設備。為了裝備農業，也為了裝備輕工業、交通運輸業，在相當長時期內，集中力量發展原材料工業，燃料工業、機械工業、化學工業、冶金工業有其特殊重要性。如果不迅速大力加強這些基礎工業，地方工業的發展就沒有保證。當然，地方工業一般是以輕工業為主，但也必須有一定數量的重工業做基礎。優先發展重工業、發展生產生產資料的工業的方針，對於地方工業也是適用的。在目前，我們不能等到基礎工業發展了，大批的現代農業機械製造出來了，才來着手農業機械化。不，我們應當從最迫切的問題入手，抓住那些必須搞的東西馬上搞起來，對於規模小、投資少、建設快、收效大的，特別是改良農具、製造和修配農業機械，簡便運輸工具和各種聯合加工廠，以及開采有色金屬、小煤窯等小型企業，應該立即抓緊，大力發展。對於現有各種動力和機械設備，應該積極加以綜合利用，發揮應有作用。

這樣，為了裝備農業，就要發展一系列的基礎工業。農業高速度發展起來了，為工業提供了大量豐富的原料，又必須發展一系列輕工業（如制糖、造紙、紡織、榨油等），這就既發展了農業，又發

展了重工業和輕工業。由此可見，抓住了實現農業機械化這個環節，就可以把整個鏈條帶動起來。

三

集中領導、全面規劃、分工協作是办好地方工業的必要條件。放手發動群眾，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全黨、全民大辦工業，使工業遍地開花，這是一方面；但由於地方工業的日新月異的發展，中小企業大量的增加，又必然帶來了許多新的現在還難於預料的問題。地方工業的特點，是數量多，分布廣，種類多。因此必須強調集中領導，全面規劃，分工協作，否則，地方工業必然碰到許多困難而不能發展，就是發展起來了也不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則。劉少奇同志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的報告中特別指出：“我們所提倡的地方工業和中小企業的發展，是在集中領導、全面規劃、分工協作的條件下的發展，而不是盲目的、自由競爭的發展。”目前，地方群眾辦工業的積極性很高，許多工業就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問題是領導必須及時趕快跟上去，組織力量，加強領導，全面規劃。否則，領導就會脫離群眾，脫離實際，就可能使地方工業的發展出現盲目性，產生自流和自由競爭的現象。

為了集中領導，全面規劃，就應該根據各地區的資源情況和現有工業基礎，對工業生產有一個大體的分工協作。不僅全國要有一個大致的規劃，各省、自治區也要有一個大致的規劃。同時根據各地辦地方工業的經濟情況，地方工業的布局一般要依托現有工業城市作為技術中心，選擇若干縣作為聯絡工業城市和各县地方工業的基點，並在地區之間、企業之間廣泛建立協作制度，形成點面結合、大中小企業結合的工業網。以廣東省為例，省工業會議所確定的規劃，對各級工業的分工是作這樣的初步確定：在省一級，只留少數主要的、特殊的及試驗性質的廠礦直接管理，其餘全部下放，以便使領導上空出手來對下面加強領導，組織協作，平衡生產。廣州市的工業，要在現有基礎上，一方面實行技術改革，進行改建擴建；一方面積極建設一些新的基礎工業和機械工業，逐步建設成為廣東和華南的工業基地，今後主要是製造大型、中型的機械和精密設備，並適當發展一些輕工業，以支援全省工農業的發展。專區的工業應是省級工業的一個組成部分，較大的廠礦，可以省專合辦，專區為主。各專區以中等城市和若干重點縣為基點，按資源情況及現有基礎，逐步興建一些中型廠礦，如農械

厂、电机厂、通用机械厂、化肥厂、水泥厂、炼铁厂、炼油厂、滚珠轴承厂、电厂、煤矿、铁矿、以及糖厂、纸厂、缫丝厂等。县办工业以小型为主，贯彻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方针，不要强调在多少时间内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应以农业服务的成績作为工作检查的标准。各县一般可以兴办的厂矿有：农械厂、化肥厂、加工厂、小型造纸、缫丝、纸浆、酒精、电力厂以及中型糖厂等，凡是有资源条件的还应积极发展煤窑、铁矿、有色金属矿、小型炼铁厂、炼油厂、有色金属冶炼厂、低标号水泥厂、木材厂等。乡办工业主要是办一些不适宜于农业社办或者一个农业社单独办不了的而又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小厂矿，同时管理分散在圩鎮上的国营小厂矿。乡办工业要經县批准，以便統一计划，組織平衡，要充分利用农业社的人力、物力、财力，采取組織各农业社投資合办或农业社和国家合办的形式。一般乡可办的工厂有：农具中心修配厂、电站、土特产加工厂以及其他如制陶瓷、制松香、制土紙、酿酒、半机械榨糖、制肥、建筑材料等小型工厂。农业社办的工业，实际上就是农业社的副业和农业社的基本建設，所以应本着自产自销，解决农业社本身需要为原则，除国家委托加工的以外，一般的产品不得外銷。农业社可办“五厂一队”——农具厂、肥料厂、联合加工厂、电力厂、建筑材料厂和采矿队。以上只是大体的分工，原则上以机械、燃料、原材料工业可以大发展，农产品加工、建筑材料的发展要根据当地农业生产和人民需要而定，不可过多；至于日常消費用品的輕工业，如牙膏、火柴、罐頭、肥皂等，目前各城鎮已有相当基础，不可盲目乱搞；某些土特产品和出口商品，只要有銷路，可以多生产。总之，在各級办工业中，首要的是逐步地自上而下地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机械工业網，肥料工业網和动力工业網，这是基础工业，有了基础工业，其他工业才可以順利发展。

全面规划、分工协作是社会主义經濟的特点，它体现了国民經济有計劃、按比例发展的規律。只有按照这条規律办事，防止盲目发展和自由竞争，才可以避免和减少国家资源的浪费和产品的积压，才可以使地方工业各得其所，向前跃进。

为了加强协作和平衡生产，必須坚决反对資本主义的经营思想和地方主义、本位主义的傾向。資本主义的经营思想，主要表现是純业务观点和純利潤观点，只要对自己的业务有利就干，不利就不干，有錢賺就干，无錢賺就不干，不顧服务效果和

政治影响，盲目地追求产值，为了賺錢，不惜損人利己，为了夺取原料和銷路，不惜相互竞争。有了这种思想就没有了政治，没有了方向，从而也就不能很好地为农业服务；就必然妨碍了工农协作，工商协作，城乡协作，行业間的协作和企业間的协作；就必然打乱和破坏了整个社会主义的生产。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也是协作和平衡的大敌，有了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就只看到本地方的利益和本單位的利益，看不到整体的利益和長远的利益，这样，地区与地区之間，企业与企业之間互相扯皮，互不协调，到头来，既損害了整体利益，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因此，必須坚决反对資本主义经营思想和地方主义、本位主义傾向，树立一切为生产的观点，树立社会主义的整体观念，树立“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共产主义风格，主动地加强协作，工业支援农业，城市支援乡村，大厂支援小厂，先进支援落后，在資金、設備、技术、原料、銷路等方面实现全面的协作平衡。

四

依靠群众，自力更生，用土办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手工操作到现代化，这是一条群众路綫的、实事求是的、多快好省地发展地方工业的方法。

摆在地方工业的面前，有許多許多的問題需要解决，最主要的是資金、原料、設備、技术、劳动力、銷路等問題。解决这些問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办法：一种是依靠少数人，主观主义的办法；一种是依靠群众，实事求是的办法。比如当前最突出的原材料和技术设备的供应問題，就有两种解决的办法：一种是等待和叫喊，伸手向上級要，向別人要，盲目地等待进口，等待別人把原料和設備送上門来；或者派出大批人馬，四处奔走，乡向县要，县向專区要，專区向省要，小城鎮向大城鎮要。这种办法，是没有什么好結果的，既費时又失事；还有另一种办法就是依靠群众，自力更生，用土办法、穷办法去解决問題。广东省各地就有不少这样的先进例子，在冶炼方面，信宜县矿务公司的土法炼铁，投資四千元，費时四个月，建成了两座土高爐，日产生铁三吨半，就全部解决了全县制造农具所需的生、熟铁而有余；在炼油方面，合浦專区建成年产三百吨汽油、柴油、煤油的土法炼油厂，成为广东炼油工业的尖兵；在化肥制造方面，較为复杂的硫酸氨和氮酸氨已在开平、揭陽等县制造成

功；在土水泥方面，仅番禺一县，就有一个日产60吨的无熟料水泥厂，该县还准备兴建两个这样的厂，建成后，全县兴修中小型水利用的水泥，都可全部自给了。这些片断的事例已够充分说明，土办法神通广大，只要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智慧，材料、技术、设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在解决资金和劳动力问题上也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向国家要资金，向上级要资金，向大厂要人，向别地要人，而这些一时又要不到，只好“守株待兔”，工业的发展象老牛拖破车一样；另一种办法是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资金由地方自筹，主要来源是依靠地方财政筹集，地方企业的内部积累，手工业合作社和农业社的积累以及发动群众投资；劳动力除了一部分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应是正式的职工外，其余所需的劳动力，就地招用临时工，采用半工半农，半工半商，半工半读的办法，就可以取得大批的便宜劳动力。广东汕头专区采用这个办法，在一个半月内就办起10,000多间厂矿。在工厂的建设规模上，也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根据原料供应和销售情况，考虑工厂规模的大小，随弯就圆，适应需要，一般的多办小型厂矿；另一种是不顾客观情况，盲目贪大贪新。采取前一种办法，使地方工业发展得较快；采取后一种办法，就会增加供销困难和国家损失。在基本建设和经营管理方面，也存在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是精打细算，精益求精，少花钱多办事，花同样的钱，办更多的事，有些事不花钱也能办；另一种做法是财大气粗，不算细帐，造成浪费。前一种做法，是起着促进作用；后一种做法，则起着促退作用。

在办地方工业上的两种工作方法，实际上是人们的两种思想方法的反映。一种是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以这种思想去指导实践，就势如破竹，无往而不胜；另一种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思想，用这种思想去指导实践，则工作了无生气，处处碰壁。我们要在发展地方工业的工作中，做到万马奔腾、轟轟烈烈，就必须尊重辩证唯物主义，联系群众、联系实际，就必须坚决反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刘少奇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无论在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中，无论在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中，都必须坚定不移地反对那种片面地追求最新技术而不愿意充分利用一切现有技术条件的倾向，反对那种片面地强调专家的作用而忽视工人农民革新生产技术的伟大作用的倾向。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用那种安于落后、不求进取

的倾向，同样不利于建设事业的发展。”

有主观主义毛病的人，他们迷信专家权威，迷信洋办法，对科学技术存有神秘观点；他们轻视群众力量，轻视土办法，不相信群众会办工业，不相信土办法能成大事。不错，在教科书上确实找不到群众能办工业的字句，而只能找到专家办工业的字句；找不到用土办法能办工业的字句，而只能找到用洋办法才能办工业的字句。但是，这毕竟是教条，教条是没有用处的。实践已经证明，不仅群众能够办工业，而且只有发动了群众，才能多快好省地办工业，当然专家也需要，但是群众的权威比专家的权威更大。任何事情，不管革命还是建设，少数人是包办不了的，离开了群众，便一事无成。实践证明了，土办法神通广大，因为这是道地的群众的创造，群众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一切科学技术都是从群众的实践中来的，我们决不能轻视劳动人民革新技术的伟大作用。劳动人民的创造性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在旧社会它被压抑着而已。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革命性和创造性发挥出来，让劳动人民的智慧开花结果。劳动人民已经用土办法炼出了钢铁、炼出了汽油、造出了化肥，这个事实不是正好打破了人们对工业技术高不可攀的神秘观点吗？

有主观主义毛病的人，他们不顾客观条件，一味要新要大，如以小型为主，则不感兴趣，认为没啥搞头。这些人不去看看实际，不去倾听群众的要求。实际情况是我们的资金、技术、设备都有限，大的新的不可能多搞，而群众的要求就是迫切需要地方工业的迅速发展以支援农业的跃进，怎么办？如果仍然坚持要新要大，那不过是说空话罢了。正确的方针就是以小型为主，因为投资少，建设快，收效大，能够多搞，集少成多，能成大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手工操作到现代化，是地方工业发展的规律，这条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不按照这条规律办事，就一定要犯错误。

我们正处在“一日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代中，人民群众是那样的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地建设着社会主义。现在，一个声势浩大的发展地方工业的高潮已经在各地形成，祖国工业化的美丽而雄伟的前景已经清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我们应该认清形势，明确方向，加强领导，全面规划，克服主观主义，坚持群众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发展地方工业，以加速祖国工业化的进程，加速农业机械化的进程和加速缩小城乡差别的进程。

論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自由(下)

黃辛

政治上的自由，同民主一样，也是为一定的阶级、阶层和集团服务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自由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对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则是不自由的。相反的，在我们国家里，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由，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由，如果有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由，也就不能保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由了；一切赞成和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是自由的，而抗拒社会主义革命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动分子是不自由的，剥夺这些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动分子的自由，正是为了保障社会主义人民的自由。资产阶级右派要求我们实行不分彼此、不分敌我的“绝对自由”，人民当然不能应允。在右派分子刚刚掀起风浪时，不是已经得意忘形地狂叫着“杀绝共产党人”、“决不宽恕拥护共产党领导的无耻之徒”的血腥口号了吗？不是说明他们真正主张的并不是什么不分彼此的“绝对自由”，而是为反动派争取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自由吗？

当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初兴的时候，自由，曾经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一个响亮口号，并用这个口号把各种受封建压迫的群众动员起来进行斗争。但即使在那时，资产阶级口头上的人人自由，其实际目的，也只是在于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保障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自由。代封建社会而起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以劳动力的自由买卖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剥削与奴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阶级社会。资产阶级口头上说人人有吃饱穿暖的自由，但实际上把几乎全部社会财富集中在自己手里，劳动人民只有忍饥受冻的自由。资产阶级口头上说人人有工作的自由，但实际上却掌握着一切生产部门，尽量压低工资和提高劳动强度，劳动人民只有廉价出卖劳动力、遭受资本家任意剥削的自由。资产阶级口头上说人人有言论的自由，但实际上却操纵着一切报纸刊物广播等言论机关，劳动人民只有任人欺骗和威吓的自由。资产阶级口头上说人人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实际上一切法律的总根子却是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劳动人民只有尊重资产阶级财产的自由。总之，在自由同资本主义私有制联系起来时，自由就不能不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东西，

不能不是欺骗劳动人民的東西；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是资产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资产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自由；资产阶级的自由是以劳动人民的不自由为条件的。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就认为：只有消灭资产阶级的自由，才有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自由。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使自由和民主为自己服务，为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而服务，为剥夺资产阶级和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而服务。在我国过渡时期里，自由正是为了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服务的，因而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由，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由，也就是只准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国家公共财产，而不是资产阶级财产，资产阶级分子只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自由，而抗拒社会主义改造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是不自由的，被严厉禁止和制裁的。右派分子为了反对我们的消灭剥削、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自由，而打出“绝对自由”的旗子，是不能欺骗人民的；因为人民懂得，对于社会主义敌人，只能给以镇压，不能给以自由，人民要求的是镇压社会主义敌人的自由，而不是让敌人破坏社会主义的“绝对自由”。

在我国人民内部来说，象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一样，自由与纪律也是相辅相成的。工人参加或不参加工会组织，在个人来说是自由的；但参加了工会之后，除了享有会员的权利之外，还必须承担会员应尽的义务，遵守工会的共同纪律。农民参加或退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个人来说也是自由的；但做一个社员，除了享有社员的权利之外，还必须遵守社章，执行统一计划，服从生产指挥，遵守劳动纪律。我国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又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因此，自由与纪律，也是民主集中制的一个侧面，或一种体现。联合如果不是自由的，不是自觉自愿的，就没有真正的联合；而另一方面，如果不把共同的愿望，集体的自由，形成为统一的纪律，也就不能建立坚强的巩固的联合组织，也就无法实现大家的自由和愿望。自由并不排除纪律，相反的，纪律正是

統一意志的表現，無紀律即不能保障集体的自由，从而也就不能保障个人的自由。这在工人农民說来，本来是極易理解的道理。革命和建設，都要依靠工农群众的組織力量，工人农民除了組織起来，沒有别的武器。离开了有組織有紀律的統一行動，劳动人民就不能战胜敌人，也不能建設新社会和新生活，从而也就不能达到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和真正自由；而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和自由，乃是每一个劳动人民的解放和自由的先决条件，离开了全体劳动人民的自由，劳动人民的个人自由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但是，右派分子却出來說：自由是絕對的，应当只要自由，不要紀律。試問：这除了使我們的国家和社会变成一盤散沙，全国人民不能團結一致，以便利于社会主义敌人进行搗乱破坏之外，还有別的意义嗎？

其实，任何社会組織，都有它自己的紀律；不过由于社会性質的不同，紀律的性質也就不同了。在地主資产階級社会里，紀律是依靠棍棒和飢餓来維持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紀律是建立在人民群众的政治自觉的基础上的。比如，工厂的劳动紀律問題。在資本家工厂里，上班迟到了，扣工資；出了废品，扣工資；完不成定額，扣工資；生几天病，扣几天工資；年老了，失业；飢餓迫使劳动者拼命做工掙錢，連吃飯也只能站在机器旁边填上几口。而社会主义的劳动紀律，是依靠工人群众的主人翁态度和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来建立的，并以开展劳动竞赛，先进帶动后进，教育与制度相結合等办法来貫徹执行的。再比如，关于农业生产問題。在旧社会里，交租，还債，賤价糶出，貴价糶入，沒米寻糠，沒糠寻野菜，飢餓和死亡把农民一代一代束縛在一小块土地上，为供养地主而劳动。今天，在国家的规划和援助下，农业社社員們执行着自己訂出的生产計劃，遵守着自己訂出的劳动紀律，为发展农业生产与改善自己生活而积极劳动。总之，在剝削階級統治的社会里，紀律是依靠棍棒和飢餓以維持的，也就是依靠有形的和无形的强迫手段以維持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紀律是建立在人民群众的政治自觉的基础上的，紀律是与自由一致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根本差別呢？因为居于統治地位的剝削階級，同劳动人民的利害是根本冲突的，代表剝削者利益和意志的紀律，就不能不依靠强迫手段来推行。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居于統治地位的是劳动人民，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同劳动人民的个人利益是一致的，因而代表劳动人民共同利益和共同意志的社会主义紀律，也是同劳动人民的个

人利益和个人自由一致的，所以能够成为自觉的紀律。代表剝削階級利益和意志的紀律，是同劳动人民的利益冲突的，因而紀律与自由是互相排除的，有了剝削階級的紀律，就沒有劳动人民的自由；相反的，社会主义紀律，是劳动人民共同利益和共同意志的体现，是劳动人民自由联合所必需的，互助合作所必需的，因而紀律与自由是一致的，紀律是劳动人民自由的保障。

右派分子認为“任何紀律都是限制个人自由的”，因而主张只要自由、不要紀律的“絕對自由”。这是用資产階級的自由观来看待社会主义的自由和紀律。在資产階級看来，資本家愿意出多少工錢，愿意开厂或关厂，是資本家的个人自由；工人愿不愿意去做工，愿不愿意接受这样多的工錢，是工人的个人自由。在資本家之間，愿意开什么工厂，生产什么东西，生产多少，按什么价錢出卖，是每个資本家的个人自由，也叫做自由竞争。自由买卖劳动力，自由經營，自由貿易，自由竞争，这一切，都是由資本家的个人利益所决定的个人自由。既然資产階級把个人利益看做高于一切，所以資产階級社会的統治思想，是資产階級的个人主义，即所謂“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种个人主义思想，反映在政治上，就是个人自由高于一切，所以資产階級的自由观，也就是只要自由、不要紀律的“絕對自由”。从这里不难明白，資产階級的个人自由，同无产階級的自由与紀律的統一，是如何不相容的。資产階級的个人自由，是立足于資产階級的个人利益，从資产階級的个人主义出发的；而无产階級的自由与紀律相一致，是立足于无产階級和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是从无产階級的集体主义出发的。当然，資产階級的个人自由，在資产階級社会里也是不能人人享有的。因为有了資产階級的个人自由，就沒有无产階級和劳动人民的个人自由；有了大資本家的个人自由，就沒有中小資本家的个人自由；只有对于一小撮最大的金融資本家，自由才是真实的，他們为了个人自由，不但可以鎮压和屠杀劳动人民，甚至可以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象现在的日本、英国、法国等一小撮垄断資本家投靠美国一样。象这样即使在資产階級社会里也是虛假的、得不到实现的个人自由，資产階級为什么还到处加以宣传？其目的，无非是給那些只有一小撮垄断資本家才享有个人自由的事实盖上一块遮羞布而已，无非是使那些日益走向破产的小生产者得到一个可以“自由发财”的欺騙性的安慰而已，更惡毒的是，他們懂得工农群众的團結，是会

致他們死命的，因而散布個人自由，以使工人農民思想混亂，組織渙散，有利於自己的反動統治。右派分子之宣揚反動的個人自由，其目的基本上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他們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宣揚反社會主義的個人自由，因而就更為惡毒。不是任何紀律都是限制個人自由的，限制個人自由的正是資產階級的紀律，而社會主義的紀律則是保障個人自由的。建設社會主義是我國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是同人民的個人利益一致的，這同資本主義社會里，借口國家利益和共同利益，而實際上只是資產階級的私利，只是一小撮壟斷資本家的私利是根本不同的。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全體人民，齊心合力，向社會主義敵人作鬥爭，向自己的舊思想舊習慣作鬥爭，向大自然作鬥爭，這種英雄的集體主義精神，是同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根本不同的。社會主義的紀律，是根據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由全體人民的共同意志所創立的自覺遵守的紀律，它同少數人強加於多數人身上的資本主義紀律是根本不同的。當然，社會主義紀律同個人自由，也象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一樣，不是完全不會發生矛盾的，但是右派分子企圖利用這一點是白費勁的。正象個人利益不能損害集體利益一樣，個人自由也是不能損害集體自由和共同紀律的，因而共同紀律對個人自由的約束，是完全必要的，其目的恰在於使個人不陷於不自由。只要人們能夠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共同紀律放在第一位，也就可以自覺自願的服從集體利益和共同紀律，也就獲得真正的完全的自由了。

右派分子還企圖把人民自由同共產黨的領導對立起來，說什麼只有實行各黨派的“共同領導”或“輪流執政”才是真正的“自由”。但是，誰都知道，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我國民主革命的勝利，就不能擺脫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所強加於我國人民的奴隸地位；沒有共產黨的領導，更沒有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勝利，沒有社會主義的自由。我國人民擁護共產黨的領導，是在長期的激烈鬥爭和無數血的教訓中所作出的結論。我國憲法明文規定中國共產黨在國家生活中的領導地位，正是全國人民共同意志的反映。而各黨派的“共同領導”或“輪流執政”，則是破壞憲法與違背全國人民的公意的。社會主義，是消滅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和消滅資產階級的結果，它不能不是同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相抵觸的，因而全世界一切資產階級政府和資產階級政黨都是反對社會主義的。在我國，由於具體的歷史條件，民族資產階級接受了社會主義的改造，

但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政黨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才能進行本質的改造，轉而為社會主義服務。右派分子否認共產黨的領導，要求“共同領導”或“輪流執政”，只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反動本質的暴露而已，是企圖重陷我國人民於不自由的奴隸地位而已。

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里，只有按照民主集中制組織起來，具有嚴格的黨內紀律的共產黨，才能以自己的組織性和紀律性，戰勝資產階級的反抗，戰勝小生產者以及由私有制所培育起來的舊觀念、舊習慣的反社會主義傾向，這正是必須有共產黨的堅強領導的基本原因之一。反右派鬥爭和全民整風，又一次証實了這個真理。右派分子的進攻，說明了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已被基本消滅的情況下，資產階級反動派依然是不甘心的，要向無產階級進行反抗的。右派分子打着“絕對民主”、“絕對自由”的招牌，曾經煽動了一部分中間群眾，製造了一時的混亂。但在一個時期里，黨和國家讓這些牛鬼蛇神大喊大叫，不加批判，不予反擊，以使他們現出原形，使人民群眾得以認識他們凶惡的真實面目。接着，先進的工人群眾出來講話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召開了，反右派鬥爭隨之在政治界和知識界迅速地開展起來了，捏事實，講道理，層層包圍，節節追擊，右派分子便不能不在聲勢浩大的群眾鬥爭中被孤立了，擊敗了。試問：如果沒有黨和國家的堅強領導，沒有無產階級的組織性和紀律性，怎麼能夠這樣堅決的徹底的粉碎右派分子的進攻？在黨和國家的領導下，反右派鬥爭轉為全民性的整風運動，在全體人民中展開了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大辯論。單就農村的大辯論來看，過去人們認為農業合作化實現了，農村中兩條道路的鬥爭已經終結了，但事實並不是這樣。一部分富裕農民依然留戀資本主義道路，不同意走社會主義的合作化道路，他們的中心論點也是只要自由，不要紀律，比如“入了社不自由”，“統購統銷卡得太死”，“我不出工，少得工分，是我的自由”，“要包產就需包到戶”等等都是。從個人主義出發的個人自由，在這一部分富裕農民中還有較深的影響。在舊社會，他們親眼看到許多農民破產，看到他們只是在紛紛破產中僅僅殘留的幾家農戶，而且自己也是在飄搖不定中，在千辛萬苦的掙扎中；但是，他們卻具有濃厚的資本主義思想，滿以為自己有“自由發財”的前途。到了現在，合作化了，雖然他們的個人利益也得到了保障，但是，資本主義的道路斷了，“自由發財”的道路斷了，

因而感到处处不自在，不自由。他們不积极出工，不遵守劳动紀律，不向社里投資，不执行統一計劃，搞投机买卖，鬧粮食，鬧退社，对合作化不仅起着消极腐蝕的作用，而且公开鬧对抗。再加上在城市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影响下，少数地主、富农和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起来，因而使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更加突出和尖銳起来。农村大辯論开展之后，对于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进行了坚决制裁，对于一部分資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农民和还没有經過改造的好吃懶做的懶汉进行了批判和教育，从而使农村的正气压倒了邪气。試問：如果没有党和国家的坚强領導，沒有貧农和下中农在斗争中的組織性和紀律性，怎么能够克服富裕农民的資本主义自发趋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和发展，是一个需要克服无数困难和矛盾、需要克服資產階級反动派的反抗、需要克服小生产者的資本主义自发趋向、需要克服人們的旧意識旧习惯的极端艰巨而复杂的过程；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領導，如果无产阶级不在共产党的領導之下，以自己的坚忍不拔的精神，高度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坚持地向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傾向进行殊死的斗争，那就不能战胜資產階級，不能堵死資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因而也就沒有自由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了。

右派分子还說，人不仅要吃飽穿暖，还要求有思想自由。这是右派分子特別为知識分子制造的糖衣毒藥。右派分子把吃飽穿暖看得这样无足輕重，也确是惊人的。在旧社会里，工人农民吃不飽穿不暖，今天，吃飽了，穿暖了，这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天大事，是以无数先烈的鮮血換取来的。右派分子瞧不起这个变化，但工人农民却十分懂得，十分疼爱。革命給工农群众带来了最主要的自由——不受剝削的自由，因而才能吃飽穿暖，这种自由是一切民主权利和自由的基础。过去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那里还有什么思想自由？今天是生产发展与生活改善相互促进，吃飽穿暖，有了經濟上免于剝削的自由，才談得上思想上的自由，这不是很淺显的道理嗎？难道在旧社会，吃不飽，穿不暖，反而有思想自由；在今天，吃飽穿暖，反而沒有思想自由了嗎？如果这个道理可以成立的話，那不是要工人农民重新回到吃不飽、穿不暖的旧日子去嗎？因此，工人农民完全懂得只有什么样的人，才会說这样的话；而对于吃飽穿暖不发生問題的知識分子，却有些迷惑作用，似乎右派分子是十分关心思想自由似的。但是，在蔣介石的反动統治时代，共产主

义是被禁止的，是被罵做洪水猛兽的，而共产党人依然坚持真理，为之粉身碎骨，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党所領導的新中国里，右派分子又出来作思想自由的挑战呢？原来我們所說的思想自由，同右派分子所說的思想自由，是毫无共同之点的。在反动階級的統治之下，統治者拿着伪造的假道理，欺騙人民并强迫人民接受，实行反动的思想統制，因而人民有為真理而奋斗的思想自由的战斗口号。那个时代，在我們国家里，已經是一去不复返了。今天領導我們国家的是共产党，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党和国家在科学文化艺术方面的政策是提倡自由研究和討論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因而肯在冲破反动思想統制的思想自由的口号，在今天，是文不对題的，它除了說明我們是为无产阶级思想爭自由，而右派分子是为資產階級思想爭自由这一点之外，別无第二种解释。如果有人因为抱着資產階級思想，在人們一心向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代而感到思想不自由，那就只有加紧思想改造，轉变立场，由不自由而轉化为自由，否則，就必然要导向对共产党的領導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怀疑、不滿以至反抗了。

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观念，在我国知識分子中还有一定的市场。目前我国的知識分子，特别是中上层知識分子，絕大多数出身于地主資產階級家庭，受过長期的資產階級教育，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較深，因而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是人們头脑中的私有制，它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是根本对立的，它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反抗是隱蔽的、但也是最頑强的。知識分子的个人主义思想，一方面表现在过分夸大腦力劳动的意义和作用，瞧不起体力劳动，瞧不起工人农民；另一方面表现在过分夸大自己的知識才能，自己的兴趣爱好，否定集体，否定紀律。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观，本来是立足于个人主义的基础上的，因而很容易为抱有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思想的知識分子所接受、欣賞。几年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設的伟大成就，和党对知識分子的团結教育改造政策，使知識分子产生了向往社会主义，向往共产党的心情，但又还留恋資產階級个人主义，留恋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这就是大多数知識分子精神上所处的矛盾状态。在知識分子中，已經有少数經過自我改造，从資產階級立场轉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轉到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这就是左派。另有少数，坚持資產階級反动立场，坚持資產階級專政和資本主义道路，这就是右派。多数知識分子的立场

还没有转变过来，加上青年学生在抽象的民主自由面前辨别不清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之间的本质差别，这就是右派分子在一个时期得以利用民主自由的口号而兴风作浪的原因。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已被基本消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民主自由的經濟基础已被基本消灭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必须轉而为新社会服务，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右派分子向党向人民的进攻，从反面教育了知识分子，从反面用事实证明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反动性。正确的接受这次教訓，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轉变立场的新的起点。也許有人会說，又是思想改造，思想改造不就取消了人們的自由思想嗎？其实，这种說法，正是重彈右派分子的老調，或者是对于自由思想的誤解。自由思想，并不是无条件的、絕对的。自由思想，說的是人們通过自由研究和自由討論，以便明辨是非，发现真理；而真理是客观的，是客观事物的固有规律在人們头腦中的反映。只有符合于客观事物固有规律的思想才是正确的思想，只有对于客观真理的正确認識的思想，才是自由的，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認識”，因而自由思想并不是人們愿意怎样想就怎样想，更不是要人們坚持錯誤的思想。在社会生活中，人們也只有認識和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思想和行动才能是自由的，否則，就是盲目的、不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之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不是什么人可以主观随意决定或改变的，只有認識这个必然性，人們的思想才能是自由的。社会已經变化了，前进了，多数的知识分子还没有認識它，因而常有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感觉，这就是一种不自由，要想从这种不自由轉化为自由，决定的条件，就是要承認这个客观事实，改造自己的立场，改造自己的思想。“百花齐放，百家爭鳴”，必須以拥护社会主义道路和拥护共产党领导作为政治标准，原因也就在这里。至于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問題，共产党是主张通过艺术家們和科学家們的自由研究和自由討論，并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慎重地而不是草率地去加以解决。

总起来說，资产阶级右派所提出的“絕對民主”和“絕對自由”的口号，是同我們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能相容的。“絕對民主”，就是只要民主不要集中的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絕對自由”，就是只要自由不要紀律的资产阶级个人自由主义。“絕對民主”和“絕對自由”的另一面

意思，就是只要民主自由，不要專政。既使人民內部意志渙散，組織松弛，又使人民在社会主义敌人面前放下武器，以便于资产阶级反动派混水摸魚，扰乱人民天下，这就是他們的阴谋。因而粉碎右派分子的这两个反动口号，清除人們思想中特别是知识分子思想中的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观点，是这次政治战綫上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重要任务之一。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闡述了关于民主自由的問題，給我們以宝贵的有力的战斗武器。他說：“我們的專政，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專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內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分子实行專政。”又說：“在人民內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紀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統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側面，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应当片面地強調某一个側面而否定另一个側面。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須用社会主义的紀律約束自己。”前一段話教导我們，就我关系來說，民主自由是对專政而言的，对人民实行民主自由，对敌人实行專政，不給他們民主自由，也就是社会主义人民享有对社会主义敌人实行專政的民主，享有对社会主义敌人实行專政的自由；社会主义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其中，工人阶级是领导的阶级，工农联盟是中坚的力量，而社会主义的敌人，在我們国家里是没有地位的，没有公民权的，因而我們国家的性質，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后一段話教导我們，就社会主义的人民內部來說，民主是对集中而言的，自由是对紀律而言的，人民既享有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又必須有高度的集中和严格的紀律，因而我們国家的政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在民主集中制下，全体人民自觉地团结一致，形成为統一的力量和行动，从而也就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力量以战胜社会主义敌人，对社会主义敌人实行專政。这样，就使我們既能压倒敌人，又能組成人民內部的統一和团结，以便把我国建設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党的知識分子政策的偉大胜利

黃煥秋

一、知識分子必須自我革命

刘少奇同志在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會議的工作报告中指出：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我国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带有决定意义的斗争。由于这个斗争的胜利，就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形成了一个共产主义的思想大解放，从而深刻地改变了我国的阶级力量的对比”。

这一段話，深刻地指出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革命性质及其伟大意义。

在反右派斗争以后，右派孤立了。在知識分子当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与个人主义、馬克思列宁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就突出起来了。全国开展了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以后，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思想改造运动，这是形势发展所必需。在这种情况下，高等学校开展了紅專問題的大辯論。广大教工学生，热烈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自我革命运动，开始批判了自己政治态度的动摇性，批判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的两面性。多数人都感到“形势逼人”，不能停留在原来那种中間状态了；表示决心要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改造自己，争取成为左派，成为又紅又專、紅透專深的社会主义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运动正在广泛深入地开展。高等学校教工学生的政治思想面貌，起着深刻的变化。

整风运动的中心问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改进人們在社会主义的劳动中以及其他共同活动中的相互关系。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的問題”报告中，对于知識分子的問題曾經这样的教导我們：“我国人民内部的矛盾，在知識分子中間也表现出来了。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識分子，现在轉到为新的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們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們如何帮助他們适应新社会需要的問題。这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毛主席指出了大量知識分子世界观改变的必要和可能，而且指出了知識分子改造的方法和措施。

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大二次會議的报告中分析了我国目前阶级关系，指出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其中的一个剥削阶级“是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識分子，他們的大多数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間处在动摇的过渡状态”。由于我国在一九五六年經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了所有制的变革，资本主义的經濟基础已經灭亡了，知識分子的唯一出路，就是在新的社会主义的經濟基础上开始新的生活，同工农劳动人民团结一致，全心全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目前，我国人民在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遵循着社会主义建設的总路线，争取十五年内將我国建設成为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必須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識分子的现有力量，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設的需要。知識分子就必须努力改造自己，改变立场，革掉动摇性，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起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將自己改造成社会主义的知識分子。

由于工业农业生产大跃进，工人农民的劳动热情和創造革新的精神，大大激起了知識分子的进步要求。特别是党提出了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号召，迅速地获得了全国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識分子热

烈的响应。知識分子面对着新的伟大的历史时期，觉察到非急促改变自己政治上思想上的落后状态，就无法赶上时代飞速前进的脚步。自我革命、又紅又專，成为广大知識分子的要求。党领导和帮助知識分子进行了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运动。因而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知識分子群众性的思想改造运动，自觉的革命运动。

“又紅又專，紅透專深”。这是一个十分生动丰富而又充滿着发展、战斗精神的口号。它指出了知識分子前进的目标和自我革命的要求，为广大有爱国心、爱正义的、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知識分子所乐于拥护和支持。知識分子思想革命运动，是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灭資兴无的斗争，斗争的内容是尖锐的。由于知識分子思想革命运动是知識分子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自我革命运动，是按照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来进行的。斗争的方式是温和的。广大教工学生从团结进步的愿望出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摆事实、說道理，采取了多种生动活泼的方式方法，如大字报，座谈会、辯論会、交心、送礼、评比等方式方法，对正确处理知識分子問題取得了丰富的經驗。

在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設各个历史时期，党中央、毛主席創造性地运用馬克思列宁共产主义原則，結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各种政策方針，正确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彻底摧毁了封建所有制，消灭了資本主义所有制。在目前知識分子自我革命运动中，全国知識分子开始决心破除资产階級思想，团结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向又紅又專大跃进。这是党中央团结、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和毛澤东思想又一次伟大的胜利。

二、政治必須挂帅

毛主席說：“沒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沒有灵魂”，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永远是一切工作的灵魂和統帅。这一关键性的問題，在知識分子当中有不少人是并未得到解决的。各高等学校关于紅与專——政治与业务关系的大辯論，充分揭露了存在于知識分子灵魂深处的腐朽的东西，証明他們充滿着资产階級的思想感情，有不少人留恋资产階級立场，还有不少人，有着深厚的封建主义的頹废思想，有許多和社会主义建設背道而馳的东西，有不少人

对于政治是灵魂是統帅这一真理名言，采取怀疑或对抗的态度。因此这一場紅与專大辯論，成为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个人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大論战，是文化教育事业要党来领导还是要專家来领导的分野。

为了建成社会主义，我們的国家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队伍。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就是具有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又具备專門的技术，精通业务的知識分子。他們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为了組成这样一支强大的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队伍。党在团结、教育、改造旧知識分子的同时，又用很大的力量来培养大量的新的知識分子。毛主席提出了新的教育方針：

“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正是我們培养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规格和要求。

紅与專——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統一的。因为政治是灵魂，是統帅，沒有政治就沒有灵魂，便会迷失方向。有了政治沒有业务也不行，因为这样就不能做好工作，就不能实现对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实际领导。因此，“我們既不要作不懂业务的空头政治家，也不能作迷失方向的实际家。又紅又專，这是全国知識分子和技术人員的前进道路，也是我們全党各級干部的前进道路”。

有人認为紅与專二者是有矛盾的。他們說紅了就要忙于搞政治工作、搞社会活动，就沒有時間鑽研业务，研究問題，搞好功課了，因此認为要紅則不能專，要專便不能紅。有人提出“紅与專分家論”，“你搞政治，我搞业务”，“你是政治第一，我是业务第一”，甚至認为“紅了就后患无穷”。他們的結論就是“要專不要紅”。这种論調是錯誤的。这些人有的是簡單地將“紅”理解为开会、参加社会工作，不懂得紅就是指政治，就是忠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态度和共产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辯証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有些人則用心丑惡，他們企图貶低政治的领导作用。有人甚至提出“紅”无标准的論調，則更是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进攻的一支毒箭。

我們認为“紅”是統帅，只有紅了才能專，紅了就会專得更好，有了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武器，才能正确地分析問題、辨风向、明是非，掌握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政治觉悟越高，越“紅”，对社会主义就更加热爱，工作的目的、方向明确，工作方法对头，对业务的鑽劲才大，工作的成果才会

丰富。因为政治觉悟高的人，首先就懂得从国家的需要、从集体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将知识技术交给人民，和那些从个人名利和个人要求出发的人完全不同。那些人有了点成就，便自高自大、骄傲自满，便伸手向国家向人民要名要利，讨价还价，“按酬付劳”。有些人就因为不能满足个人欲望，便闹情绪，甚至和党对抗。这种以个人名利作为动力的思想，在今天行不通的，因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其次，有了政治觉悟的人，就有明确的阶级立场，就懂得要贯彻阶级路线，走群众路线，把自己的知识水平和群众智慧相结合，重视向群众学习、总结群众的经验，并依靠发动群众发挥群众的智慧来解决实际工作的困难，向征服大自然进军，为不断提高人民的文化科学水平而奋斗。第三，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就懂得要尊重辩证唯物主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来研究分析问题，懂得实事求是，从生产实际和阶级斗争的实际出发，深入探求和解剖事物的本质。刘少奇同志说：“对于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工作人员，应当着重地教育他们坚决执行联系实际，联系生产，联系群众的方针，以便有效地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服务”。这正是知识分子走向又红又专道路必须记取的教导，也就是红与专关系上的一种明确的解释。只专不红论者，他们不是认识不清，就是有意无视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条件。我们的国家是处在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我国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只专不红”论者，自觉地坚持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生产，脱离群众，这就不仅是学术观点或治学方法上的错误，而是政治立场上的错误。

有人认为：“形势逼人”，“只专不红”行不通，“取法乎中”，“多专少红”，也就差不多了。有一些教师这样说：“我是搞科学的，不是政治活动家”，因此“三分政治，七分业务”足矣。有人竟认为学政治象吃盐一样，盐是必须的，但不可多吃。这种“粉红论”，追深一步，实际是为“只专不红”找防空洞，打掩护，其实质是不愿下决心彻底地改造自己。这些人披着红色的外衣，以便于迷惑人，欺骗人，因之它的危害性也就更大。有一位教师爱帮助别人修改文稿，添上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辞句，自鸣得意地说：“穿上马列主义的外衣，那就很好看了”。这些人的丑态不是很明显吗？他们是“唯心主义为体，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用”。他们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标签来掩饰他们

资产阶级的腐朽的本质。“粉红论”者，充分表现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潮流中的动摇性、两面性的本质。反右派斗争以后，他们很清楚了，往右走是万丈深渊，此路不通。但向左转又不愿意，或三心两意。因此，他们不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而是中庸之道，“力争中游”。

在教师的“只专不红”或“多专少红”思想的影响下，年青教师和学生相当普遍存在着“先专后红”的思想。有的教师公然鼓励学生说：“谋生之计在于专”。他们给年青教师学生的影响是深刻的。不少教师从旧社会带来的，没有经过改造的消极、颓废、伤感……的没落阶级的思想感情，严重的腐蚀着青年同学，给高等学校的教育工作带来很坏的恶果。有人说：“学得某某专家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那就吃得开了”。有些人认为“有了本领，红就容易了”。是否可以“先专后红”呢？我们认为今天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可以的。年青的人们不了解，他们和老专家所处的时代已不相同。由于时代的限制，有许多老科学家是先专后红。我们年青一代在社会主义的新的时代环境里，党的教育方针，就是要培养我们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人民热望着我们，培育着我们成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我们年青一代没有理由要重走老一代所走过的弯路。在这次红与专大辩论中不就很清楚了吗？我们不走红专的道路，结果就会成为白专的俘虏。脑子里共产主义少了，个人主义思想就会多起来。教师们正在痛恨丑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对自己拖累，要将他搞臭，向着又红又专大跃进，难道我们仍要走他们的老路吗？

红与专是无止境的。我们的国家要在十至十五年内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就要依靠党的领导，发挥集体的力量，发挥群众的智慧。我们的事业是不断发展前进的，我们要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奋斗到底。生产力的跃进，继续刺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改进和人们思想的前进。人们在不断地改造自然界的斗争中，不断地改造社会和改造着自己。因此红是无止境的。现在是原子时代，技术革命新时代，科学日新月异，专是没有尽头的。党提出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的号召，要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脱离生产，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想单枪匹马去赶世界水平是不可能的。现在科学研究工作，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精神劳动，它既要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更需要依靠集体的智慧、力量和各方面的协作。

党的领导是一切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保证。马

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理论基础。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下，知识分子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充分发挥力量。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下，人民的科学文化和各项事业，才能获得迅速的发展和提高。不少事实教育了我们：

“在任何情况下，放弃或忽视党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就会脱离群众，迷失方向”。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在一切事业中，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必须贯彻，政治必须挂帅。

三、破除迷信、遍插红旗

毛主席早已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必然带来文化建设的高潮。现在，预言已成为现实。我国的文化革命开始了！

曾经有人怀疑：党是否能够领导科学文化工作？也曾有人讥笑我们不懂教育，说什么“把所熟识的一套搞政治运动的经验，硬套到高等学校上去”。有些同志竟被人欺负得连信心也没有了。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回问：“解放后，高等教育是办好了还是办坏了”？事实响亮地回答：在党的领导下，高等教育是办好了，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其实，这些自认为是办学经验的资产阶级学者先生们，不过是懂得一套资本主义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经验罢了，他们为资产阶级及封建地主、官僚、买办的利益服务，的确是有经验的。这样的一套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办学经验，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高等学校，又有什么好处呢？在红与专大辩论所揭露的无数事实中，说明历史的负担对我们是多么的沉重啊！

我们的党不仅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而且在文化教育方面也有系统的理论指导和多年的工作经验。我们有老解放区教育工作的优良传统，在解放后我们又学习了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毛主席所拟定的教育方针，是马克思列宁全面发展教育学说的新发展。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道路是明确的：教育必须为生产服务，为政治服务，为全体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要求服务。解放以来短短八年的时间，在文化教育方面，我们的努力已经大大地改变了我国原有的落后面貌，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上是有充分信心的。现在全国各地已经普遍地开始了蓬蓬勃勃的文化革命的高潮。文化革命是全体劳动人

民的文化翻身运动。党教导我们：“在过去，剥削制度硬生生地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割裂开来，剥削阶级剥夺了劳动人民学文化的权利，反过来却鄙视劳动人民，把劳动人民说成愚昧无知。他们故作玄虚，把文化知识神秘化，使人民误以为文化是高不可攀”。“打碎剥削阶级用来吓唬群众的一切泥塑木雕的偶像，是动员群众向文化革命的伟大目标进军的重要前提”。党号召我们要破除迷信，思想解放。的确，旧的因袭对我们的影响是深重的。不少人对于教育、科学研究工作，是否能实现多、快、好、省的方针，是抱着怀疑态度的。有不少人强调了所谓正规、规格和质量，对于文化革命有着抵触情绪。我们要承担起党所交托的任务，首先就要求我们自己提高认识，思想解放，打破各种清规戒律。自己的认识明确了，才能更好地帮助别人，自己的信念坚定了，才能更好地坚定别人。

有人发出这样的一些疑问：“要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普及中等教育，还要普遍开办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谈何容易！”党告诉我们：搞文化革命就要走群众路线，只要我们能依靠全党的动员，全民的动员，发挥全党全民的积极性，我们是有可能采取更快的速度逐步地实现的。事实就是最好的证人。在很短的时间内，有十六个省市已举办了一百三十多所高等学校，许多新的科学研究机关也在各地成立了。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破除迷信，思想解放”的伟大号召，已经开花结果了。主要的问题就在于明确方向，正确的估计自己的力量，善于组织和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譬如师资问题，过去，我们曾经过分地信任了一些教师，或者是过高地估计了一些教师的学识才能。相反，我们对于正在成长中的新生力量却认识不足，对于年青教师的作用估计过低。我们的保守思想就大大限制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不少教师的交心材料及揭露的事实，不仅说明有些教师在政治上思想上成了“梁上君子”，在业务上也是一副空架子。过去，由于我们对他们的认识不足，就不能善于帮助他们努力改进。这虽是少数人的一种情况，亦值得我们深省。党要求在七年至十五年内，建成一支强大的成千万人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有了这样一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才能得到巩固，因此，今后在培养干部，必须坚决贯彻阶级路线，大力培养工农知识分子。由于年老的教师人数不多，必须正确发挥他们的作用，大力培养年青的师资和科学工作者。年青教师和学生应有旺盛的学习热情和刻苦钻研的精神，有敢于超过前人的

志气；老教师对年青一代应有青出于蓝的愿望，努力加以培养。在高等学校有将科学研究工作神秘化的现象，认为科学研究高不可攀，不少教师对工农学生采取不大关心的态度，对于劳动人民的创造成就很不重视。这是长时期的影响相当深的一种偏见。其实，历代的发明家大多数是出身于文化知识不高的劳动人民。最近，李始美消灭白蚁的成就，蔗渣造纸及造人造纤维的成功，大大震动了长期关在象牙之塔的科学家们。科学家们已开始重视，或开始走出书房，走出实验室，到生产中去，到工农中去，虚心向工农学习，与工农结合，为生产服务，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是有些人的思想，也不是这样容易转变的。高等学校的教师学生在整风运动中有了显著的进步，然而比起工农生产战线上的干劲则是不够的。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否则我们的工作仍然是落在时代发展的后面的。

我们要迎接文化革命的高潮，调动起广大教工

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重要的问题是要加强教工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把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贯彻到基层中去。党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积极帮助教师学生进行自我教育自我革命，灭资兴无，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同时要有决心在看到没有红旗的地方插上红旗，在插上红旗的地方把白旗拔下来。只有遍插了红旗，我们的高等学校才能成为真正的名实相符的社会主义大学。

向文化大进军的号角响了！让我们鼓足干劲，向着又红又专红透专深的道路大步迈进。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和全国工人农民团结在一起，肩负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任务。使我们的祖国在不久的将来，以一个具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国家出现于世界上。

让红旗到处迎风飘扬，欢呼党的文化教育政策的胜利，欢呼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胜利。

广东省积极开展科学活动

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广东省分会是我国科学界一支巨大的科学研究队伍，拥有27个专门学会、5个专门学会的筹备会。最近一个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坚决走社会主义的科学道路，与政府有关业务部门密切配合，做好协调工作，有计划有组织地展开了许多科学活动。农科8个专门学会（农学、园艺、蚕丝、土壤、畜牧兽医、林学、昆虫、植物病等）于5月中旬先后在广东科学馆举行了大规模的传达报告会，传达了中苏科学技术代表团的工作报告，宣读了大会所提出的大跃进的倡议书，并要求农科各学会和全体会员积极响应号召，按总会的指示精神，把学会的工作活跃起来，更好地为生产服务。广州蚕丝

学会于4月25日正式宣布成立后，即接受广东省农业厅的要求，组织了一个工作组，于5月7日出发到盛产蚕桑的中心——顺德进行调查，支援蚕业生产的大跃进。

许多学会并举行了科学座谈会和报告会。5月11日，召开了一次有关物理化学、有机化学和感光化学工业的座谈会，出席的有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学院、华南工学院有关系组的工作人员等，提出许多科学问题的研究，还决定今后要和化工厂进行协作。此外，各学会还发表了許多科学论文，如“水稻生育过程与栽培技术措施”、“氢奎宁及扑鹿啞啞短程治疗疟疾疗效初步报告”等，都提出了初步的科学研究成果。（念邹）

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必須拋棄

王燕士

目前，在我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間正在展開一個規模巨大的思想戰綫上的自我革命運動。這次思想革命運動同1953年的思想改造運動不同：它的批判對象已經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而不再是三大敵人的封建買辦思想了。一定要把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搞臭，樹立起工人階級的集體主義思想，就是這次運動的總目標。

個人主義絕不是什麼自古有之的人類通性，它不是隨人類的產生而俱來的永恆範疇，而是人類社會發展一定階段的產物；它不是人皆有之的什麼“人性”，而是一定階級的屬性。個人主義思想是隨着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出現而產生的，它也必然隨着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消滅而終被消滅。在占人類歷史最長時期的原始社會中是不会有個人私利觀念存在的，由於生產極不發達，只有整個部落、氏族共同勞動、平均分配才能求得個人的生存，只是到後來因為生產力提高而有剩餘產品可供部落首領據為已有的可能時，才出現了貪圖私利的思想。恩格斯說：“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貪欲、粗暴的情欲、卑劣的吝嗇、掠奪公共福利的私利觀念——揭開了新出世的文明的階級的社會。”^①所謂個人主義與人類俱來的謊言只是資產階級社會學中歪曲歷史事實的虛構。

自從私有制產生以後，在階級社會里，個人主義是剝削階級的一種人生觀，廣泛的個體生產者則是承受並支持這一思想的。小生產者雖然不是剝削者，但他總是建立在個體經濟上的小私有者，這就決定了他處處要為自己打算，要在競爭中謀生存和發財致富。在階級社會里，知識分子也是拿自己的知識待價而沽的，而且在一切私有制社會里，知識分子又永遠被那個社會的統治階級、剝削階級——奴隸主、封建主、資本家所收買和養，並成為他們的思想代表者，所以知識分子也有濃厚的個人主義。在現代，個人主義思想是小私有者和資產階級

所共有的人生觀。隨着私有制社會的發展，個人主義的發展至資本主義社會已達到了登峯造極的階段。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要求把一切人身和人格隸屬關係、地方特權和等級特權等妨礙資本主義關係發展的東西掃除，要求自由競爭，資本家的個人利益高於一切，於是個人主義便成為資產階級的根本思想，並取得了意識形態方面的統治地位，達到了它的發展的最高形態。在這種歷史條件下，一切小私有者的個人主義都必須從屬於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思想體系。在資本主義私有制被廢除，社會主義公有制確立之後，個人主義的思想便失去其存在的現實基礎，並將最終地被消滅。

個人主義思想和工人階級的思想是不会有共同之點的。雖然工人由於出賣勞動力也不得不關心到自己的勞動力能否遇到顧主和能否賣得更多的工資，但工人畢竟是無產者，他們沒有做官發財的可能，又是集體勞動者，終必會覺悟到整個工人階級被整個資本家階級剝削這個事實，因而接受階級鬥爭的理論而組織起來同資本家進行鬥爭。所以，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作為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對立物的無產階級集體主義的思想意識必然形成。由此可見所謂“個人主義是人之通性，人皆有之”的謬論，只不過是資產階級硬把自己的階級性說成是一般人性的詭辯。

在西歐，“資產階級在歷史上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②當時，它提出了“個性解放”、“人身自由”和“人權平等”等口號，去鼓動小資產者和農民沖破封建主國家建立資產階級政權；個人主義在沖破封建專制和等級壓迫，解放生產力方面，曾起過革命作用，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向前發展。1762年發表“民約論”的盧梭就是那個時代革命思潮的旗手，他宣稱“人生來就是自由的，可是却處處都在桎梏中”，“全體人最大的善歸納起來一共有兩個：一個是自由，另一個是平等。”他的

^①馬恩文選第二卷，第252頁。

^②馬恩文選第一卷，第11頁。

理論成为十八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的思想基础。但个人主义在历史上起进步作用的时期是极其短暫的，革命后所建立起来的資本主义制度，是剝削制度的最高形式，个人主义的理論很快就成爲掩飾資本主义的殘酷剝削和遮盖尖銳的階級對抗的反動意識了。

在中国，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思想連象西欧那样的历史作用也沒有起过。到了“五四”运动的时候，要求个性解放的自由平等呼声才第一次掌握了群众，开放出燦爛的花朵。但这样的“自由之花”也只是曇花一現而已。就在这次革命运动里，年輕的中国工人階級在俄国革命的号召下挺身走上了政治舞台，与民族資產階級恰恰相反，她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既提出了鮮明正确的政治綱領，又很快地提供了一套有系統的革命人生观。自此之后，作为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領導力量，資產階級的个人主义思想就不得不讓位給共产主义的集体主义思想了。毛主席指出，在“五四”运动以后，資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却比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絕无領導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員，至于盟長資格，就不得不落在无產階級文化思想的肩上。①事实上，在很大的程度上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思想却成为破坏革命的因素。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右翼代表人物胡适就是一貫用最反动的个人主义思想去毒害青年的。例如他曾利用易卜生的話来販賣个人主义人生观，企图誘惑青年脫离革命斗争。他說：“最可笑的是有些人明知世界‘陆沉’，都要跟着‘陆沉’，跟着墮落，不肯‘救出自己’！却不知道社会是个人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备下一个再造社会的分子。所以孟軻說‘窮則独善其身’，这便是易卜生所說的‘救出自己’的意思。这种‘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②他所宣扬的“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无非是欺騙青年脫离爱国学生运动和脫离工农群众。誰都知道，知識分子要革命决不是什么“救出自己”、什么“独立人格”，而是要投身于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斗争中去，同工农群众結合起来。胡适之流的个人主义在历史上起什么作用，难道还不明显么？至于“不要被馬克思牵着鼻子走”、“多研究問題，少談主义”等等，那就更加露骨了。

在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很多知識分子的先进人物，都抛弃了資產階級的自由主义思想，轉变成爲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的播种者。如李大釗在1916年写的“青春”，还是以个性解放的思想

向历史上一切反动的罗網和古老的旧中国封建社会冲击的，而到十月革命后1918年写“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維克的胜利”时，他已經成爲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杰出的传播者了。

由此可见，資產階級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社会发展上所起的作用，是何等的微弱和不足道！而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今天的胜利的思想武器，决不是从西欧学来的什么資產階級个人主义，而是在十月革命后从俄国学来的工人階級集体主义，也即共产主义。今后，要巩固和建設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必須是后者，而决不是前者。

二

在民主革命时期，資產階級个人主义还有其借以生存的經濟基础，因而还不可能加以根絕；但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一切生产資料的私有制都已經成爲革命的对象，个人主义的意識形态也就成爲与社会主义制度絕不相容的反動思想了。

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革命，它的历史任务是消灭过去任何一种革命都不可能消灭的人剝削人的制度。在集体劳动中成長起来而代表一切劳动人民利益的现代无產階級，就是这个历史任务的担当者。社会主义革命还决不能停留在政治革命和生产資料所有制的变革上，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在完成社会主义經濟革命之后，还必須进行一场思想意識上的大革命。过去在私有制下許多千百年来的习惯，和許多被認爲永恒不易的天經地义的观念和信条，现在都必須加以根本的否定了；过去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許多根本不可能想象的“神話”，现在都將成爲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內容了。人生观和世界觀的許多基本观念都正在經歷着很大的变化。这种过程，本質上就是以工人階級的集体主义思想体系来代替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思想体系的过程；以社会主义意識形态代替資本主义意識形态的过程；也正是我們目前簡称之为“兴无灭資”的过程。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这种翻天覆地的深刻性，是由經濟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刻性所决定的。正因为社会主义革命要消灭一切剝削制度，以公有制来代替私有制，因而，在上层建筑方面也要求一个相应的革命。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这样一种

①新民主主义論，第45頁。

②胡适文存卷四，第33頁。

意識形態上的革命，它要求徹底鏟除一切根源于私有制的思想意識（這在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上，主要就是資產階級思想意識），而代之以根源于公有制的共產主義集體主義的思想意識。

集體主義同個人主義的鬥爭是思想領域里革命同反革命的鬥爭，是社會主義制度成敗存亡所系的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在整個社會主義建設的時期中，反對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思想鬥爭都是黨、國家和全體人民在思想戰綫上的經常的、重要的任務。不破不立，只有經常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作戰，才能把共產主義的思想武器磨煉得更加銳利。

有人說：“保存個人主義思想也為社會主義服務”，這種說法如果不是狡辯就是幻想。讓我們從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看看個人主義同社會主義是否相容吧。在經濟方面，個人主義的自私自利思想同生產資料公有制是敵對的。例如開設地下工廠和富農雇工經營就是反對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行為；企圖個人自由投資任意生產，是同社會主義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要求相違背的。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表現形式之一的絕對平均主義同社會主義按勞取酬的分配原則就是敵對的；侈奢浪費的享樂主義行為同社會主義積累就是敵對的。在政治方面，個人自由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是同無產階級專政相敵對的。列寧說：“在事情已經發展到推翻全世界或者一個國家的資本權力的時候，在被壓迫的勞動階級徹底打倒資本、徹底消滅商品生產鬥爭已提到首位的歷史關頭、誰要是大談一般“自由”，誰要是為了這種自由而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誰就是幫助剝削者，誰就是擁護剝削者。因為正象我們在自己的黨綱中所直接聲明的那樣，自由如果不服從勞動擺脫資本壓迫的利益，那就是騙人的東西。”^①當我國資產階級右派標榜着“民主”“自由”來集中攻擊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不少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所以容易中毒，就是因為他們在思想上也存在着個人自由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思想。

在思想方面，自私自利的思想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目前突出地表現為“粉紅論”“甘居中游”的思想，在這次高等學校的思想改造運動中，發現這種思想十分普遍。不少教工同學認為“當左派太辛苦，當右派會被鬥爭，還是做個中間派好”，“政治上二分是右派，三分還有變成右派的危險，最好是三點五分，既保險不當右派，又可埋頭搞業務，對社會主義建設同樣有幫助”，“不要太積極，也不

要太落后，應該粉紅，萬事跟着大家走，有黨委領導，不會走錯出毛病，自己可以大專一下”，這些思想的實質是拿“中間派”“粉紅”做掩飾，實際上還是要人民的利益服從他個人的利益，要人民來為他自己成為專家而服務，是皮紅里不紅，面紅心不紅，這些人參加熱火朝天的群眾運動，是“隨大流”無可奈何地“跟着大家走”，只求無過，不求有功，目的只在於保護住自己爭取做專家的機會，充分表現一副勉強應付、無精打采的樣子，這和我們鼓足干劲，力爭上游的精神毫無共同之處。但是一到搞他們自己的業務“自留地”，那就表現勁頭十足，把全部精力都放下去。這種搞自留地的勁頭，也和我們提出的鼓足干劲毫無共同之處，它仍是完全以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為動力的。這種勁頭，能不能為社會主義服務呢？事實上，用這種勁頭來搞教學和科學研究，必然處處和集体的利益衝突。因為它所追求的只是個人的名利（不管表現為赤裸裸的追求金錢、地位和物質享受，還是追求學術成就，“名山事業”，其實質都是一樣）。我們要培養青年，他却要搞壟斷資料，在帶徒弟中留一手，實行知識私有；我們要集體協作，他却要單干，不幫助別人，認為別人也幫助不了他自己；我們要厚今薄古，他却認為“偏門出行家”拿着幾件老古董就一生受用不盡；我們要搞好教學，他却教學不負責任，教書不教人，埋頭鑽自己的業務；我們要科學為生產服務，他却鄙視“土”專家的“淺薄”，標榜“為科學而科學”。這樣，明顯地看出，在個人主義的“粉紅論”指導之下，科學研究是鑽進死胡同，教學是培養出充滿名利思想的廢品，絕對不可能真正為社會主義建設帶來什麼好處，是和文化教育事業必須為政治服務，為生產服務的原則背道而馳的。由此也就可見，個人主義這一徹頭徹尾反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同社會主義事業是怎樣地南轅北轍，怎樣地齟齬不入了！

有人認為，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固然必須反對，但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還不那麼反動，似乎還可以保留下來。這種看法也是非常錯誤的。有這樣想法的人不懂得：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是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同流合污的。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所留戀的雖然不是資本主義的所有制，而是個體經濟的生產資料私有制，但在抗拒社會主義生活方式、抗拒黨的領導、抗拒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這一點上，却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并

^①列寧文選集第24卷，第40頁。

无二致。列宁說：“反抗这个变革的，有自觉进行反抗的资本家及其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为数众多的走卒，也有往往是不自觉地进行反抗的大批过分拘守小资产阶级习惯和传统的劳动者（包括农民在内）。”①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如果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第三条道路”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纲领是妄想使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小资产阶级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实质上岂不也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么？由此可见，在以消灭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任务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小资产阶级只要具有留恋既往、反对社会主义现实的思想，便只有以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为纲领，以资产阶级的口号为口号，它自己本身是不可能提出什么独立的纲领和口号的。这也正是有些人虽然不是来自资本家富农家庭，但由于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扩展，也终于堕落成为右派分子的原因。可见用民主革命时期的老眼光来看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无非是眼看资产阶级大势已去，现在想顶着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牌号，以为这会更便于把守住资本主义阵地来抵抗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声讨罢了。

三

留恋个人主义的人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人是提出各种久已破产的资产阶级滥调来替个人主义辩护，固守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阵地；另一种人则是思想跟不上形势发展的思想落后分子。这两种人不管顽固也好，落后也好，在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面前，都是非改变不可的。

在这次思想革命中，有人宣扬所谓“个人主义动力论”。他们说：个人主义是个人进取的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他们甚至认为个人主义推动人们上进比集体主义的力量更大，从而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更有利，为了升级提薪，为了做劳动模范，为了在按劳取酬的原则下拿更多的钱，个人主义者也同样会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其实，这些论调并没有什么新奇。早在1776年，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曾经写过：“各个人都不绝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寻觅最有利的用途。放在他心里的，诚然不是社会的利益，只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检考自身利益的结果，自然会或不如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他们各自追求各自的利益，往往更能有效的促进社会的利益；他们如真想促进社会的利益，还往往不能那样有效。一般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据我所知，并不

曾成就多少善事。”②但斯密是一百八十年前英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的放任政策的实行诚然使工业首先发达的英国资产阶级同大陆各国进行自由竞争中获得广大的海外市场，加速了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廿世纪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大跃进中的中国，却出现这么一些以资产阶级之心度社会主义之量的怪论，恐怕连他们的先师也不禁失笑了。他们凭资产阶级的眼光，把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成果混淆起来；把雇佣观点同按劳取酬混淆起来；把沽名钓誉同人民奖赏的荣誉混淆起来。但是他们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只把荣誉给予白求恩、黄继光、吴运铎，而绝不会给予放火救火的“英雄”，人民只把奖金给予忘我劳动的先进生产者，而绝不会给予磨工偷懒斤斤盘算工时工分的自私自利者。用资产阶级的庸俗眼光估量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和革命英雄气概，如果不是故意歪曲，便是限于阶级成见的低能无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对个人主义者有一条“奇怪的”逻辑：凡是从个人名利出发，一定违背人民的要求，结果不但得不到名利，却终于遭到身败名裂；凡是从共产主义集体利益出发的忘我劳动，一定符合人民的要求，结果却得到他所没有想望过的名誉和利益。共产主义者是动机和效果统一论者，个人主义的动机只能做出符合资本主义原则而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效果。

固守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阵地的另一种论调是要走“中间道路”。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东西。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曾经有过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过“第三条道路”或“中间道路”，他们有过一套反对共产党领导革命，反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其代表人物之一储安平曾说：“今天能动摇国民党政权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这一批自由思想分子，因为大家怕共产党……今天能抗拒共产党的，也不是国民党，而是这批自由思想分子，……只有自由分子出来领导，可以获得一个中庸的稳定，获得广大人民的衷心附和。”③另一个代表人物杨人鞭曾说：“自由主义者可能是改良主义者，只要改良主义能够行之而无阻，假使改良主义能够追求进步，我们便找不出应当抛弃改良主义的理由”④。又如施

①列宁全集第29卷，第251页。

②国富论下卷，第30、33页。

③“观察”二卷二期“中国的政局”。

复亮曾写道：“我們所說的‘中間路綫’簡單說，對內主張‘調和國共’，對外主張‘兼親美蘇’。”^②可以看出，這批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自量力地企圖不推翻國民黨法西斯統治而通過改良主義來實現英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是一種多么可笑的反動幻想。現在主張“中間道路”的人當然提不出任何綱領來了，但他們跟過去主張“第三條道路”的人有共同的思想體系，那就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他們同樣是嚮往資產階級“民主”、“自由”，其不同者就是過去還可以提出一些幻想，就是在革命的新民主主義和反革命的買辦封建制度之外的一條資本主義道路，現在就根本提不出一種在革命的社會主義道路和反革命的資本主義道路之外的幻想來了。在民主革命時期，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分化為左、中、右；左翼是參加或同情工人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右翼是投靠買辦地主級階級反對革命；中間派則企圖實現民族資產階級一階級統治的國家的幻想（歷史已經證明這種企圖是行不通的了）。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發生新的政治分化，分化成跟過去不同的左、中、右。現在左派的道路是社會主義；現在右派的道路是資本主義（同民主革命時期的中間派一樣是走不通的，結果都一定會成為帝國主義者、封建買辦殘余勢力和蔣介石的代理人）；現在的中間派則實際沒有道路，只是處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動搖狀態。有人說：“中間道路不會反黨反社會主義，只是保持中間派狀態而已。”其實這是自欺欺人的遁辭。首先，中間派的動搖狀態在客觀上是不能長久保持的。思想上的共產主義集體主義同資本主義個人主義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必然是其中一種戰勝另一種，不會兩勝，不會兩敗，也不會和棋。其次，“中間道路”不等於中間派。中間派目前還是客觀存在，而“中間道路”則是虛構的，當社會主義的現實生活已經擺在面前，思想革命正在如火如荼開展的時候，却要聲言不走社會主義的道路而走一條社會主義以外的什麼道路，而說它“不會反黨反社會主義”，這難道是說得通的么？然而他們有時候還把這種中間道路稱作“中庸之道”，附會着四書里的注釋，企圖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但不管怎樣解釋，為了抗拒思想改造，妄想從二、三千年前的古人中找理論根據是徒勞的了。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要么是無產階級專政，要么是帝國主義者、封建買辦復辟，兩者之間是永遠找不出一條“不偏不

倚”的道路的。

留戀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人生觀的人還時常埋怨說：“在集體主義底下毫無個人利益和個人自由可言。”當然，只知道追逐一己私利的個人主義者是沒有辦法理解“人為人、我為人”的集體主義崇高原則的。對於資產階級分子來說，社會主義革命也的確剝奪了他們剝削別人的自由，他們之憤懣不平，是自不待言的。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來說，這種抱怨毋寧說是來自人生觀上的抵觸情緒。知識分子的這一特點，早為列寧所指出，他說“作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特別階級的知識界，其特點，一般和整個說來，正是個人主義而不能接受紀律和組織。”^③從目前許多知識分子自我揭露的思想中也可以看到，有些知識分子正是由於害怕共產黨嚴格的組織性紀律性才故意跟黨划出一定距離的（所謂“不即不離”派）。

但在勞動人民方面來說，集體主義並不否定個人利益和個人自由在集體中的地位，但首先必須肯定：集體的利益恰恰是各個個人的最高、最長遠的利益。受壓迫的勞動人民只有依靠集體的力氣才能打倒剝削階級的統治取得革命勝利，從而也就打碎了每個人身上的鎖枷，取得免于凍餓的利益和真正自由的權利。在革命勝利後，勞動人民只有同心協力地建設社會主義，使人民國家日益富強，每個公民的個人利益才能隨之增進。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中，生產力大大提高了，體力勞動與智力勞動間的差別消滅了，城市與鄉村間的差別消滅了，“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則實現了，那時候人類才真正取得了最高的利益和最大的自由。只有不忘過去，珍視現在並且對未來抱有崇高而堅定的理想的人，才能在他的個人利益同集體利益發生矛盾的時候，毫不猶豫地放棄個人利益而服從集體的利益。只有真正懂得了社會發展的規律的人，才能毫無保留地拋棄個人主義，毫無條件地接受集體主義。由此看來，思想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根本上就是改變階級立場的問題；只有抱有做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真誠願望，投身於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同工農勞動人民打成一片，努力進行思想改造，才能逐步建立起革命的、共產主義的人生觀來。

① “觀察”五卷八期“再論自由主義的途徑”。

② “時與文”第一卷第八期“中間路綫與挽危局”。

③ “列寧文選”第一卷，第410頁。

紅与專的辯証关系

东方明

目前，全省高等学校教工、科学技术机关工作人员和中小学教师中間正在进行（或准备进行）紅与專問題的大辯論。这是知識分子的政治立场的自我改造运动。自觉地进行思想革命，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兴无灭资”、实现政治和业务的統一，向“又紅又專”、“紅透專深”跃进，这是广大知識分子的根本利益和切身要求，也是整风运动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之一。因此，积极参加这场辯論，争取在这场斗争中把自己改造得更好，这对于我們所有知識分子特别是帶着浓厚资产阶级思想的旧知識分子，是特別重要的。

紅專辯論中两种方法和 两条道路的斗争

在紅与專問題的爭論中，貫穿着两种方法也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一种方法是把紅与專完全对立起来，只講矛盾，不講統一；或者表面上也承認統一，但是不承認在“政治作統帥”的基础上的統一；或者把业务和政治、紅与專混同起来，不承認矛盾。因此主張“只專不紅”、“先專后紅”、“大專小紅”和“專就是紅”等等，这是形而上学的方法，是要求摆脫无产阶级的政治，摆脫党的领导，幻想繼續走旧的资产阶级知識分子的老路。另一种方法是把紅与專看作是对立物的統一，既講矛盾，又講統一，同时肯定政治对技术业务的統帥作用，因此主張“又紅又專”、“紅專并进”、“紅透專深”，这是辯証法的方法，是政治与技术相結合的、新型的工人阶级知識分子的发展道路。

形而上学和辯証法是两种对立的宇宙观。形而上学不承認矛盾，或者把矛盾絕对化，否認对立物的統一和相互轉化。統一的东西就沒有矛盾，矛盾

的东西就不能統一，这就是形而上学的机械方法論。因此，观察問題的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就是形而上学的特点。主張只專不紅、先專后紅、大專小紅、或專就是紅的人，都是把紅与專机械地割裂开来，把两者看成是絕不相容的两件事，或者把两者看成是完全等同的一件事。因此，他們認為有的人可以只專不紅，有的人則可以只紅不專；認為不必紅也可以專，不必紅透也可以專深；認為紅与專不可兼得；專了就不能紅，紅了就不能專，紅妨碍專；認為可以先專后紅，也就是可以有一个只專不紅的阶段，認為紅易專难，所以要先專后紅，等專好了再紅也不迟；或者認為可以少紅多專，因为一点不紅也不行，实际上紅是假的，是裝飾品，是为了掩盖只專不紅；甚至認為專就是紅，在社会主义社会技术只能为人民服务，專了自然就紅，否認矛盾是为了掩盖矛盾，实际上还是只專不紅。所有这些看法显然都帶有极大的片面性、表面性和主观任意性，这种孤立地机械地看問題的結果，不能不得出各种錯誤的認識和結論。

客观地、全面地看問題，善于透过表面的现象深入事物的本質，揭露事物的內在矛盾，这是辯証法的基本要素（參看列宁“哲学筆記”辯証法16要素）。紅与專、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統一。政治是业务的保証，政治又是統帥、灵魂，一切工作离开了它，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因此，我們既反对空头的政治家，也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紅与專，政治和业务有沒有矛盾？当然有。紅与專、政治与业务是具有不同質的两个对立物，不能混淆代替，这种差別性就是矛盾；紅与專的关系有互相排斥的一面，处理不好业务和政治就会发生互相脫节的现象，这是两者的矛盾扩大的結果；在具体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时，也会产生一些具体矛盾（例如時間安排的困难等）。但是这种矛盾只是紅与專关系的一个方面，紅与專关系还有另一个方面，即統一的方面。紅与專是对立物的統一

体。任何统一体都包含有对立物之间的斗争，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也是一样。政治和业务并不是完全不相干的两回事，更确切地说，它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所谓“纯技术”、“纯业务”、“纯科学”，即不为任何政治服务的超阶级的技术和科学，事实上并不存在。一切科学技术家以及他们所掌握的科学技术都只能被利用来为一定的经济基础、一定的阶级服务。所以，在任何时候，技术业务和政治都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一切科学家（其他技术业务的实际家也一样）都含有两重性：一方面他是某个知识部门的科学家，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社会阶级的科学家。业务和政治是统一的，问题只是在于什么业务和什么政治统一，并且怎样统一。技术业务始终是服务于政治的，而政治始终是技术业务的保证和统帅，一定的业务和一定的政治互相结合，这在任何社会都是一样的。同时，政治和业务是相对的，没有业务的政治，和没有政治的业务，都是不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业务中包含有政治，政治中包含有业务（但两者并不等同）。这种互相依赖、互相渗透的作用，就是红与专的统一的一面。

很明显，上面所说的两种思想方法的对立，实际上是两种立场、两条道路的斗争的反映。站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就不可能客观地、全面地看问题，不可能深入事物的本质，即掌握辩证法，因此也就不能正确地处理红与专、业务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就难免不碰钉子。由此可见，改造思想方法和改造政治立场，坚持唯物辩证法同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是分不开的。

对红专问题的几种错误看法

在红专问题上最普遍的一种错误看法，就是认为可以只专不红，不红也可以专，只专不红也可以为人民服务。是不是可以只专不红？红与专既是对立的统一，没有技术业务的政治，和没有政治的技术业务，都是不存在的。任何技术业务都是人们利用来为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服务的，所以技术业务本身就是服务于一定的政治目的，并且受着一定的政治目的支配的。有人认为爱迪生、牛顿、门德雷叶夫等等有名的科学家，他们都不是红色的都是资产阶级的科学家，但是他们一样可以对人类作出

贡献。资产阶级科学家能不能对人类作出有益的贡献，这要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就整个说来，资产阶级的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曾起过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进步作用（这是主要方面），这个时期资产阶级的一些科学家也就对人类作出了较多的贡献。但是，在帝国主义走向腐朽崩溃的今天，情形就根本不同了。资产阶级的科学技术（包括自然科学）被利用来为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服务，被利用来为挽救帝国主义经济免于毁灭而服务，因此，资产阶级科学目前正在起着促退历史的作用，而资产阶级科学技术本身，也陷于停滞和畸形发展的状态，许多正直的科学技术家不甘心再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就会因而受到迫害，很难发挥他们的才能和智慧，例如最初领导美国制造原子弹工作的物理学家奥本海姆就因反对制造氢弹而受到迫害。看不到历史上的这种变化，仍然幻想作一个资产阶级科学家也能为人类服务，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一定要走，就只有滚到帝国主义的泥坑，跟着帝国主义一道殉葬。

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技术业务必须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治相结合，也就是说，只能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不争取做红色专家，就可能变为“白色专家”。难道不可以有无色的（不偏不依的“中间道路”）的专家吗？这是自欺欺人之谈。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堕落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就是很好的教训。有人说，在今天我国只专不红不行，但是不红还是可以专吧？不红是不是可以专，不红透能不能专深，这也是不能离开今天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来谈的。什么是红？红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就是要求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为人民服务，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求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最先进的科学世界观和思想方法，用来指导自己的实践和自己的工作，使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能够不断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需要。什么是专？专是业务、技术，包括有各行各业，政治其实也是一行，是一大行，掌握业务知识并进而精通它，这就是专的要求。要做到这点，不仅需要从书本上学习，还要从实践（参加到群众的政治斗争和生产斗争）中学习，而且这是更重要的学习。任何科学技术都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和生产实践的经验的总结，所以离开群众，离开群众的实践，科学技术就不能存在和发展，要想掌握科学技术，精通它并进而发展它便不可能。今天我国人民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而

英勇地奋斗，我国的科学技术是用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因此，离开党的领导，离开社会主义，也就谈不到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就谈不到专和精深。有的人以为专就只是鑽书本，专仅仅是获得较多的书本知识，书本知识越多，就越是有学问的专家。其实这是极片面的了解。全面的知识必须是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毛主席早在十六年前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报告中就指出过，如果只有书本的知识，即使背得烂熟，但是却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那是毫无用处的，这种人还是不能算作什么理论家的。人们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就会看得到在我们的国家里，今天在实际工作中凡是多少有些成就的人，没有不是又红又专的，谁能把政治和业务结合得愈好，谁的成就也就愈大。今天没有那个英雄天才能够离开党的领导，离开群众的帮助，离开社会主义事业创造出“奇迹”来。不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彻底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不建立起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也就是说，不红绝不专，不红透绝不专深，更谈不到为人民和为社会主义服务。

由此看来，政治与技术业务任何时候都是历史的具体的统一，不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技术业务的统一，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技术业务的统一。有的人以为他即使有的是资产阶级的业务技术知识，不必经过改造也一样可以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殊途同归”。中山大学有个教授甚至说，他虽是唯心论者，但是他有学问，能教能写，因此照样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种人自以为奇货可居，如果不改造，迟早会被现实生活所抛弃，这是可以肯定的。

其次，有一种看法，认为红妨碍专，红易专难，因而主张先专后红，这也是毫无根据的。有人说，红了不能专，专了就不能红，“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得兼。但是，红与专的关系并不是鱼和熊掌的关系，而是灵魂和躯体的关系，二者不但可以得兼，而且必须统一。认为红妨碍专，是形而上学的看法，只看到矛盾的一面，并且认为矛盾的东西就只有互相排斥，互相抵消的作用。不承认红与专可以互相推动、互相促进，红有利于专，红透更有利于专深。很明显，党的领导，无产阶级的立场，社会主义的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对于所有科学技术工作者都是不可缺少的，它的普遍意义至少是：第一，有了党的领导，我们的工作就不致迷失政治方向，即在为了谁和为了什么的问题上不致犯根本的错误；第二，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具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理想，没有个人主义打算的人，

思想才能大解放，革命干劲才能充分发挥，这样才能更有力地去攀登科学的高峰，攻上科学堡垒；第三，经常取得党组织和群众集体的帮助，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业务工作就可能取得更大的成绩；第四，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将有助于我们提高业务工作水平，在实际工作中作出最大的贡献。有的人只看到参加社会活动、搞运动占去了他一些时间，就认定红妨碍专，运动妨碍业务“进步”，因而和右派发生“共鸣”，感叹“运动之风何时去，学术之风何时来”。但是应该说，在今天真正妨碍许多知识分子的业务进步的，并不是政治太多了，而恰恰是政治太少了；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太多了，而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太少了；并不是无产阶级思想太多了，而恰恰是资产阶级思想太多了。所有高等学校的红专大辩论，这次都揭开了这个谜。有些教师成了右派，有些学生成了废品，不少的人曾经一度跟着右派分子跑，难道不都是因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太少，或者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无产阶级的政治么？因此归根到底，对于这些人并不是什么政治妨碍业务，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个人主义，不问政治等等，害了他们自己。至于在实际生活中有些人社会活动过多，兼职过多，不善于挤时间学习等等，那是属于工作方法上的问题，应在整改中认真改进，不能和这一原则问题混在一起。

认为红易专难，也是片面的。如果不是把红看作只是参加一、二次社会活动，听一、二次政治报告，那么就决不能设想红和红透是轻而易举的事。把红看得轻而易举，而把专则看得难得不得了，这都是形式主义看问题的结果。前面说过，红是思想不断改造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因此，红往往要经过长期斗争的努力。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固然特别要重视改造思想，就是经过锻炼的老干部，也一样要不断改造思想。只要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存在一天，这种思想改造就不能停止。谁停止了改造，谁就有可能落后，以至“褪色”，这是整风运动中获得的重要教训之一。冯雪峰、丁玲等所谓老作家变成了右派分子，就是明显的例子。谁能说这种改造人们主观世界的大事业，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呢？专当然也不容易，但是科学技术也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东西。有的人把科学技术故意说得深奥莫测，这不过是要造成人们对于科学技术的神秘观念，好把资产阶级学者当作了不起的有学问人物来崇拜。其实，有学问和无学问，是相对的，有学问是从无学问变来的，无学问可以变

为有学問，有学問如不再进步也可以变为最无学問，这是事物的辯証法則。现在就有这种人，他們已被新时代抛到后头，但是自己还不觉察到这点，仍然以为自己很有学問，放不下架子，拒絕改造，侈言紅易專难，这是非常危险的。

因此，先專后紅的說法是騙不了人的。先專后紅的實質也就是只專不紅。因为既然說先專后紅，就一定有一个只專不紅的阶段，这个时候不由无产階級思想来占領。资产階級思想就一定要来占領的。中山大学有个学生認為“成龙成蛇”，决定在大学的四年，因此一心求專，不問政治。但是，在大学这几年如果只專不紅，能不能保証不变“白”，不成为“蛇”呢？很难說。有人說，我国有一些老科学家就是先專后紅的，而一些党的老干部則是先紅后專的，可见紅和專并不是不可分先后。誠然，有些老科学家走着先專后紅的道路，但这是历史条件造成的，他們至今还肩負着思想改造的重担，我們今天培养新一代科学家当然沒有必要去走这条回头路。在老科学家当中，更多的人今天还不是已經紅了的，他們要从资产階級知識分子改造成为工人階級知識分子，还是很艰巨的任务。一般地說老干部只紅不專，这是不符合事实的。难道指揮战争、建設根据地、开展群众运动，是只紅不專嗎？老干部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走的又紅又專的道路，不过今天所需要的是社会主义建設的科学技术知識，和过去的有所不同而已。由此可见，紅專并举和先專后紅，这是两种不同的方法。在政治挂帅的条件下，政治和业务可以同时搞好，这是整风运动中务虛与务实并举的經驗所証明了的。那个單位工作人員的政治觉悟愈高，思想水平愈高，业务就做得愈有成績，技术的进步就愈快，这可以說是規律。

再次，在紅專問題上又一种普遍的看法，就是主张大專小紅，多專少紅，也就是所謂粉紅色論，这也是錯誤的。对于紅与專的关系，我們必須从内容和實質上去理解，也就是前面說的，它是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是互相对立而又互相关联的，政治指导业务，业务又服务于政治，离开政治，业务就沒有目的，沒有方向。所以政治和业务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同时也不能平列和等同。按照辯証法，矛盾都有主导的一面。在这里，政治与业务的地位和作用，即大小主次，是很清楚的。应当是政治領導业务，而不是相反；应当是政治做統帅，而不是相反。中山医学院有位教授說，他是搞技术的，因此主张三分政治七分业务，政治上只求不落后，不犯錯誤就行了。也有人說，政治有党委管，我們跟

着走就是了，自己还是多搞点业务吧。中山大学一位教授甚至說，搞政治是危险的，多講多錯，少講少錯，斯大林尚且要犯錯誤，我們还是少談政治为妙。这些看法当然是荒謬的。其实錯誤有各种各样，所謂“不搞政治”的人也一样会犯政治錯誤，（右派分子中就有所謂“不問政治”的科学家），而犯政治錯誤的人，也不是因为搞政治太多（所謂“太紅”），而往往是由于不紅或者紅而不透，资产階級的立场和思想仍能作怪所致。政治并不只是少数政治家的事情，而是和每个人的切身事业有密切关系的。如果說，在从事业务和政治活动的時間安排上面，由于各人的条件不同而应有所区别，这当然是正确的，事实上我們也正是这样做的。但是这和“大專小紅”，“粉紅道路”显然是两回事。所謂大專小紅、淺紅，是什么意思呢？这只能有二个解釋：第一，紅是一种粉飾，是假紅，是表紅里不紅，皮紅心不紅；第二，不紅不白，半紅半白，或者叫做中間道路。我們說紅是无产階級的政治立场、无产階級的思想，因此“表里不一”固然不行，“半心半意”也是不行的，一个人决不可能站在半无产階級、半资产階級的立场，走半社会主义、半資本主义的道路，思想改造只改造一半，或者改造一点。在根本立场上，中間道路归根到底是不存在的。在目前我国两条道路（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階級（资产階級和无产階級）的斗争中，资产階級及其知識分子正在被逐步改造，不改造成为左派，成为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就只能成为资产階級的知識分子，并且有可能墮落为资产階級的右派，这是历史的必然性。中間道路的哲学思想基础是唯心主义和折衷主义，害怕矛盾的揭露，害怕进行严重的斗争，幻想超階級、超政治。当然事物是按照唯物辯証法发展，中間道路是不可能走通的。

最后，还有一种看法，認為專就是紅，專了就会自然會紅，这也是极有害的观点。專就是紅，否認紅与專的区别，实际上就是只要專不要紅。以否認矛盾来取消矛盾，这是形而上学的方法。在形而上学看来，一个东西不能由两个对立面組成。和形而上学相反，列宁指出：“統一物之分解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其矛盾的各部分的認識，是辯証法的實質。”（“哲学筆記”）数有正負，作用有正反，电有阴阳，人有好坏，階級有剝削与被剝削，科学有真偽，科学家一样可以有紅有白（自然科学家也不例外）。紅与專是一回事，又是两回事。說是一回事，因为它们是統一的，說是两回事，为因它們

是对立的。形而上学就是只看到統一的一面，因而把两者完全混为一談，这只是为“只專不紅”找寻借口。华南师范学院有个講師認為，在工厂和农村，紅專不会成为問題，因为計件工資不能用开会来代替，改良农具看来似專而不紅，实则紅在其中矣。他还認為，紅是政治，是生产关系，專是业务，是生产力，归根到底生产力是主要的，改变生产关系是为了提高生产力，脱离專而談紅，就是无的放矢。这位講師甚至进而認為，革命是手段，建設社会主义是目的，抛开目的，变成为革命而革命，这是紅而不專所由产生，也就是紅專問題的根源。人們透过这位講師的混乱概念和錯誤論断中，看到了他的思想本質，无非專就是紅，紅为了專，有了專就有工資，就有改良工具，就有社会主义，就有一切。这里且不去說，把紅与專的关系，比作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比作革命和建設的关系，以为紅就是开会，是如何荒謬。应当指出的是：农具改革也好，增加工业生产也好，都不是單純依靠技术业务所能实现的。离开了党的领导和党的总路綫，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集体智慧，（这些都是政治啊），能够設想今年全国风起云涌的技术大革新和生产大跃进嗎？肯正視真理的人都應該承認这点。是不是每个改良了农具，或者有所創造发明的人，就是又專又紅了呢？如果是这样，那么，知識分子早在好几世紀前（或者說从來）就是又紅又專的了。我們說的紅是无产階級的紅，是共产主义的政治、思想和方法，人們不要弄錯了。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不紅不能專，專不等于紅，这仍然是我們的結論。

在社会主义社会，技术业务只能为人民服务，知識分子自然是紅的，有人把“專深”比作“爐火純青”，“紅透”比作“瓜熟蒂落”，这种說法在理論和事实面前都站不住。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不但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且在相当長的时期内还可能繼續产生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这一点也不奇怪。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階級的政权和生产資料公有制，消灭和正在消灭着剝削現象和剝削階級，因而为知識分子同工农的結合，即走又紅又專的道路，提供了完全的可能性和极为有利的条件。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事情还有另一方面。馬克思指出过，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富足程度的差別依然存在，仅仅把生产資料轉为全社会所有（消灭了占有生产資料的不平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資產階級法权”的不平等，这个法权还繼續統治着，因

为消费品是“按工作”（而不是按需要）来分配的。因此，資產階級的个人主义思想，不仅有長期的历史习惯影响，而且还有它的现实經濟“基础”。在生产資料私有制废除之后，甚至在資產階級被消灭之后的相当長时期内，資產階級个人主义的“阴魂不散”，随时可以附着在那些意志薄弱的人身上，“起死回生”。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長起来的知識分子面前，同样存在着两条发展道路的可能性，誰看不到这点，不經過主观努力，争取做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就完全有可能墮落成为資產階級个人主义的知識分子。“自然紅”論是沒有根据的。

思想方法和立場观点是一致的，只有坚定地站在无产階級的立場，認真克服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才能夠彻底掌握唯物論和辯証法的武器。

辯証唯物主义告訴我們，社会意識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人們的思想是他們的階級地位的反映。紅与專問題上的两种根本看法的分歧，正是社会主义革命中两种階級立場及其思想的斗争的具体表现。把紅与專对立起来，主张只專不紅，只要业务不要政治，正是資產階級立場和思想的反映。資產階級立場和思想中最根本的东西，就是資產階級的个人主义。是資產階級的个人主义，还是无产階級的社会主义，这就是紅專問題爭論的實質。

資產階級个人主义在紅与專問題上，主要地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虛偽的“为科学而科学”的立場；一种是赤裸裸的名利思想。而自私自利，唯利是图，則是它們的共同的本質。所謂“純科学”，“为科学而科学”，在过去是掩盖資產階級剝削的虛偽宣传，今天对于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則是掩盖个人主义丑惡的虛偽借口。有的人認為政治可有可无，政治是空洞道理，沒有什麼學問，业务才是真才实学，不能搞学术的人才去搞政治。对于政治是統帥、是灵魂，科学技术必須由党来領導，更是不服气，認為外行无法办內行事。有的人还极力貶低政治，甚至污蔑說，紅可幸取，專難取巧，不花一定時間獲得一定文化科学技术，談不到專，但一次运动，略为表现，馬上就可以紅起来。这些人自命

清高，自以为有學問，奇貨可居，於是輕視和鄙棄政治，其實骨子裡却浸透着個人主義。他們認為政治是為大家服務的，技術業務則是個人的資本，為個人服務的；有了業務就有名有利，就有個人的一切，“學而優則仕”，把業務技術看作個人成名成家 and 往上爬的工具，因而只要業務，不要政治。另外一種人則公開標榜“業務第一”，毫不掩飾自己是“掛狗頭賣狗肉”，“生財有大道，成名有捷徑”，專“攻冷門，搶熱貨”，那個出版社給我稿費多，我的書就交誰出版”。他們還製造種種“理論”，如說業務第一也好，政治第一也好，同樣為社會主義服務，殊途而同歸，可以求同存異；個人主義是事業的推動力；“個人主義人人都有”，“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不以為耻，反以為榮。有了這種人生觀，必然要求擺脫政治，拒絕思想改造，反對走又紅又專的道路。

但是，在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支配下，即不紅，能不能專好呢？自以為不紅只專的人，其實許多是既不紅也不專的人。他們把知識視為私有財產，有了這種私有制，知識就成為他們手中換取名利的資本，一如資產階級手中的資本。為了名利，教學工作可以不負責任，講課可以不作準備，“萬年講稿”年年適用；科學研究可以不顧國家需要和當前需要，厚古薄今，可以孤立、靜止地進行研究，搞“單干”，互相傾軋，同行成冤家；甚至寫文章搞研究可以粗制濫造，投機取巧，偷竊欺騙，以至剝削別人勞動。由此所謂清高變成了低級趣味，有學問變成無學問，他們被時代遠遠拋在後面還不覺察。顯然，這些人必須從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立場和思想中解放出來，徹底改造自己，否則絕

不可能適應社會主義發展的需要，既不紅又不專，對自己對社會都沒有好處。

恩格斯說過，不管自然科學家們高興採取怎樣的態度，他們總還是在哲學的支配之下，問題只在於他們願意由那種哲學來支配他們。（“自然辯證法”）列寧更指出，任何自然科學，若拿不出強有力的哲學上的論證，就抵擋不住資產階級觀念的攻擊，也阻止不了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復辟，為要支持住這個鬥爭，自然科學家就必須做一個馬克思主義的自覺信徒，做一個辯證唯物主義者。（“論戰鬥唯物主義的意義”）這也就是說，任何科學家都必然有自己的哲學世界觀，而為要戰勝資產階級世界觀，就必須改造自己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者。內行要受外行領導，業務要受政治領導，這是一般的規律。在我國今天的歷史條件下，正如毛主席所說，知識分子應當在自己的工作和學習過程中，逐步地樹立共產主義的世界觀，逐步地學好馬克思列寧主義，逐步地同工人農民打成一片，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改造自己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服務，這是知識分子的唯一出路。（“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立場、世界觀和思想方法是統一的。當然，不是對任何問題的看法的分歧，都應當歸結到立場和世界觀的對立上面去。在紅與專、政治和業務的相互關係問題上，兩種不同看法的爭論，反映了兩種立場、兩種世界觀的鬥爭。在這裡，改造立場、改造思想，是正確看待問題，掌握唯物論辯證法的前提。只有在興無滅資、思想解放的基礎上，才能走上又紅又專、紅透專深的道路。

中山大學學報改進編輯工作

中山大學學報現正依群眾所提的意見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的精神着手改進工作，特別是對學報的社會科學版的編輯方針，進行了初步檢查，認為學報過去所登載的文章，厚古薄今的情況是嚴重的，反映現實政治鬥爭和批判性的文章很少，因此使學報缺乏思想性和鬥爭

性，這種情況與時代要求相差很遠，必需依照目前黨的方針政策，和時代賦與學報的要求，進行改進學報的工作。並決定今後在徵稿和選稿時，應多徵選有關建設總路綫，厚今薄古，紅專等問題的稿件，以便配合政治中心任務的宣傳。（中大科研科）

我扭轉了“只專不紅”的錯誤思想

陳汝懋

自從“紅與專”的問題展開辯論以來，廣大知識分子都接觸到自己靈魂深处的核心部分；這是每一個人的人格中心的所在，也是他最不愿觸犯的地方。現在必須把它觸犯一下，並且必須把它徹底粉碎，這就不能不引起一番劇烈的思想鬥爭；在鬥爭的過程中引起了極度的痛苦與不安，但在鬥爭勝利後，也會引起愉快與舒暢的心情。

我開始對“紅與專”的認識是極端錯誤的。我認為“紅與專”的問題只是知識分子生活細節上的問題，不是大是大非的問題。所謂“讀書人”少不了有些“書卷氣”，他勢必會走重業務的途徑，只要他的確能把業務搞好，對於社會主義事業也未始沒有用處。因此知識分子儘可根據自己的特點來走自己的道路。紅與專可以分工，有些人可從紅的方面發展，有些人可從專的方面發展，這樣才能使知識分子各施其材，各盡其用。

因為我有這種錯誤思想，當黨提出知識分子要向又紅又專、紅透專深的目標躍進時，思想上就有了抵觸，心中竊竊暗想：這可能是小題大做，大概黨還是不大了解知識分子的特點吧！在大辯論的過程中，我逐步認識到“紅與專”的問題不是知識分子生活細節的小問題，而是劃分新舊知識分子政治界綫的大問題。因此這不是小題大做，而是大題大做。又紅又專是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特點，只專不紅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特點，因此黨不是不了解知識分子的特點，而是深入肺腑，掌握了他們最本質的特點。為了社會主義的利益，就必須將只專不紅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改造成又紅又專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俾使其能在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充分發揮積極的作用。同時我的紅專分工的謬論，也遭到了駁斥。同志們指出紅專分工的看法，正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只專不紅的具體表現。這種錯誤看法的背面，包藏着見不得太陽的東西，它實質上就是“不問政治，只顧業務”的加工粉飾。從不問政治來說，是否真正是不問政治呢？實際上不問的只是社會主義政治，而相反地却在問資產階級的政治。至於只顧業務，是否真正是只顧業務呢？實際上顧的不是業務，而是個人的名利。也就是企圖在業務上

撈一把本錢，當作和黨討價還價的資本，以達到沽名釣利的目的。

熱烈的辯論打開了我的腦門，同時也刺痛了我的心。大道理是有些懂了，可是接觸到自己心痛的地方，思想上還有些搞不通。我想：領導上要我做的事，我都做了，各種政治運動，我也都照常參加了，在新舊社會對比之下，我也亲身体會到新社會的好處，怎可說我現在問的是資產階級政治呢？我的確是想搞好自己的業務，搞好自己的教學和科學研究工作，這對社會和個人都有利，我難道正是一個十足的沽名釣利的人嗎？

這些思想不斷地縈繞着我，使我深深感到不安和煩惱，從而也使我展開了一場劇烈的思想鬥爭。

我這樣想：我在口頭上的確也多次表示過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是我真的關心和擁護社會主義的政治嗎？我對於各大政治運動和黨的政策法令很少關心，認為這是黨和領導的事，自己只要照例參加和奉行就夠了，這難道不是自外於黨自外於社會主義道路的表現嗎？相反地如果各大政治運動和政策法令對自己的利益不符的時候，我思想上就有抵觸，甚至引起對黨的懷疑和不滿，這難道是熱誠擁護社會主義的人所應有的態度嗎？自外於黨，自外於社會主義道路，不關心政治運動，不熱誠擁護黨的政策法令，這就是脫離革命的政治的表現。脫離革命的政治，自然會走向反動的政治。在鳴放和反右初期，我對於資產階級右派的向党猖狂進攻，不僅無動於衷，並且對於右派的某些謬論，或多或少地引起共鳴。我甚至怪怨黨的“小氣”，不能對這些謬論大量包涵。我所關切的就是容忍這些蛇神鬼怪在新社會里橫行無忌的放毒肆暴，容忍它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行為。在這場考驗中，難道還不能說明我所問的正是資產階級的政治嗎？

我又這樣想：我在口頭上的確也理論一套的認為搞好業務，不只是從個人的利益出發，也是和社會主義的集體利益有關。但是我真的時常考慮到社會主義的集體利益嗎？我真正建立了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嗎？我為什麼對於業務特別感到興趣呢？實際上就是把業務當作自己的本錢，有了本錢，就

可以充当“專家”，博取在新社會中“吃香”。正因為這種個人主義的動機支配着我的行動，我就把教學當作建立自己威信的手段，把科學研究當作自我能力表現的場所。我把“自我”作中心，把一切工作都圍繞着這個中心，並為這個中心而服務。根據這些事實，難道還不能說明我的沽名釣利的思想在作怪嗎？

經過了這一番思想鬥爭，我就象在鏡子面前，照見了一幅自己丑惡的面目。我的確問的是資產階級的政治，並且在我的毛孔里充滿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毒素。擁護社會主義並不是說幾句空話，而是要現之于思想感情與行動。帶着這樣丑惡的東西去偷渡社會主義關是不可能的，並且自己內心上也是不安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徹底粉碎資產階級的靈魂，代之以社會主義的靈魂，以它來作統帥，走又紅又專的道路。

到了這裡，自己前進的方向已是明確了，可是在具體的做法上，思想上還有些模糊。我總覺得“紅與專”在時間還是有矛盾的。在同一時間內總不能把“紅與專”兩件事並舉，做了這件事必然會妨礙那件事，究竟用什麼方法才能使它們並行不悖呢？

新的思想鬥爭又產生了。“紅與專”在時間上真有矛盾嗎？顯然，這種認為“紅”和“專”時間上有矛盾看法，只是從表面現象觀察的結果，而且誤解了“紅”的意義。抱有這種看法的人，把“紅”理解為多開會，多擔任社會工作，因此就覺得影響了自己鑽業務的時間，其實“紅”就是建立共產主義人生觀的問題，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問題，難道能說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不能再鑽業務了嗎？顯然是不對的，適得其反，只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才能更好地鑽進業務里去，至於一定的會議和社會工作那是我們應該有的，將來一方面可以通過適當的安排來減少某些人過多的會議和職務，另一方面我們每個人也應該善于支配時間，那麼所謂“紅”“專”矛盾的問題，是可以迎刃而解的。進一步看，紅會妨礙專呢還是有助於專呢？我想：如果紅是政治標準，是決定一個人為誰服務的問題，專是業務的標準，是決定一個人服務得好壞的問題，那末紅不但不影響專，並且又是專的保證。為誰服務的問題解決了，鑽研業務的勁頭會更大，積極性會更高。不僅如此，舊知識分子的通病，就是理論脫離實際，他們的業務愈“專”，愈鑽進不切實際的牛角尖去，只有紅了以後，才使他們的業務不與人民隔絕，滲透到生活的血肉中去，變成了廣

大人民的呼聲。更有一層，有了紅的政治標準，才能批判地對待自己過去所接受的文化知識，才能辨別那些是香花，那些是毒草，進而掌握正確的思想武器，保證我們勝利地向科學堡壘進軍，取得科學上更大的成就。

這樣一來，我的眼睛亮了，我認識到“紅與專”的矛盾是表面的，實質上它們是統一的，紅不僅有助於專，並且是專的必要保證。但是這時我又產生了另一種思想，拖住了我的後腿。我覺得解放以來，雖然沒有紅做統帥，但是我的確也想好好的搞業務搞教學。同學反映不頂壞，意見不頂多，難道我在這方面沒有一點成績？這種思想實質上就是對只專不紅的道路還有留戀，痛恨不深。如果這種思想不解決，顯然它就會變成我的前進道路上的絆腳石。

於是思想鬥爭又開始了。我過去不紅的“專”對社會主義事業是否尚有用處呢？我想：我是搞心理學業務的，我在課堂中口口聲聲強調共產主義意識傾向的重要性，但是我便是缺乏這種意識傾向的人。我時常用巴甫洛夫學說來說明共產主義意識傾向乃是一個複雜的動力定型，動力定型不僅是一個聯繫系統，並且具有一定的方向性。我的只專不紅的思想，卻是只肯定聯繫系統的存在，而否認其一定的方向性。既然聯繫系統都有一定的方向性，那末我所否認的只是共產主義的方向，而大腦里實際走的當然是資產階級的方向了。我教的是這一套，而自己的思想感情又是另一套。心理學本來應該提供思想改造的科學規律，但是我的這一套連自己的實際都聯繫不起來，自己的思想都改造不過來，那末我搞的這一套所謂“專”，對社會主義事業還有什麼用處呢？更壞的是我把這理論脫離實際的教條一套，披着馬列主義的外衣，借着大學的講台，來縈惑青年，讓資產階級的毒素，摧殘他們純潔的心靈。這對人民的教育事業更帶來了何等嚴重的危害性。

在這一連串思想鬥爭的過程中，我逐步澄清了自己的頭腦，認識了在只專不紅的思想下所掩藏的丑惡面目，以及它對人民革命事業的嚴重危害性。認識到如果自己不愿做新時代的落伍者，就必須走又紅又專的道路。思想鬥爭給我帶來了痛苦與不安，但當新思想戰勝了舊思想以後，也給我帶來了象在黑暗中重見光明一樣的愉快。

我現在深深地体会到“紅與專”的問題不是知識分子生活細節的小問題，而是劃分新舊知識分子政治界綫的大問題。“紅與專”的大辯論是為個人

服务还是为人民服务的两种人生观的斗争，也是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做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只有这个斗争得到正确的彻底的解决，才能使广大知识分子有了明确的政治方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来迎接大跃进的新时代。

毛主席谆谆的忠告我们：“我们希望我国的知

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我一定要不辜负毛主席的教导，坚决地向又红又专的道路跃进，勇往直前，决不退缩。

編 者 的 話

“理论与实践”创刊至今，已经半年了。从1958年1月到6月是不平常的半个年头。整风运动在反右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基础上，转入了以双反为主的阶段，全民整风的伟大胜利，促使了全国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在这一振奋人心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议一致同意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创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现在，总路线的灯塔，正照耀着全国六亿人民前进的道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口号响彻工厂、农村、学校，以至每个角落，说“一日千里”，尚不足以形容我们祖国各方面工作大跃进的新形势。

“理论与实践”正是在这样伟大的日子里诞生和成长着的。也正因为如此，当我们现在来回顾这半年的工作的时候，就特别感到存在不少缺点，需要在内容和形式上来一个大跃进。

从7月号开始，我们除了继续坚持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和百家争鸣的方针，继续保持刊物的地方特色和战斗性之外，我们还将坚决贯彻厚今薄古的精神，和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以体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了更好地贯彻联系实际的方针，我们希望在实际工作中的各级负责同志和干部，挤出时间，多多给我们写些与实际问题密切结合的稿件。

在内容和形式方面，我们拟作如下的一些改革：第一，把内容粗略地分成下列栏目：（1）论著；（2）讨论；（3）调查研究；（4）短论与随笔；

（5）动态（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科学活动）。

第二，增辟下列栏目：（1）问题解答；（2）从读者中来；（3）书刊（哲学社会科学）评介。

半年来，我们会接到一些读者的来信，向我们提出了哲学社会科学上的一些问题，对于读者提出的问题，我们都尽可能作了解答；今后将选出较为重要并为广大读者普遍关心的问题 and 解答，在刊物上发表。由于我们工作上的群众观点还很不够，对一些来自读者中的文章，因为感到只是一些点滴的资料和点滴的意见，没有加以采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与广大读者之间的联系。因此，我们认为增辟一些相应的栏目是必要的。

我们工作上存在的另一个比较突出的缺点，是经常不能按期出版。这种脱期的现象，已经在读者中引起了正当的不满。当然，产生这种脱期现象的原因，有一些是由于客观上的困难，如稿件来源比较困难，但更重要的还是我们主观努力不够；今后在比较有利的客观条件之下，我们将争取按期出版。

“理论与实践”就出版的时间和内容的水平来说，都还是一个初生的婴儿，她需要各方面的关怀和支持，而实际上我们正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广大读者和作者的支持之下才取得已有的这些成绩的。我们认为有必要在这里重申一次本刊“发刊词”的期望：“我们愿意用我们的努力来贯彻本刊既定的方针和任务，愿意辛勤地为广大读者服务，以期在社会主义科学事业中贡献我们微薄的力量。同时，我们也热切地期待着广大读者和作者给我们以支持、监督和批评”。

論 本 質 屬 性

圓 足

形式邏輯以屬性一名詞來表示事物或概念之間一切相同和相異的東西。例如某甲和某乙同是中國人；一個熱情，一個冷淡。中國人是他們共通的屬性；而熱情與冷淡則是他們各自獨有的屬性，是把他們互相區別開來的一種屬性。有些人因此就以性質來解釋屬性，以為中國人、熱情、冷淡都是一種性質。其實，屬性的範圍比性質為廣大。事物的同點、異點除了從性質顯示出來外，從狀態、行為與及行為的動機、行為的結果等等也可以顯示出來。例如，中國是站起來了；帝國主義者是在衰亡着；人造衛星是在運行着；我現在寫文章；昨晚我讀書；我們的工作前進了一大步；學習為的是工作順利等等，都是以狀態、行為、行為的動機與結果等等來標識着事物或概念的屬性的。

屬性有兩種：本質屬性與非本質屬性。本質屬性是某類事物之所以為某類事物的必不可缺少的屬性；是把這類事物與其他類事物區別開來，並提供認識這類事物的可能性的一種屬性。這裡所說的事物，亦可以改換說為概念。因為事物的本質屬性反映到人的主觀上，就凝結成一個概念。例如，人之所以為人而從類人猿分化出來的必不可缺少的條件，是因為人類能創造工具和使用它來生產生活資料。能創造工具這一點反映到我們的思維裡，就凝結成“人”的概念。我們就說，能創造工具是人的概念的本質屬性。非本質屬性是這樣一種屬性，它為某類事物中一些對象所具有，而非全部對象都具有。它不是這類事物的特征，不提供認識這類事物的可能性；它不是把這類事物與他類事物區別開來的。例如，人的形態有高、矮，能力有強、弱，智慧有聰明、愚笨等等。人可能是高的，也可能是矮的。而具備高的屬性不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必不可缺少的條件，因為具備矮的屬性同樣也可以是人。能力方面、智慧方面的種種屬性，也是如此。所以便將這些屬性稱之為非本質屬性。

上兩段所述，原是一般形式邏輯教科書所述的通常意義。但就在這一點上有兩個問題可以供我們提出來討論。

第一個問題，是斯特羅果維契所著的“邏輯”

中概念的屬性一節所說：“非本質的屬性分為兩種：固有的屬性和非固有的屬性（或偶然的屬性）。固有的屬性是這樣的一些屬性，它們屬於該類的一切對象，並且是由本質屬性派生出來的（？），但不是本質屬性本身（？）。例如，一切人都有兩隻眼睛。這是一切的人都具有的屬性，它便叫作固有的屬性，但不是本質的屬性，不是人底特征，也不能把人和其他動物區分開來，因為其他的動物也有兩隻眼睛。”這是說，有一種為某一類全數對象所具有，而不是本質屬性，却是由本質屬性派生的，因而叫做固有屬性的一種屬性。我們問，這一種分類法是否妥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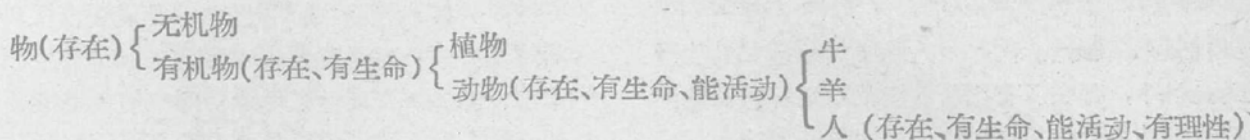
第二個問題，是高爾斯基和塔瓦涅茨兩人合編的“邏輯”第二章概念第三節本質屬性內所說：

“同一對象的同一屬性，在一種情況下可以是本質的，而在另一種情況下，則可以是非本質的。某些屬性，當從某一方面來認識對象時是本質的，而當從對象的另一方面來認識對象時，則完全可以是非本質的，反之亦然”。這樣的意思在斯特羅果維契的“邏輯”中也有同樣的表達。如：“在同樣的一些對象那里，一些屬性在某一方面可能是本質的屬性，而另一些屬性可能在另一方面是本質的屬性。因此，同樣的一些對象可以表現在各種不同的概念中，其中有一些概念反映這些對象底一些屬性，而另一些概念則反映這些對象底另一些屬性。例如，物理學上的水這一概念和化學上的水這一概念是不相同的。”不過斯特羅果維契的說法稍微不同的地方，只是沒有顯明地說到在某一方面是本質屬性，而在另一方面却不是本質屬性這一點而已。

高爾斯基和塔瓦涅茨對這一論點如何解釋呢？他們說：“選擇本質屬性和揚棄非本質屬性都是以一定的觀點為前提的。由於這種觀點依賴於目的，依賴於需要認識的對象的那一個方面，因而便使得某屬性是否是本質的具有了相對的性質。”這樣，本質屬性便是由人們的主觀來決定的了。高爾斯基和塔瓦涅茨隨即解釋說：“這種相對性不是主觀的，因為它……是決定於社會的人的物質的、客觀的實踐。……把對象的那種在當前的具體的聯繫和關係

的情势下，在客观上具有决定性的属性作为本质的属性提到首要的地位上来。”这样，就将本质属性被决定于主观这样的主观的意义，牵引到“就人类物质实践都是主观的”这一主观的意义来作说明了。这种说明是不确切的；其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当我们披阅原书的时候，确乎可以看到。

这两个问题都是在论述概念的本质属性时产生的。问题的解决，仍然有待于对本质属性之正确地、并且是全面地了解。我个人的结论是这样：整个世界既然是在运动、发展着的，则整个世界及这世界



这个例的意义如下：物的概念所指的范围最大；大至整个世界，小至这世界上最微小的东西，凡一切所有，无不以物之名来表示之。这就是物的概念的外延。外延者，就是指这一概念所可适用的范围而言。这外延无所不包，故是最大。但物这一概念的本质属性，即物之所以为物，而有别于“外物”的，只是存在或“有”这一点属性。这本质属性只是一点，故是最小。物之中又可分为无机物和有机物两类。无机物这一概念暂时不谈，只谈有机物这一概念。有机物的概念所指的范围，比物为小；因为物除了有机物一类外，还有无机物这一类。有机物的本质属性，除了存在这一属性外，还有有生命的另外增上的一点属性。于是有机物这一概念的本质属性便较物的概念的本质属性为丰富、为大。至于动物和人这两个概念，亦可如此类推。如动物的概念的外延比生物的概念的外延为小，而内涵反而较大；即于存在、有生命两点之外，还另外增加能活动这一属性。人的概念的外延比动物的概念的外延为小，而内涵反为较大；即于存在、有生命、能活动这三点之外，还另外增加有理性这一属性。——以往都是说人是理性的动物，这样说法在现在已是过时了。根据科学的说法，人是能创造工具的动物。创造工具代替了理性这一属性。——这一个例虽用来说明概念的外延与内涵成反比例，但我们也可借来说明概念愈是下位的，或者说愈是所指的范围小的，则其本质属性不是一点，而是几点。这几点属性是联合起来，共同作为该事物的本质属性。

再借用一个例来说明。一般的逻辑教科书以下定义为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方法。人的概念的定义是：人是能创造生产工具和生产生活的动

内的任何事物的本质属性，也都是在运动、发展着。如果从这一观点来考察本质属性，上述两个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在这一观点所看到的本质属性是怎样的呢？具体一些说，就是一个概念——即一类事物——的本质属性，不是一点一滴，而是本身自成一个体系。这个本质属性的体系是这一类事物在过去时间内发展的结果；现在还是在发展中。下文就将这一论点加以说明。

有些旧一些的逻辑教科书通常举下列一例来说明概念的外延与内涵成反比例的关系。

物。——过去的定义是：人是理性的动物。动物的本质属性，根据上引一例，是存在、有生命、能活动三点，今再加上创造工具和生产生活资料这一点，共为四点，刚好合成人的概念的内涵。人的概念的内涵，便由这一定义把它展露出来。这也可见人的概念的本质属性不是一点，而是几点联合起来的。

以上两段都是形式逻辑本身的东西，但我们却可以为方便起见根据它来作进一步的探讨。世界在未有生命出现以前，存在着只是单纯的物；单纯的物的本质属性只是存在，或有。随着时间的推移，事物发展的结果，于单纯的存在上，出现了生命的东西，这便是有机物。恩格斯说这就是蛋白质。再继续向前发展的结果，于有机物中成了动物、植物。动物除具备有机物的全部属性外，还赋有它本身特殊的属性，就是能活动的属性。动植物各自按照它们本身的分类学发展，动物出现了高等灵长类的猿。这期间是有许多级别的，我们暂时略去不述。在猿类中有一支由于创造工具，从劳动中生产生活资料发展而为人。人的属性是动物的属性，乃至由低等动物以至高等动物各级别的各种属性上，新增了创造工具、生产生活资料这一属性。这样，从辩证、发展的观点看，人的概念本质属性不只是几点属性简单地联合起来，而是一个体系。——一个向前发展中的体系。这个概念的本质属性的体系是后者包含前者；而前者在下一发展阶段中却比原来阶段的提高了一级。例如，物的概念的本质属性只是单纯的存在。而有机物的本质属性是存在与生命。这里的存在属性是与有生命属性结合起来，是有生命的存在，是比单纯的存在高一级了。其余的，可如此类推。这个体系既然是在发展中，因此，事物

的本質屬性的數目也是在增長中。例如：人之所以為人，是由于其能創造工具與生產生活資料。人有了工具，需要進行社會性的生產，於是便有了語言。有了語言之後，人類的思維便出現，人類便有了理性。有語言與理性是人之所以為人而區別於其他動物的兩種本質屬性，但非最本質的屬性，却是由最本質的屬性發展出來的。

從以上的說明，上述的兩個問題可以大致獲得解決了。他們的錯誤就是在於把事物的本質屬性只看成是一點，而不是一個發展中的體系。

斯特羅果維契所主張的固有屬性，在我們看來，就是本質屬性。例如，人除了能創造工具生產生活資料外，存在、有生命、能活動這三種屬性都是創造工具生產生活資料這一屬性的一部分，並且是它的基础。換言之，必須在存在、有生命、能活動的前提下，才可以有創造工具生產生活資料這一屬性。就存在這一點來說，雖然普遍及於一切物；但在有機物這一概念上來說，存在已經發展到高一級，即不是單純的存在而是有生命的存在。在動物這一概念上來說，存在已發展到更高一級，即不只是有生命的存在，而且是能活動的存在。在人這一概念上說，存在再發展到更高一級；它已是能創造工具進行生產的整個過程的存在了。斯特羅果維契說，人有兩隻眼睛，是從人的本質屬性——創造工具派生出來的，這樣說是錯誤的。其實，人之有兩隻眼睛，卻是在發展的動物某階段中的本質屬性。而在發展到人時，兩隻眼睛的屬性，獲得高一級的性質，成為人的概念的本質屬性的體系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其他動物雖然有兩隻眼睛，但與人之有兩隻眼睛總有所不同，不可混為一談。因此，將屬性分為本質的與非本質的；於非本質的又分為固有的和偶然的這種分類法是不妥當的。

其次，高爾斯基、塔瓦涅茨和斯特羅果維契所說的，從某一角度看時某些屬性是本質屬性；從另一角度看時，這些本質屬性成為非本質屬性，而另一些屬性卻成為本質屬性。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說，因為事物是運動着和發展着的，所以事物的本質屬性的體系也是運動着和發展着。創造工具生產生活資料這一屬性凝結為‘人’這一概念；能運用語言這一屬性凝結為‘能言者’這一概念；有理性這一屬性凝結為‘理性動物’這一概念。‘人’與‘能言者’及‘理性動物’三者的範圍都是一樣的，即三者的外延是同一的；但其內涵不一樣，因為它們所反映的本質屬性不是同一的。就這個事實來看，是否可說，當我們說着人時，能言語和有理性是非本質的呢？

又當我們說着能言者和理性動物時，創造工具生產生活資料是非本質的呢？當然是不能。因為這些屬性都是客觀存在着，並且是被創造工具這一點決定着的，成為概念中的本質屬性體系中的最發展的一部分。只是從某一角度看，某些本質屬性是突出的，另一些本質屬性是隱藏了的；而從另一角度看，這些本質屬性就互為變換其突出性和隱藏性而已。並不是本質屬性可以變為非本質屬性，而非本質屬性又可變為本質屬性的。

討論到這裡，還有幾點意見可以發揮一下。

第一，概念只有本質屬性和非本質屬性兩種。在辯證法來看，就是現象與本質這一对範疇所討論的東西；即非本質屬性是現象，而本質屬性就是辯證法術語上的本質。也就是必然性與偶然性這一对範疇所討論的東西；即非本質屬性是偶然性，而本質屬性是必然性。所以，本質屬性的研究一定要進入到辯證邏輯的範圍，才可以達到圓滿的境地。

第二，世界與其中的事物既然是在運動、發展中，則事物或概念的本質屬性也是在運動發展中而成為一個體系，既非是一點一點的，也非幾點聯合起來的，而是由最初一點按照辯證法的規律，發展成為一個體系。每一種屬性，在後一發展階段時，——如物的本質屬性的存在，在後一發展階段有機物時——雖然保存其原來的名稱，卻是較原來的為高一級。反映到我們的思維里，就成為一系列的概念，如上例之物、有機物、動物、人等等。事物之發展，在辯證邏輯里便是概念之推移；即從簡單的概念，向複雜的概念的無限進展的過程。另一方面，本質屬性的體系之發展，是從非本質屬性吸收過來的。即在發展過程中，本質是從現象中吸收一部分過來，必然性是從偶然性吸收一部分過來；從而本質不斷擴大，必然性不斷豐富。達爾文的物種源始一書里不少例子已經證明在某種動物里某種現象只是偶然性的東西，這種動物繼續進化，這些偶然性就轉變為必然性，成為新物種所普遍具有的本質屬性了。但是，非本質屬性、現象、偶然性是非常之多的，那些在發展過程中被吸收到本質屬性、本質、必然性中去呢？回答是：只有位置在發展方向上的非本質屬性、現象、偶然性才會被吸收過來；其餘的便被淘汰去了。

第三，從本質屬性的探討上，我們可以發現形式邏輯與辯證邏輯的差異，即在概念的處理上而見出兩者的差異。一個概念如果從一個體系來把握它的本質屬性，這就須從它最初開始的簡單東西，用

（下轉第48版）

关于陈白沙的哲学思想问题

夏 振

章沛同志在“关于陈白沙的哲学思想问题”一文里，就陈白沙哲学体系中，道底范畴，道的规律性，道心关系，以及所谓涵养后“我道合一”问题等各方面加以论述，反对人们把陈白沙列为唯心主义者，而认为他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哲学”。

我对于章沛同志的论据，有不同的意见，现在提出来讨论。首先，就要搞清楚在陈白沙哲学体系中，具有根本性问题的那个“道”，是否如章沛同志所说的：“具有客观实体意义”，“是宇宙万物的总称”等等。这个大问题解决了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章沛同志首先肯定说：陈白沙“在道和物的关系问题上，是主张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实体的”。他的论据是：

1、陈白沙曾经明确地指出：“道为天地之本”。

2、又说过：“天得之为天，地得之为地，人得之为人”。这不单肯定了“道”是天地人的存在根据，而且，把人与天地认为是同一性质的，归纳到“道”底范畴里。

3、又指出过：“道至大”。认为如果拿天地和道相比，那只是“太仓一粟，沧海一勺”。这样，“道”就同时具有总体的意义，是宇宙万物的总称。

我个人认为，只根据陈白沙这几个论点，便得出他的“道”，就是宇宙万物的总称这个结论，是不能教人满意的。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一样，某些唯心主义者并不一定否认物质、客观世界的存在，可是他们却把某种精神力量置于物质、客观世界之上。在未弄清楚作为“天地之本”的、陈白沙这个“道”的根本性问题之前，这个结论未免来得有点牵强。

陈白沙那个“道”的本质是什么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看看陈白沙的意见。在“论前辈言铢视轩冕尘视金玉”下篇里。他说：“或曰：道可状乎？曰：不可。此理之妙，不容言。道至于可言，则涉乎粗迹矣。何以知之？

曰：以吾知之，吾或有得焉，心得而存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比试言之，则已非吾所存矣……曰：道不可以言状，亦可以物乎？曰：不可。物固于形，道通于物，有目不得见也。何以言之？曰：天得之为天，地得之为地，人得之为人；状之天则遗地，状之地则遗人，物不足状也。”

这一段话，仍然说不出什么道理来，但也泄漏个消息，就是“道通于物”，而且是天、地、人要得到它，才能成为天、地、人。这就是说，有某一种东西或力量，贯通于万物，而又超乎万物之上的，甚至天地万物，没有得到它，就不成为天地万物的。

这一种力量是什么呢？是“物质”还是“精神”呢？对于这个问题，还是请陈白沙来作答复吧。在“仁术论”里，他说：“天道至无心，比其著于两间者，千怪万状，不复有可及，至巧矣，然皆一元之所为；圣道至无意，比其形于功业者，神妙莫测，不复有可加，亦至巧矣，然皆一心之所致。心乎！其此一元之所含乎！”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1、“天道”与“圣道”并举，显然这两者都只是“道”的一部分，在它们之上，还应该有一个总的“道”（一元）。

2、天道无心，但天地万物的变化，都是这个“一元”之所为；圣（人）道无意，但圣贤们的助功伟业，都是一心之所致，而这个“心”，也是包含在“一元”之内，受“一元”所支配的。

但这个“一元”并不是陈白沙在另一处所说的“气”，“天地间一气而已”那个“气”。那个“气”是存在于天地间，而不是超脱于天地之上的，那个“气”只会“诚信相感，其变无穷”，而不会象这个“一元”的有所为。也不可以理解为物类及其运动的规律性，以及社会发展的规律，而是陈白沙的“道”，也就是他在另一处叫它做“理”的这个“道”。

陈白沙在“与林郡博书”里说到：“此理干涉至大，无内外，无终始，无一处不到，无一息不运。会此，则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

矣！得此把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来今，四方上下，都一齐穿紐，一齐收拾，随时随处，无不是这个充塞，色色信他本来……此理包罗上下，貫徹終始，滾作一片，都无分別，无尽藏故也。”

毋需多作解释，很明显，这个“理”（道、一元），在陈白沙心里，是“干涉”一切的“某种精神力量”，而且是无内外，无終始，无一处不到，无一息不运，穿紐一切，充塞一切的“某种精神力量”，而不是“气”或其他。“此心”領会了这个“理”，竟可以“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在这里，陈白沙不仅把“理”提到作为干涉一切，支配一切的力量，而且把“我”也提到最高峰，立天地，出万化，連宇宙也包涵在“我”之内，比起陆象山那个“宇宙便是吾心”来，更要进一步。

章沛同志既然明白：“气，在这里，如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一般意义一样，是作‘物質’来解释的”；那末，当然也会懂得：“理，在这里，如在中国哲学史上一般意义一样，是作‘精神’来解释的。”

懂得了陈白沙这个“道”，就可以回过头来，用“此理”把他的全部哲学体系“穿紐”起来。

“道”，在陈白沙的观念中，思想体系中，是一种先自然界而存在，超乎自然界之上，并且随时随处充塞、干涉着自然界一切的“某种精神力量”。因此：

“道至大。”

“道为天地之本。”

“以道視天地，則天地者，太仓之一粟，滄海之一勺耳。”

“天得之为天，地得之为地，人得之为人；反之，天不得之不为天，地不得之不为地，人不得之不为，宇宙万物不得之，不为宇宙万物。”

正因为“道”是一种“精神力量”。因此：

“道无穷无尽。”

“无内外，无終始。”

“无一处不到，无一处不充塞。”

“无一息不运。”

“无可言状，不可物。”

“通于万物。但有目不得见。”

“状之以天則遺地，状之以地則遺人。”

正因为这个“道”是超乎宇宙之上，而又干涉宇宙間一切的“精神力量。”因此：

“天道至无心”，天地間“千怪万状”，都是“道”之所为。

“大块无心，孰夭孰寿”，也是“道”之所为。

“天地間一气而已，屈信相感，变化无穷……”；但使这个“气”（物質）相感、变化的，却是这个“道”之所为。

“圣道至无意”，但圣贤們的功业，神妙莫测，也就是他們的“用心”合于这个“道”所致。

正因为这个“道”是最高的、唯一的、无所不至的“精神力量”。因此：

天、地、万物在它的面前都是非常渺小的：“道大也，天小也。”

天是物質，地是物質（天地間一气而已），人也是物質，因而彼此都是平等的。“人身与天地三立”，但人有心，天地无心，故人为“造化主”。

天地万物既然同样都是受着“道”的干涉、支配，在“道”的面前，它們地位是平等的，彼此誰也不能支配誰，誰也不需要依靠誰，所以：“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动自靜，自闔自辟，自舒自卷，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賜，牛自为牛，馬自为馬……。”

可是，再追究下去，这个“道”又由誰来支配呢指挥呢？到此，陈白沙正如一切唯心主义者一样，归根結蒂，不能不抬出个“神”来。他在給馬真的信里說：“前日舟中，与一之談及，神理为天地万物主本，長在不灭……，便从此觉悟神理，日著非小益也。”

在这里，應該注意的是，陈白沙总是“神理”合称的，認为“神”与“理”是不可分的。这个不可分离的“神理”，就是“一元”。

对“天地万物主本”的“神”，陈白沙是相信的，并极其崇敬的。“与林时短書”里便提到“明鬼神歟”。又“与林友書”里說：“地理之說……术家專取，必于术，故其說泥；东莱專辟其术，故其說偏；不若程子謂：神灵安，則子孙盛。”在“肇庆府城隍庙記”里，他更明显地称頌“神权”，一再提到“夫聰明正直之謂神”；“民日汹汹，以干鬼神之譴怒，权之用，始不穷矣。”

就在陈白沙門人张詡所写的“白沙先生行状”里，也把这位理学家描写得象“神仙中人”一样，对于他的出生死亡和行事，都附上一些怪誕的神話。这恐怕就是由于陈白沙的教导所致吧。

我們懂得了陈白沙那个“道”（理，一元）之后，就可以把他的“不可言状”的世界观“言状”出来了：陈白沙并不是什么唯物主义者，他的哲学基本上不是唯物主义的哲学。

现在，再談談陈白沙的“認識論”吧。

章沛同志說：“白沙在本体論的范围里，虽然把入归納到‘道’的总体中。但在認識論的范围里，却是把道与人作为相对的两极来看待的。”

是的，陈白沙从沒有把道和人或道和心混为一談。但承認有个客观存在的“道”，并不等于就是唯物主义的認識論，根本問題还是这个“道”的性質，是代表物質世界总体呢，还是代表“某种精神力量”呢？

在未下結論之前，先看看章沛同志对这个問題的論据吧。他說：

“首先，他（陈白沙）認為，道无心。道与心不是一回事，也不是先天地合一的。所以他說：“天道至无心。”又說：“大块无心。”又說：“大块本无心。”那末，这些无心的道、天、地又是什么呢？他指出，这就是“气”，“天地間一气而已。”气，在这里，如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一般意义一样，是作“物質”来解释的。

“天地如果是物質，那末，有“心”的人又如何呢？他認為也不过是物質而已。在“与湛民澤”書中，他用“人与天地同体”这一句話表达了这个唯物思想。

“如果人是物質，那末，心又如何呢？他說：“人具七尺之躯，除了此心此理，便无可貴，渾是一包脓血，裹一大块骨头。”即使在这里表现了輕視肉体的傾向，但他仍然承認了“人具七尺之躯”，承認了身心的客观关系。

“由此可见，他的见解是：心在人中，人在道中。这一关系的规定，是符合于朴素的唯物論的。”

在这里，章沛同志的“代入法”运用得非常巧妙，他根据陈白沙“天道至无心”，“天地間一气而已”等命題，就輕輕的把陈白沙这个“道”說成是“气”，說成是物質及物質运动的規律性。其实，陈白沙早已声明过，“道”是“此理”，不是彼“气”。是超乎自然界之上的“天地万物主本”，而不是“天地間一气而已”的那个“气”（物質）。

章沛同志便根据这种“代入法”，一演再演，便得到“心在人中，人在道中”这个結論，并替陈白沙辯解，說他“符合朴素的唯物論的”。

可惜这个結論得不到陈白沙的同意，他老先生早已声明过：“人……除了此心此理，便无可貴……”。“与林时矩”書說：“人爭一个觉，才觉便我大而物小，物尽而我无尽。”在“論前輩言

視軒冕尘視金玉”上篇中，更大声疾呼的說：“君子之所得如此，則天地之始，吾之始也，而吾之道无所增；天地之終，吾之終也，而吾之道无所損。”他認為“我大而物小”，我与天地同始終，而我之存在，是表现在“此心”、“此理”、“吾之道”的存在，而不是那“一包脓血”的“七尺之躯”的存在。

其实，在陈白沙的观念中，天道确是无心的，大块也是无心的，因为“天道”只是“道”通于天那一部分的道，而不是“天地万物主本”那个“道”。

“大块”嗎？更是象“七尺之躯”那样，渾是一包“气”，何来有“心”？只有“人”，并且只是人中的“君子”，才有“心”。这里的“心”，应作“主观精神”来解释，而不是那个物質的心。明白这个道理，就可以了解“我大而物小，物尽而我无尽”的道理，因为一切物質都“囿于形”，都有生老死灭的过程，而“此心”（主观精神）却是“无可形器”，无限大的，并且是永恒不灭的。

因此，“心在人中，人在道中”这个論据不能成立。“心”是在人之外，而且是无限大，无尽穷的。但章沛同志有一点却是說得对的，就是陈白沙認為：“道与心不是一回事”。是的，“道”与“心”，在陈白沙的观念中，并不等同的。“道”是客观存在的最高无上的“精神力量”；“心”是存在“我”中的无穷无尽的“主观精神”。而这个“心”，还是那个“道”的一部分，被“道”所包涵的，所謂：“心乎，其此一元之所舍乎。”

人能否認識这个“道”呢？陈白沙肯定地答复說：“君子得之”。最低限度也有个陈白沙“以吾知之，吾或有得焉，心得而存之。”

章沛同志引用了陈白沙一句話：“形交乎物，动乎中，喜怒生焉。”便認為陈白沙的認識論，“是很好的反映論的說明。”

跟着，他便發揮下去：“在道、心关系上，明确的反映論的主张是这样說的。‘惟至虛受道。’又說：‘至虛玄受道。’‘至虛’是‘心’的同义語。‘受道’說明了在‘道’的面前，‘心’是接受者，被动者。因此，也就很明确的提出了‘道’第一性，‘心’第二性的命題。”

我們并不否認在陈白沙的全部哲学体系中，也有一些唯物論的东西夹杂在內，象章沛同志所引用的那一段話，就是一个例子，还有其他，容后再談。但討論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体系，是属于唯物主义抑或是唯心主义范畴，要看他的最主要的最基本的东西，而不要拿个别的枝节的事例来代替整体。

章沛同志用“至虛玄受道”，“惟至虛受道”這兩句話，來證明陳白沙的認識論是“反映論”，說他“很明確的提出了‘道’第一性，‘心’第二性的命題。”

但我不能不指出：

1. “至虛”，“至虛玄”並不是“心”的同義語，而是心理（主觀精神）的狀態。

2. “受道”並不是“認識”或“反映”“道”，而是獲得的意思。正如陳白沙“與趙提學僉先”書中所說：“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吻合處也。”“受”就是“得”和“湊泊吻合”的意思。

不曉得章沛同志是對陳白沙的用語理解不透，抑或是有意混淆，以取得那個適合於自己企圖的結論？但即使這樣，仍然不能替陳白沙解脫。因為：

第一，他老先生早已聲明過，要至虛玄時，即心里毫無一點“物”（雜念）時，才能“受道”，如果是“形交乎物，動乎中，喜怒生焉”時，就絕不能“受道”了。

第二，即使得到“道第一性，心第二性”的結論，也剛好說明陳白沙不是唯物論的認識論。試想想：主觀精神與客觀精神力量相湊泊吻合，是什麼樣的認識論呢？正如許多追求“世界精神”、“世界理性”的唯心主義者一樣，“滾作一片，都無分別”。

懂得了陳白沙“受道”的內容，又可以解決了一連串的問題：

為什麼他把“得道”，叫做“此心”和“此理”的“湊泊吻合”。

為什麼“道不可言狀”只有“心得而存之”。

為什麼他要从靜坐來“悟道”，而不是通過社會實踐來認識世界。

為什麼他教弟子們學道，先要“去耳目支離之用，存虛圓不測之神”。

（上接第44版）

歷史的方法，沿着辯證法的道路而達到其現在發展的成果。所以辯證邏輯的概念是最豐富的。判斷只是概念的內容之展開和它的規定的敘述，而推理却是概念推移的方法。形式邏輯的處理概念，只是根據同一律等四條思維基本規律，來著重其彼此間的同異，因此，概念的本質屬性只取其一點，就足以完成任務。所以，形式邏輯的概念是簡單的，因而也是基礎的。判斷是由兩個概念結合組成，而推理則是兩個判斷結合組成。如果我們需要證明一個概念

為什麼他“爭一個覺”之後，便“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坐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銖軒冕而坐金玉耶！”

為什麼他“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把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

道理很簡單，陳白沙要追求那種先自然界而存在，充塞、干涉自然界一切的永恒“精神力量”，當然不能從“格物”、“形交于物”入手，而是要“常令此心在無物處”，“至虛玄”，來使“此心”和“此理”湊泊吻合。當“此心”和“此理”湊泊吻合後，即“道我合一”後，“心”（主觀精神）便從“道”（至高無上的永恒精神力量）那里取得無限大的精神力量，於是“我”便是“道”，“道”便是“我”，“我”便是“天地萬物主本”的“造化之主”了，那末，天地便由我立，萬化便由我出，宇宙也包括在我之內了。

明乎此，又可以解決了另一個問題，為什麼陳白沙在談到“道”的範疇時，說得那樣明確；談到“我道合一”後，又是那樣眉飛色舞，“水到渠成，鸞飛魚躍”；但談到如何可得“道”時，卻又扭扭捏捏，說不可言，不可狀，不可物，不得見，只能“心得而存之”，只能談“狀道之方”“按道之術”。原來其中有這個難言之隱的道理在：只可神交，故難以言傳。

對這個問題，大概可以做結論吧。哲學上兩條基本路綫的區別就是：從物到感覺和思想，這是唯物主義的路綫；從感覺和思想到物，那是唯心主義的路綫。陳白沙一開始便從感覺和思想出發，追求那“天地我立，萬化我出”的“道心合一”，走的正是唯心主義的路綫。因此，我們可以這樣下結論：在認識論的範圍內，陳白沙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唯心主義者。

是同於或異於另一概念，則只採用形式邏輯的處理方法便夠了。如果從歷史的方法全面把握一個概念的全部內容，則非採用辯證邏輯的處理方法不可。這也是形式邏輯是初級的而辯證邏輯是高級的之一種證明。

以上所述，是關於事物或概念的本質屬性的第一步探討。它還可以，而且還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但，這已超過形式邏輯的範圍，而是辯證邏輯之事了。希望這一方面的研究逐漸增加，使辯證邏輯早日充實起來，成為完整的一門科學。

1647年广东人民的抗清斗争

彭伊洛

十七世纪四十年代，清朝贵族侵入关内开始建立其残酷的民族牢狱统治后，曾遇到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的坚强反抗。1647年，广东人民和国内许多地方的人民一样，在陈子壮、陈邦彦、张家玉、王兴、赖其肯等领导下，也掀起过轰轰烈烈的抗清斗争。

毛主席说：“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来解除这种压迫”^①。广东人民的抗清斗争，正是具有这种反侵略、反奴役的性质，因此有加以探索的必要。本文拟就当时形势与广东人民抗清斗争所起的作用以及几个领导人物的评价等方面提出一些粗浅的意见，以备史学界进一步研究上述诸问题时参考。

一、南明抗清的形势

明末，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极其错综复杂。如以矛盾的主次来分，则清军入关以后，民族矛盾即开始上升，到1646年，民族矛盾即上升到最尖锐的阶段。这一年，朱聿键代表南明第二代政权，偏安在福建福州，称隆武二年。鲁王以海监国于浙江绍兴，同以中兴明朝为口号。清朝方面，已占据了山西、山东、河南等地，基本上肃清了大河上下，稳定了北京政权，并已攻占江南，分兵进入湖广、江西、浙江及陕西汉中等地，正在组织力量，向明军发动大攻势。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农民军李自成余部李锦、高一功等感到民族外部的阶级敌人比民族内部的阶级敌人更为凶残可怕，已自愿地接受明朝的收编，进入前线，参加保卫祖国的战争。另一农民军领袖张献忠率领所部在四川虽和明朝地方部队有些小接触，但亦准备“北行入陕”^②，与清军周旋。在这时候，民族抗清的联合战线已初步形成，阶级矛盾在全国范围内已退居次要地位。

1646年夏，清兵渡过钱塘江，鲁王以海遁走入海，浙东淪陷，随着，隆武政权的武力支撑者郑芝龙通敌卖国，撤兵不守重要关隘，让清军顺利进入福

建，不到一个月，清兵即追擒明隆武皇帝朱聿键于福建汀州，结束了南明第二代政权，于是，民族危难愈益深重，广东便于这时挺露在清军进攻的矛头之前。是年十月，清廷命“留重兵守（福建）邵武，遣佟养甲、李成栋自漳（州）泉（州）进征广东”^③。

但是，在这民族危难日益深重的时候，南明统治阶级内部仍不团结。是年十月，明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等拥护明桂王朱由榔称监国于广东肇庆，为民族抗清树立领导旗帜，这在当时是需要的，问题是丁魁楚因私人恩怨，拒绝隆武朝的大学士苏观生参与拥立，苏观生由此心怀不满，便与崇祯朝的旧臣何吾驩及进士梁朝钟等，于十一月初五日在广州拥立隆武皇帝之弟朱聿键为皇帝，改元绍武。

苏观生等拥立绍武皇帝所持的理由是：“兄终弟及”。肇庆方面的人则说桂王由榔是明神宗皇帝朱翊钧的孙子，为皇统嫡系，他们各持一理，互不相让。十一月十八日，桂王由榔称皇帝于肇庆，以明年为永历元年，于是广东出现了两个同时并存的皇帝，终于在十二月初二日爆发内战，继朱聿键和鲁王以海相争之后，又演出一幕鬪墙相斗的丑剧。

绍武政权为了取得内战的胜利，竟忘记了清兵的存在，不在潮州、惠州等地设防，反而把主力部队调到三水一带的内战前线，致广州空虚，成为大汉奸辜朝荐投靠清朝、报复何吾驩私仇的资本^④，勾引清军占领潮州、惠州，偷袭广州。十二月十五日，广州城被清军攻破，绍武皇帝朱聿键和苏观生遇难身死。总计绍武政权建立不到两月就被清军消灭了。

1647年春，由于广州绍武政权的复灭，加以农民军大西王张献忠也在四川和清兵作战英勇牺牲，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2.徐襄：小腆纪年附考第十二。

3.魏源：圣武记开国龙兴记三。

4.何是非：凤倒梧桐记二。

形势的发展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即：明清双方已呈对峙，民族矛盾愈益加深加剧。永历政权成为西南后方唯一的抗清旗帜，但也是清军进攻的重要目标。当时，永历政权以广西为抗清基地，以湖南、广东为前哨，事实上桂林已成为全国战场的重心。

清军要消灭永历政权，必须首先夺取桂林。1647年初，广东清兵向北攻略南雄、韶州；向西进攻高州、廉州、雷州等地；大汉奸李成栋则“自率劲卒”^①，进攻肇庆。北京清廷又调集大军配合这一行动，另派“降将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仲茂、平南王尚可喜统兵取湖南”^②，向西南展开扇形进攻。清军这样的布置是毒辣的，但明朝的永历皇帝，不考虑整饰军旅，扼守要地，以与敌人作战，反而信任崇禎朝的“旧闍老猾，工揣合钳制”^③的王坤，在清军的攻势面前采取逃跑主义，一听到广州失守的消息，便以“两人轿下一小艇”^④逃向梧州，于是百官跟着争先恐后的逃走一空，让李成栋不战而得肇庆。

肇庆失守，永历帝仍没有采取有效的对策应付清兵的攻势，又仓皇地由梧州逃向平乐，再由平乐逃向桂林。清军在后面一气追去，很少遇到抵抗。明朝官吏，大都非逃即降。拥立大臣丁魁楚以四十号大船装载“三年宦橐”^⑤逃向潯州，后来转身降清，被李成栋所杀；驻守梧州的新任广西巡抚曹耀隆降清时还“舆橐肉袒牵羊”^⑥，丑态百出。

清军由梧州攻陷平乐时，永历帝尚在桂林，“方警报之至也，王坤又趣永历往楚”^⑦。驻守桂林的大臣瞿式耜再三疏谏，亦不听从，只命瞿式耜为吏、兵二部尚书督师留守桂林，自己则逃往全州。不久，又逃往湖南的武冈。群臣如总督朱盛澧走灵川、巡抚御史辜廷泰则走融县，“副使杨垂云、知县王惠卿以下皆遁”^⑧。李成栋所部清军很快便到达桂林城下，后来湖南刘承胤的“援兵到桂，又索餉而嘩”^⑨，于是人心惶惶，更呈一片瓦解之势。

总计清兵从福建出发，不到五个月，便攻取广州、南雄、韶州、高州、雷州、琼州、梧州等重要城市，直逼桂林。另路清军在湖南攻占长沙、湘阴，进薄衡州、全州。到1647年4月间，明朝疆土较之隆武政权时又失去了广东、江西、湖南等三省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全国抗清形势急转直下，南明政权又进入了一个最危险的阶段。造成这种危局的，大略可分为下述几种原因：

第一、统治阶级的许多代表人物都只把私利放在第一位而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在民族敌人的

进攻下，他们不特不好好地团结人民共同对清作战，反而从事内争，以致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他们甚至为顾全自己的身家财产，不惜投靠民族敌人，帮助敌人作恶，这是清军得以顺利前进，战胜攻取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明朝的主力部队，早已随着吴三桂、许定国、左梦庚、郑芝龙的降清，为清军掌握利用，永历政权事实上已没有多少武力支撑，而且在表面上支持永历政权的二、三武人如陈邦傅、刘承胤之流，亦各有野心，不愿意为明廷效忠，而忠贞体国的瞿式耜、何腾蛟等，又没有实力，仅凭老成硕望相号召，自然难以与清军抵敌。

第三、永历皇帝为人比较懦弱，根本未曾具有中兴明朝的才能和魄力，他不知依靠什么人，守什么险要，在清军进攻之下，徒事逃跑，丧失了抗清的舵手作用。

第四、当时明朝方面战斗力较强的农民军，虽已进入保卫民族的战场，但却遭受统治阶级的猜忌和不平等待遇，没有发挥他们的战斗作用。

二、广东人民抗清斗争的奋起

清兵进入广东也如进入国内其他地方一样，奸淫掳掠；并以强制手段，命令汉族人民薙发易服。广州陷落时，清兵曾正式宣布掳掠三天，“谓之放赏”^⑩，广州人民被清军杀戮的亦很多。如著名的十三岁的“孝董”庞时倬父子之死^⑪，即是因为不胜勒索所致。“进士黄鹤仙妻卢氏、参将张某妾王桂卿”^⑫等，都是在这次大掳掠中被逼淫自尽。广州人至今盛传的“益阳王妃”殉节的故事^⑬，也是这次清兵的暴行造成的。

①温睿临：南疆逸史纪略四卷，永明王（上）。

②三余氏：南明野史卷下。

③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二十五。

④华复燾：粤中偶记。

⑤华复燾：两广纪略。

⑥佚名：东明见闻录。

⑦邹漪：明季遗闻。

⑧馮甦：劫灰录。

⑨明史卷280瞿式耜传。

⑩邵廷索：西南纪事卷一。

⑪南海县志卷38，列传七、庞时倬。

⑫番禺县志卷51，列传20，列女。

⑬仇池石：羊城古钞卷六。

但是，尽管清兵如何残暴，尽管南明统治阶级如何有土不守，投放卖国，广东人民在清兵到来以后，立即在各个地方，发起了英勇的抗清斗争。最早的义军是在粤东出现，由黄海运、陈斌等领导攻破澄海，刘公显、馬麟等起义攻破揭阳，苏誠据潮阳，林学賢等据惠来，江龙、謝志良等据程乡、大埔、平远，“各拥众数万”①。随着清军的深入，各地义军便如雨后春笋似地崛起起来。

在粤中：余龙等千余人集聚于甘竹灘，“广州陷，建义者多归之，其势益张”②。“敌知县至新安，厚斂于民，民不堪命，新安大豪陈文豹代輸金数千，尚无厌。众怒，遂奉文豹举义，斩之以徇。……鹽徒蛋戶一呼响应”③。后来著名的抗清英雄王兴，也在清兵偷袭广州的后一个月，与杨世熊、李宗圣等起义围攻新会④。在粤西，灵山人上官星拱起兵恢复灵山，又与崇德江西石城王府鎮国將軍朱延燾围攻廉州⑤。在粤北，乳源諸生陈万龄起兵，收清兵于白牛坪、梯子嶺，从而收复了宜章。“翁源人陈懋修率狼獾义旅恢复东安、岑溪等县”⑥。

当时，广东有所謂“响賊”、“社賊”、“海賊”等等，也沒有和当时統治阶级的某些代表人物那样的向敌人投降，相反地，他們是各拥所部，把矛头指向了民族敌人。如所謂馬、石、郑、徐等“四姓盜”，仍“联踪海上”⑦。龍門的“响賊”，亦“頑梗如故”，并且围攻龍門的橫壩⑧。新会的“独崗賊黃蛮長”还糾合新会、新宁、新兴、恩平远近“群盜”凡十余万，围攻清兵占領下的新会县城⑨，在民族保卫战争中表现了自己的力量。

随着人民抗清运动的风起云涌，当时統治阶级中的知識分子和小官吏或开明紳士，亦参加农民队伍或与亲朋組織起来发动抗清斗争。新会乡紳黄奇策、潮州世家子弟賴其肖等⑩，即是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因为他們的行动，符合当时人民的利益，所以他們也得到人民的拥护。他們最初即使人数不多，但后来漸漸扩充，亦成为抗清斗争的劲旅，和农民起义抗清的部队一样，也攻城夺邑，給清军以打击。在这些起义部队中，賴其肖的军队是比较能打仗的。潮州叛將文貴、陈虎、余成隆等帶領清兵来战，都被賴其肖打败，并把那几个叛徒杀了。清总兵許有信再次統兵来战，亦大败去⑪。

清军对人民的抗清武装十分害怕，曾采取“剿撫兼施”的办法去应付。义军中一些不坚定的分子上了当，被清军誘騙解散或被利祿俘虜了，但大多数起义部队，都能識破清军的阴谋詭計，仍然坚定不移地站稳民族立场，和清军作不断的斗争。如王

兴攻新会不克，退保恩平山中，修养甲以書招降，不听；再遣兵去攻，王兴便“伏而敗之，并其將焉”⑫。隨即攻占恩平县城，作为对修养甲招降的一个答复。东莞諸生莫子元、布衣何不凡、叶如日等率族党練兵自守，清东莞知县郑逵遣使說降，莫子元等不特不降，反把說降的清朝使者，投到河里淹死，等清军大队人馬来攻，莫子元等“營使人往瀝滘、沙灣、古勞諸乡乞救”⑬，又把清军打败，就这样使清军穷于应付，而他們也在不断和清军作战中壮大起来，接着便形成广东人民抗清斗争的大高潮。

三、陈子壯、陈邦彦、张家玉和抗清斗争高潮形成的关系。

广东人民抗清斗争高潮的形成，是人民高度爱国心的具体表现，而陈邦彦、张家玉、陈子壯等人的努力，亦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陈子壯（1596—1647年），是南海县沙貝乡人，在天启、崇禎、弘光三朝，历任翰林院編修、礼部侍郎、礼部尚書等职，为人不畏权貴，遇事敢言，是一个較正直的官吏。张家玉（1615—1647年），是东莞县万家租人，进士出身，曾任隆武朝的侍講兼兵部給事中，升广信巡撫，他的思想比較开明，曾积极主张与农民軍联合抗清，史称他“性任俠，好击劍，多草澤豪杰交”⑭，足以証明他和人民是有联系的。陈邦彦（1603—1647年），世居順德县城北郊錦岩山下，是一个教書先生，与陈子壯关系較深，“其游若父子然”⑮。隆武二年，中举，由

①潮州府志，卷33，官績。

②荆駝逸史本所知录中

③屈大均：四朝成仁录卷十，东莞起义大臣传。

④广州府志卷80，前事略一。

⑤吴川陈舜系：乱离聞见录。

⑥屈大均：四朝成仁录卷八，广东州县起义传。

⑦邹漪：南北遺聞。

⑧龍門县志卷17，县事志。

⑨新会县志卷13，事略上。

⑩刘瀟客：行在阳秋卷上。

⑪九龍真逸：粵东遺民卷四“賴其肖”。

⑫屈大均：四朝成仁录卷十二，广东死事三將軍传。

⑬东莞县志卷六十四，人物略十一。

⑭民国十一年刊：东莞张氏如见堂族譜卷29。

⑮吴伟业：鹿樵紀聞“粵东三忠”。

苏观生推荐为兵部职方主事，与张家玉同事。广州淪陷时，张家玉在东莞故乡居丧。陈邦彦变姓名躲入高明山中。陈子壯原受永历帝敕封为太子太师文淵閣大学士兵礼二部尚書总督广东、福建、江西、湖广軍务，这时奉母从广州逃往南海县九江堡。

从他們三人的出身和平日言行看来，陈邦彦是比张家玉、陈子壯更接近于人民的。他在弘光时所上的“中兴政要書”，提出明朝的官吏贪污和人民生活的痛苦，应由皇帝負責^①，这是一种大胆有力的见解。在参加起义前，陈子壯因为母亲朱氏病在广州，曾“薙髮詐降”^②；张家玉虽然坚决拒絕修养甲的劝降，但对起义也有过一时的徘徊犹豫，在准备起义前，常到他的老师林涵家，“短衣扼腕繞書幌行数十百匝，抵夜輒去，竟三日不出一語”^③。而陈邦彦的参加起义，則比較陈子壯和张家玉二人都要坚决一些。在李成栋西破肇庆兵向桂林时，他出自高明山中，“临西江之口，望敌旌旗叹曰：莫救也夫！若乘其未定，得奇兵径袭广州，此孙臆之所以解赵也”^④。随即致書劝张家玉举兵，并独駕扁舟往甘竹灘劝余龙进攻广州，迫得修养甲不能不飞騎去追李成栋撤軍回救广州。广东人民抗清高潮的形成和南明危局的改变，陈邦彦实有很大功績。

不过，陈子壯和张家玉的“功名”比陈邦彦高，一般來說，号召力也比陈邦彦强。沒有陈子壯的老成碩望和张家玉的少年英俊，广东人民抗清的高潮，亦很难那样迅速地形成。他們三人特别是陈子壯和陈邦彦二人，是相輔而相成的。

1647年2月10日，陈邦彦令他的学生馬应房随余龙所部义軍，“入自虎門，遇敌白艚、黑艚百余艘，焚之，歼其兵，进薄广州”^⑤。这次行动虽然以自动撤退完結，但意义是很大的，它为广东人民揭开了抗清高潮的序幕。3月12日，张家玉下定了决心，遣义士陈登云往約叶如日的义兵。叶如日以张家玉威望高，也乐意推为領袖，比即“以战艦迎家玉”^⑥。家玉申明約束，于3月14日，“檣盖麾葆，鼓吹登舟，使主事韓如琰等率众从陆助战，袭东莞城入之，执伪知县郑縉，騰檝远近，所在响应”^⑦，和陈邦彦所部义軍在广州东西两面展开了犄角相应之势。

张家玉曾經在隆武朝經過战陣，晓畅兵法，所以在統領义軍时部署軍事，都有法度，并且屢出奇兵以击败清軍，他在用兵的才略上比陈子壯、陈邦彦强。不过，清兵来自北方，長于騎射，对张家玉义軍的作战，多在陆上，能够發揮其所長，因此，张家玉义軍所承担的作战任务，比陈邦彦、余龙等

部义軍要重得多。

3月15日，大汉奸李觉斯遣婿尹希临引导清兵反攻东莞，于金鰲洲、万家租、望牛墩、到滘等处地方与义軍交战，因义軍在战略上犯了死拼的錯誤，虽在居民紛紛参战四面叢击之下，亦被清兵强大的炮火威力所战敗。这次战役牺牲很大，东莞县城得而复失，守备安宏猷、知县张怡、千总何登仕、参將杨邦达等都在陣上牺牲，张家玉的祖母陈氏、母黎氏、妹石宝都被逼赴水而死，家玉妻彭氏亦因憤罵清兵而被杀，张家玉自己幸由一个壯士背負，才得逃出重围。

但是，张家玉并不因为家破人亡和战事的一时失利，而放弃抗清的斗争。他从东莞逃到新安的西乡，立即为陈文豹所部迎奉，推为領袖，旬日間义旗复振，便攻克新安县城^⑧，斬清軍騎兵三百余，步兵千余。随着又遣总兵陈鎮国、参將馮家祿等收复龍門县城。4月10日，清軍咸元弼及李成栋的养子賈九率水陆兵来攻新安，都被当地居民协助义軍所战敗。5月21日，家玉遣兵进攻东莞，三日不克，因兵士思家，“散归諸乡未集”^⑨，被清軍所乘，收还新安。6月17日，李成栋亲率大量兵队攻破新安，乘胜进攻西乡。义軍使用奇計，曾一度获胜，杀伤清兵千余，后来又因为犯了死拼的战略錯誤，又被战敗，陈文豹、叶如日等数十个骨干將領，同时牺牲。約在6月底，张家玉走到博罗，得姚金、刘龙、李启新、陈谷子等领导的三起义軍共五千人，軍声复振。“进复博罗、連平、長宁，遂攻惠州，克归善，还屯博罗”^⑩。这时，因为陈子壯已在九江发动起义，声势浩大，李成栋亦无可如何，不能不撤兵回救广州了。

从三月間张家玉起兵以后到六月底这一段时间，余龙所部义軍曾攻克順德。陈邦彦的另一学生朱学熙与他外甥白常燦（亦邦彦学生）起兵于清远。四月間，順德被清軍攻破，馬应房死难，余龙战死于黃連江，五月間，陈邦彦便召集余龙的旧

①陈岩野先生文集卷一。

②屈大均：十朝成仁录卷十，南海起义大臣传。

③东莞县志卷六十，人物略七。

④九龙真逸：粵东遺民录附录：陈岩野行狀。

⑤屈大均：四朝成仁录卷十，順德起义臣传。

⑥东莞县志卷64，人物略十一。

⑦九龙真逸：东莞五忠传卷下，张家玉传。

⑧新安县志卷十九，忠义。

⑨屈大均：四朝成仁录卷十，东莞起义大臣传。

⑩九龙真逸：东莞五忠传卷下，张家玉传。

部，屯駐江門。邦彥的另一學生霍師連曾經詐降于清軍，被委為三水清兵的水師統領，到這時候，也殺死清朝知縣，起義響應陳邦彥^①。六月底，陳子壯與他的表弟朱實運起兵九江^②“所部多蛋戶番鬼，勇敢善戰，甲冑器械，無不精利”^③，接着，便把廣東人民抗清鬥爭推向高潮的頂點。

七月初，陳子壯、陳邦彥等聯繫恩平王興、新會黃公輔、陽春莫廷蘭、新興梁位灼、東安何士章、順德胡靖、梁斌等許多義軍，號稱驍騎三十萬，準備大舉進攻廣州。在進攻之前，先約邦彥的學生前已詐降于清軍的楊可觀、楊景暉等為內應，又使花山義軍偽降于清，得守廣州東門。於是邦彥與子壯相約：由子壯部進攻廣州西南，而邦彥部則由海道迂回進攻廣州的西北，訂期於七月七日攻城^④。

這是1647年廣東義軍進攻廣州的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這次進攻，後來雖然以失敗告終，但從當時各方情勢看來是需要的而且有可能勝利的。因為當時李成棟的大部軍隊已用在應付張家玉部的軍事行動上，廣州空虛，有機可乘。如果能攻占廣州，就不僅可以解除張家玉部所受的清軍壓力，而且亦可以拔除清軍在華南的一個最大的據點，對整個南明危局的挽回是會有很大作用的。

可惜，陳子壯急於進軍，竟先期兩天進兵直逼廣州城下。這時城中內應的準備工作沒有完成，佟養甲又加意防范，致楊可觀、楊景暉等事泄身死，花山義軍三千人同時被佟養甲所殺。

李成棟在新安得廣州被圍消息，星夜撤軍回救。陳邦彥偵知李成棟軍歸途必經廣州東南的禺珠，遣人約陳子壯進行夾擊。可是，陳子壯所部義軍因圍攻廣州不克，鬥志下降；子壯以年老不懂軍事；長子上圖又患痢疾，結果，反為李成棟軍所敗，退還九江。陳邦彥以孤軍難持，亦退還三水。

這次圍攻廣州的功敗垂成，陳子壯應負很大責任。

四、抗清起義失敗的原因

義軍第二次進攻廣州雖然失敗，但主力仍然存在。這一年的七月和八月這兩個月間，除張家玉義軍在博羅失利外，陳子壯、陳邦彥義軍和清軍在廣州外圍的幾個縣市接觸，仍然能夠分別獲得一些勝利。八月中旬，陳子壯暗約高明人原任湖廣道監察御史的麥而炫為內應，奪取了高明縣城；又聯合王興等部義軍圍攻新會，於新會的唐阮擊斃清朝的

知縣林鳳祥^⑤。陳邦彥義軍與清軍大戰於三水的胥江口，亦獲得了一次很大的勝利。這時，義軍在廣州外圍已形成一個大包围圈。陳邦彥義軍的活動範圍為清遠、三水、廣寧一帶，主力部隊集中於清遠。陳子壯義軍活動於南海縣的九江、新會縣的江門及高明縣一帶，主力集結於高明、九江。張家玉義軍的活動範圍為博羅、龍門、連平、長寧、歸善、惠州、增城一帶，編成龍、虎、犀、象、豹五營，對博羅、增城兩個縣城展開爭奪戰。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這三個鼎足似的義軍能夠配合得好，採取機動作戰以消耗清軍部隊為主，避免與清軍決戰，並相機利用清軍的內部矛盾，然後大舉進攻，仍然是大有可為的。當時李成棟和佟養甲的矛盾是已經發生了的，不過是沒有白熱化；義軍的機動作戰的地利、人和等條件也都具備，可是陳子壯、陳邦彥等沒有好好利用這些有利條件。

九月初，李成棟接受佟養甲的作戰計劃，帶領清軍主力首先主動出擊陳邦彥所部義軍^⑥，壓迫霍師連退出三水，溯北江而上進攻清遠。霍師連在戰鬥中淹死，清軍遂圍攻清遠縣城。惡戰10日，終於以大量火藥轟毀城牆，突入城內。白常燦戰死，朱學熙自縊；邦彥身受重傷，赴水未死，被清軍擒送廣州，堅決不肯屈服。於9月28日被磔於廣州四碑樓，年僅45歲。邦彥為人作風比較民主，和士卒同甘共苦，不掣長官架子。在行軍中，每天吃一餐飯，辦事到深夜只假寐一會。兵士有病，親奉醫藥調治，“故能得士卒心，一軍獨強”。邦彥死后，義軍喪失了一個最活躍最堅決的領導人物，這是一個不可彌補的大損失。

李成棟戰勝陳邦彥，解除了廣州北面的威脅

①三水县志卷十三，編年。

②九江儒林志卷二，輿地略。

③凌雪：南天痕卷十一。

④屈大均的四朝成仁錄卷十的東莞、順德、南海起義諸臣三傳；和陳岩野先生文集附錄的陳恭尹所述邦彥行狀、薛如享的陳邦彥行狀及黃宗羲：永曆紀年，徐彙：小腆紀年附考等所載時間相同。

⑤新會縣志卷十三作林鳳翔，系于順治九年，誤。

⑥凌雪：南天痕卷11，屈大均：四朝成仁錄卷十的三個傳，陳岩野先生文集附錄，九龍真逸：粵東遺民錄附錄，清遠縣志卷二紀年上，都載李成棟軍先消滅陳邦彥部，次張家玉部，再次為陳子壯的隊伍。這些記載是可靠的。謝國楨：南明史略152頁載先消滅子壯部義軍，次張家玉部，再次為陳邦彥部，誤。

后，接着便轉移清軍主力，以对付张家玉所部义軍。十月初，双方在增城之外接触，互有勝負。十月初十日，清軍一再增援，张家玉仍命令所部拼死坚持；义軍將士亦人人自勵，奋勇作战。但是，因为义軍人数有限，后援不繼，同时，他們不是經過严格訓練的部队，在接战时打錯旗号，誤胜为败^①，被清軍鉄騎所乘，卒致失敗，軍士死伤六千人以上，张家玉身中九箭，行动艰难，只得投野塘而死。死时，他年紀还只有三十三岁。

十月中旬，李成栋以一部清軍支援新兴，活擒麦而炫于高明、新兴的中途^②。同时亲率大量部队攻破九江，进攻高明县城，围攻一个多月，又以火药毀城而入，許多义軍將領都冒陣而死，隨即追获陈子壯于高明的三洲。十一月初六日，押解陈子壯、麦而炫等回广州。佟养甲对子壯勸誘兼施，百般劝降，都被子壯所拒絕。結果，子壯与麦而炫等同日牺牲于广州东較场。子壯死时年五十二岁。至此，广东义軍主力已被清軍消灭，在清軍的残酷的軍事镇压下，广东人民所遭受的灾难极为深重。

现在检查起来，陈子壯、陈邦彥、张家玉等领导的义軍之所以失敗，除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清軍能以雄厚的物資力量和久經訓練的优势部队对付义軍外，最重要的是义軍在战略上犯了錯誤。毛主席說：“战争的勝負主要地决定于双方的軍事、政治、經濟、自然諸条件，这是沒有問題的。然而不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軍事家不能超过物質条件許可的范围内爭取战争的胜利，然而軍事家可以而且必須在物質条件許可的范围内爭取战争的胜利，軍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物質条件上面，然而軍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許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壯的話剧来”^③。事实証明，毛主席的这一論断是无比正确的。当陈子壯、陈邦彥、张家玉他們采取較灵活的战术时，他們往往能够获胜或败而复胜，散而复集，一到困守孤城或不顧客观条件去和清軍死拼时，便一蹶不振。陈子壯、陈邦彥、张家玉等义軍如此，即使后来的王兴、邓耀等义軍亦莫不如此。再加以汉奸們帮助清軍，义軍本身在动员和組織群众等工作不够广泛而深入等等因素，自然，抗清斗争最后是不可避免的要失败的。

五、抗清斗争所起的作用及其影响

陈子壯、陈邦彥、张家玉等领导的抗清斗争虽

然失敗了，但在当时对挽救南明的危局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前面說过，李成栋帶領的清軍曾經攻到桂林城下，后来，桂林之所以沒有被李成栋攻下，固然，守桂林的瞿式耜艰苦奋斗有很大功績，但李成栋的从桂林撤退，则完全是因为广东义軍的兴起，危及老巢。李成栋撤軍回到广东后，又因为陈邦彥、张家玉、陈子壯等部义軍的頑强斗争，牽制了广东的全部清軍，使瞿式耜、何騰蛟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能够儲蓄力量，从五月以后，在湖南和广西各地漸漸收拾危局，轉入局部反攻，收复許多城市。其中如焦璉收复阳朔后，即配合御史魯可藻收复富州及賀县，隨着攻下平乐。陈邦傳收复潯州，又进兵攻入梧州。何騰蛟保卫全州，斬殺无算，得到全胜。到十一月間，明軍即將清軍从广西地境全部赶出^④。黄宗羲說：“陈子壯、张家玉、陈邦彥事虽不成，然牽制李成栋使不得西上，而翠华得以苟安桂林、武岡之間者，三人力也”^⑤。这些话是恰当的。

但是，从前后局势的发展情况看来，陈子壯、陈邦彥、张家玉等义軍所起的作用，还不止如此。更直接的作用是清軍在广东和各部义軍連續几月的作战，战斗力被大大削弱下来。單是对张家玉义軍作战，清軍即消耗不少力量，“三攻西乡而两败，两攻到滘而一败，死者凡万余人”，东莞的到滘，新乡的西乡，曾使清軍“聞之咋舌，指以为鬼門关”，清軍在結束这几次大战后，据說受創很大，“存者亦瘡痍之余”^⑥，可见广东义軍在直接削弱清軍力量这一方面起过很大的作用。

陈子壯、陈邦彥、张家玉牺牲后，广东人民并不因此放下武器，旧仇新恨給他們带来的不是妥协，而是再接再厉的斗争。在这年的十月以后，广州东北边的人民团结在张家珍、陈鎮围、馮家祿、李启新等的领导下，以龍門为据点，发展武装到三万多人，声称为张家玉报仇^⑦。农民領袖譚天池与张家珍等联合，經常分二十股兵力，出入于博罗、龍門一帶^⑧。张家玉的另一部將李万荣仍盤据东

①屈大均：四朝成仁录卷十；东莞起义大臣传。

②高明县志卷十三，列传。

③毛澤东选集卷一，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

④徐鼐：小腆紀年附考卷十四、十五。

⑤黄宗羲：永历紀年。

⑥屈大均：四朝成仁录卷十；东莞起义大臣传。

⑦东莞县志卷六十四，人物略十一。

⑧龍門县志卷十七，县事志。

莞，經常袭击县内各乡鎮的清軍①。陈子壯的弟弟陈子升，也在高明、新会之間豎立抗清旗幟②，声称为兄复仇。另一抗清領袖屈士燾、屈士煌兄弟則以罗浮山为根据地設十三營，游击于博罗、增城一帶③。著名的抗清英雄王兴、賴其肖則分別活动于鎮平、阳春、电白之間，“无日不与敌战”④。此外，高廉地区則有上官拱、朱延鑿等部义軍，粵北則有汉瑶民族联合的抗清部队⑤，各地人民仍然站在抗清的前綫上。

因为清軍在和广东人民起义部队的作战中消耗了不少力量，加以人民起义的此伏彼起，再加以明軍正式部队的反攻，使李成栋不能不感到畏懼。1648年春，金声桓在江西反正归明，使广东清軍和清廷的直捷联系要道受到阻攔，于是，李成栋感到广东清軍突出地承受明軍的三面压迫，（他对清朝平日的怨憤也促使他的民族意識漸漸覺醒），最后只得接受他的爱妾赵氏的尸諫⑥，割辮反正。这一点，在李成栋反正前对修甲所說的話中可以得到証明，他說：“竊且暮亡，粵又寇深如此，嶺外断不可保，彼声言复衣冠三字耳，盍姑許之，以靖难乎⑦，由此可见，广东人民的血并没有白流。

李成栋的反正是有利于整个抗清斗争的。1648年，明清对峙形势又起了一个新的变化，广东全境又归入南明永历政权的控制下。后来，因为李成栋不听从謀士的献計⑧，被高进庫所部清軍的詐降所騙，敗死于信丰。1650年，清軍尚可喜、耿繼茂部南下，广州再度宣告淪陷，广州人民又遭受了一次空前惨酷的屠杀，“白骨如山，行人于二、三里外望之如积雪”⑨。在这次保卫广州的战争中，广州人民不惜牺牲，回族將領羽鳳麟、馬成祖、檄之浮等也表现了他們的英勇⑩。后来，为反抗清朝的殘暴統治，王兴、邓耀、陈奇策、肖国龙、杨彦迪等据地为营，共保存明朝正朔达十余年之久。在明朝永历政权宣告灭亡的1661年，陈子壯的部將周玉、李荣又再度拿起抗清旗幟，和清軍血战了三年。这些义軍，虽然都一一失败了，但不等于抗清运动的終止。在清朝貴族統治期間，广东人民的零星起义，几乎史不絕書。如龍門县，康熙三年有所謂“寨头”連結所謂“峒賊”起义；乾隆十七年茶山貢生王亮臣“作乱”，亦分散割付，伪造印信；嘉庆十七年長宁便出现了导致太平天国的所謂“会匪”起义⑪。又如清遠县，康熙、乾隆年間的起义，約有十起以上。嘉庆十九年，便有“三合会肆行于英德、清遠、阳山、三水、花县、怀集”⑫。此外，孤臣志士，洁身高蹈，誓死不受清朝官职的亦很

多。如屈大均、陈恭尹等等，在文字上經常流露故国之思，沉痛之感，还秘密結社从事复国活动。甚至出了家的函可、函是等和尚，也在行动上沒有向清朝屈服，至今讀到他們的风雨号泣、暗室低吟的翁山詩外、独漉堂詩集、千山詩集、光宣台詩集等等，犹令人无比的激动。

今天，時間过去了300多年，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在党的领导下正共同努力建設自己的祖国，但广东人民抗清斗争的历史意义仍不可磨滅，它显示了中国人民热爱祖国的崇高精神，表现了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奴役的伟大力量，进一步証明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陈子壯、张家玉、陈邦彦等虽出身于当时的統治階級，指导他們行动的，是忠事明朝的旧綱常道德，但他們领导广东人民起义斗争的行动，符合当时的人民利益，他們又在清朝侵略者面前表现了至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因此，仍然值得我們崇敬。清朝初年吳伟业說他“比經莞水、操舟者犹述张翰林母妻自沉事”⑬，伍元徽在清中叶时还說：“我朝定鼎二百年，迄今粵中妇人孺子間說陈探花殉节时事，无不歎歎凭吊”⑭，可见他們为国牺牲的影响是深远的。在我国历史上，他們这些人的名字將和文天祥、史可法等同样永垂不朽。

①东莞县志卷三十一，前事略三。

②九龙真逸：粵东遺民录卷一，陈子升传。

③番禺县志卷四十二，列传十一。

④广东文征卷72，賴其肖及王兴传。

⑤韶州府志卷24，兵事。

⑥鄭露：海雪集笺卷六，赵夫人歌序。徐轟：小腆紀年附考卷十五，謂劾李成栋归明者为张氏，且张氏系陈子壯之妾，为李成栋所納者。

⑦三余氏：南明野史卷下。

⑧錢澄之：所知录卷二。

⑨鈕玉樞：觚賸卷八，粵瓠上。

⑩南海百詠續編卷一。

⑪龍門县志卷17，县事志。

⑫清遠县志卷3，县紀年下。

⑬吳伟业：鹿樵紀聞。

⑭陈文忠公遺集跋文。

1924年的广州沙面罢工

金应熙

沙面罢工发生于1924年7月15日到8月19日。参加的有沙面全体华工约3,000人。这次罢工给帝国主义以相当的打击，轟动了广州和香港，其影响还及于华中和华北。它是中国工人运动从二七大罢工后的低潮重新走向高潮的轉折点，而在斗争方式和特点上成为一年后省港大罢工的先驅。这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一次重要的罢工斗争。

这次罢工是在1924年初革命統一战綫成立后工人运动在广东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展开的。

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改組国民党，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这次大会，革命統一战綫成立了。孙中山根据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运动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国民党在組織性質上改变成为中国工人階級、农民階級、小資产階級和民族資产階級的統一战綫的組織。在大会宣言中，明确指出了“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从而决定了要全力帮助工农运动的开展。另外，大会通过的国民党政綱也规定要“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在这次大会后，国民党在中央和各級党部都成立了工人部。中央工人部長由廖仲愷担任，秘書是共产党员馮菊坡同志。其他各級工人部的秘書和干事也多数是共产党员。这一切都大大有助于工人运动的开展。

在1924年以前，广州市工人組織很复杂，派別繁多，名目紛歧，有广东总工会、互助社、机器工人維持会等等。原因是以往广东工人以手工业工人为多，行会思想比較浓厚，不易团結，同时国民党和无政府主义者又都想爭取工人来贊助自己的政治活动，以致各立門戶，彼此对立。革命統一战綫成立后，廖仲愷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进行統一广州工会組織的工作。1924年五一节，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在西瓜园太平戏院召开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孙中山到会向各工团代表演說，鼓励工人組織大团体，联络外国工人，来对外国資本家宣战，以打破外国的經濟压迫，解除条約上的束縛。會議后全市

17万工人参加了示威游行，提出“世界工友們联合起来，打倒軍閥压迫，打倒帝国主义的掠夺”等口号。几天后各工团代表又选出20个团体为广州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委員。經過这一系列的活動，广州工人开始明确了反帝国主义反封建軍閥的战斗目标。在沙面罢工中，广州工人反对英、法帝国主义的态度是一致坚决的。

1924年6月19日，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統治者梅林总督路經沙面，在維多利亞飯店参加宴会。越南革命志士范鴻泰企图用炸彈杀死梅林，結果失敗，范鴻泰壯烈牺牲。这事件发生后，沙面英、法帝国主义者以此为借口，进行对中国人民的歧視和侮辱。首先是頒布戒严令，夜間不許中国人进入沙面，又向两广交涉署提出抗議，提出“取締”“各国危险人物”的无理要求。接着于6月30日通过“发给通行証条例”（簡称新警律）十二条，无理限制沙面华人出入。根据这个条例，自8月1日起，华工出入沙面都必须帶有通行証，証上要貼有本人照片。每晚9时以后，华工无証不能入境，但其他各国人却都可以自由出入^①。沙面中国工人不能忍受这个对中华民族明显的侮辱，罢工抗議，就引起了延續36日的罢工热潮！

从法理上說，沙面是租界，其主权仍属于我国，英、法当局在沙面所能行使的，仅是地方行政权，而且应限于增进通商利益的范围以內。因此，这次英、法工部局頒布新警律，很明显地是一种越权行为，是对我国人民的侮辱。但是，英、法帝国主义这一举动，还不能單單理解为1924年开始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千百次橫暴行为中的一次，它乃是帝国主义对孙中山政权和广州人民的一次挑衅。英、法帝国主义想借此来打击广州人民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并且搖动孙中山革命政权的威信。1923年底，孙中山扣用关税余款，英法美日意葡等六

^①除“新警律”外，英、法殖民者还訂了沙面道路来往規則，禁止中国工人利用沙面海傍道路。新警律和道路来往規則全文，见1924年7月18日广州“英文粵报”。

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兵舰开到白鵝潭威胁，曾遭到广东人民的激烈反抗。海员工会、新学生社等团体发起了盛大的示威运动，发出广东国民外交后援会对各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暴行抗議的宣言。革命統一战线成立后，广东人民反帝国主义浪潮更加澎湃。反对帝国主义經濟、文化侵略的斗争，此伏彼起。就在范鴻泰謀刺梅林事件的前一日，广州学生还发表了要求收回教育权的宣言，号召各界同胞一致力争，英、法帝国主义从这些事实中看出广东是当时中国反帝斗争的中心，因此他們处心积虑要顛复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权。除了加紧勾結軍閥陈炯明和买办陈廉伯向广州孙中山政权进行內外夾攻以外，他們还急于找寻借口来公开侮辱中国人民，妄图打击广东人民反帝国主义的力量。正是由于这个緣故，明明投擲炸弹的是越南人而不是中国人，英、法工部局还是提出了限制中国人民在自己領土上行动自由的无理警律。这就是沙面罢工发生的背景。

在新警律頒布后，沙面中国工人即在广州工人代表会领导下开始准备罢工。共产党人在沙面华工中做了深入的宣传工作和組織工作。7月15日，每个在沙面工作的中国工人、职员或家庭仆人都收到了传单，内容是劝告他們于下午6时前离去沙面，参加罢工。华工們一致积极响应了这个号召，3千工人罢工下来了。沙面的一切商务因而陷于停頓，各銀行、洋行都不能正常营业。自来水厂和电力厂，仅仅由于帝国主义者調用外国人員临时代替才得勉强維持。沙面中国工人发动罢工的迅速与准确又一次表现了中国工人階級巨大的組織力量。

沙面工人罢工后即于16日在長堤茶居工会召集會議，成立了罢工委员会，下設文牋、財政、招待、糾察、庶务等八股。并決議由海員、茶居、机器等工会担任筹款和招待罢工工人的工作。女工則由女界联合会負責安置，在沙基附近租用几幢房子为罢工工人临时宿舍。一切布置是井井有条的。罢工开始后的次日，英、法租界内的中国巡捕48人（英界36人、法界12人）也参加了罢工，法国工部局曾威胁巡捕們說参加罢工將會丧失工作，但是巡捕們不为所动，坚决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

罢工开始后，英、法帝国主义者慌张失措。他們一方面于16日早宣布戒严，派英、印警察駐守沙面东、西桥閘口，英舰兩艘急駛到广州，海軍陆战队和义勇团武裝巡邏，这样做出向广州革命政权威胁的姿态。另一方面則散布罢工系由政府策动的謠言，并且給广东省政府写信，要求政府設法制止罢工，这样来向革命政权直接施加压力。廖仲愷以广

东省長身分对帝国主义者作了义正辞严的駁复，指出沙面罢工是由“沙面英、法工部局頒布新例所激动而成”的，是合理的举动，不是政府所能制止的；而且沙面是租界，英、法帝国主义者自己不能防止罢工，却誘过于广东省政府，是没有道理的。廖仲愷还指出了，假如英、法帝国主义者要求广东政府帮助他們解决罢工，那么就应首先讓广东政府随时在沙面行使警察权。^①这个复文中还没有表示鮮明的支援沙面罢工的态度，是一个缺点，然而它已經足够使帝国主义者認識，孙中山领导下的广州政府全不是甘当奴才的北洋軍閥政府可比了。

面临沙面商业停頓、罢工随时有扩大可能的威胁，英、法領事和工部局不得不考虑对中国人民讓步，撤銷新警律，但是这絕不等于說他們甘心失敗。老奸巨猾的英、法殖民主义者深知国民党中不乏可供利用的人物，他們就力图在广州政府和罢工工人間插进一个楔子，借以削弱工人运动。从孙中山采取三大政策以来一直反对統一战线和工人运动的国民党右派，对罢工采取了和廖仲愷完全不同的态度。以外交部長伍朝枢、兵工厂厂長馬超俊等为首，这些右派急于向英、法表明和罢工无关，并且愿充任調停人。17日伍朝枢等即和英工部局主席克罗斯会谈，嗣后一直在罢工委员会面前充任英、法的說客，极力阻止工人將罢工范围扩大到广州市內外国人居住地区（如东山、康乐、白鵝洞各处）。通过馬超俊和資本家譚胤庭等的調停，英、法殖民者和罢工工人代表进行了談判，并对工人方面提出的四項基本要求（一、取消新警律，二、每天午夜前中国人得自由出入沙面租界，三、复工后不得对罢工工人歧視报复，四、罢工期內工資照发。）在略加修改后表示接受。这时，沙面罢工似有迅速胜利結束的可能。但是，英、法方面在表示讓步中包藏着阴谋。在21日談判即將达成協議的时候，他們突然声明，巡捕系屬軍人性質，与罢工工人地位不同，不能接受巡捕复职。因此，談判就告破裂。

无须多加說明，英、法提出不能接受巡捕复职的理由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沙面巡捕受雇的程序，是由个人向巡捕头申請，由巡捕头轉向英、法当局报告的，完全没有經過任何宣誓等的手續。其地位不但完全不同于軍人，而且也不同于一般城市內的警察，而只是受雇于租界当局来維持治安的人員。所以他們完全應該和罢工工人一样在罢工結束后复

^①廖仲愷答复法領事函，系1924年7月19日发出，见北洋政府京畿卫戍总司令部档案。（一〇二四）97。

工的。①英、法殖民者的强辞夺理，其目的乃是分裂罢工工人的队伍，破坏罢工委员会在全体罢工工人中的威信，同时又可不再让他们认为不可靠的人物来执行警察职权。

沙面罢工工人们识破了英、法殖民者的诡计。他们团结一致，更坚决打击帝国主义，扩大了罢工。24日，广州各洋行货仓的运输工人参加了罢工队伍，进一步使沙面商务陷于瘫痪。工人们还考虑进一步把罢工扩大到香港，有人提出抵制港币。广州工人代表会通电指斥英、法帝国主义者破坏谈判的阴谋，要求全国人民一致起来斗争。这时罢工已引起全国以至海外侨胞的注意，北京、上海、马来西亚、爪哇各地都有人捐款支援罢工。

罢工的扩大使英、法殖民者处于困境。沙面各国商人要想避免商务的损失（其中如日商每天即损失12万元）都催迫英、法领事迅速结束罢工。英、法殖民者仍然一意孤行，他们还不放弃用各种阴谋来破坏罢工的计划，暗中派人到广州市内酗酒，意图扰乱秩序，以为武装干涉的借口。由于广州政府和罢工工人预为防范，这一着也落空了。洋商急于恢复贸易，从29日起就推派代表到罢工委员会办事处探问条件，罢工工人坚决表示必须全体一律复工，才有谈判余地。太古洋行代表曾向英领事建议各巡捕作为各洋行集资雇用，解决巡捕复职问题，但是英领事也不同意。帝国主义者所以坚持不肯在这个小问题上让步，是因为他们估计局势将会发生对他们有利的变化。英帝国主义唆使反革命商团阴谋推翻孙中山已非一日，从1924年5月商团议定设立联防总部，由买办陈廉伯为部长后，广东各地商团和工人的冲突，日益激烈。8月13日，是商团联防总部成立的日子。陈廉伯勾结帝国主义，准备偷运大批军火入境，作为他密谋反革命叛乱的资本。帝国主义者指望这一着会发生推倒孙中山的作用，所以不愿接受全部罢工工人复工。

这时国民党右派又出来忠心耿耿地为帝国主义者帮忙。他们和帝国主义者有共同的利益，因为他们担心沙面罢工得到完全的胜利，将会提高共产党人在工人中的威信，而使在罢工中动摇妥协的右翼工会头子们丧失地位。为此，他们一直和美、法领事勾勾搭搭，还于8月6日由伍朝枢和英、法领事一起去见孙中山。伍朝枢、马超俊等和英、法领事商定了欺骗工人的办法，形式上让巡捕们一起复职，然后由各巡捕自己辞去职务，英、法工部局发给他们五个月的工薪。这些失去工作的巡捕则由广州市政府改编为特别警备队，不管玩甚么花样，这个办

法实质上是將巡捕和其他罢工工人分别处理，使帝国主义者分裂、挑拨工人团结的阴谋得以实现。

到8月中旬，孙中山革命政府和反革命商团的斗争已经更尖锐化。8月11日，陈廉伯在丹麦轮船哈佛号私运大批军火被搜获，反革命叛乱阴谋败露。他就像威胁广州中、小商人罢市，来要挟孙中山将枪械发还。伍朝枢、马超俊等乘此机会，一方面包围孙中山，劝告他迅速与英、法妥协，解决沙面罢工，另一方面又拿商团事件来威吓工人让步。8月12日下午，伍朝枢出席全体沙面工人大会，假借孙中山名义高压工人，要工人接受他先与英、法领事商订的七条条款。正如向导周报所指出的，“马超俊、伍朝枢等右派分子成了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手中的绝妙工具。”②

在右派压力下，工人们同意于13日复工。但是这时商团事件已经非常紧张，满城是次日即将罢市的谣言。英、法领事乘机翻脸，连巡捕形式上复工也不接受。法界巡捕12人到法工部局报到时，法国殖民者就诱骗他们在事先预备好的辞职书署名，巡捕等因都不识法文，以为是领取工薪的证明，都签了名字，法国人就叫他们离开租界，一文钱工资也没有发给他们。

当罢工工人们知道这一情况时，无不对英、法殖民者的无耻行为表示激愤，一致决定继续坚持罢工，并且准备号召对英、法帝国主义实行经济绝交，将罢工范围扩大到香港去。

到此，罢工已近一个月。如继续延长，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很大。英、法领事乃于16日访问孙中山，把勒令巡捕解职的事说为误会，愿意遵守原来的协定，主张让步妥协的国民党右派也继续活动。马超俊通过和巡捕头的私人关系，半迫半劝地要巡捕们接受自动辞职的办法。结果罢工遂于19日结束。英、法工部局撤销新警律，仍用过去的通行证办法，并声明对中国人和外国人一律施行。罢工工人一律复工，但巡捕问题则以“由工部局斟酌处
(下转60面)

①当时英、法殖民者曾把沙面巡捕罢工和1919年美国波士顿警察罢工相比，认为波士顿警察罢工结束后，哥立芝总统也没有让警察复职。姑不论哥立芝也是代表了大资本家的利益来对付罢工警察，即就事实而论，租界华捕的法律地位，也和波士顿美国警察完全不同。所以英、法殖民者这一比方实在拙于不伦。

②向导85期：巨缘：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压迫下的孙中山政府。

李始美的道路

高天放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形势下，不断涌现出许多打破常规的新鲜事情，我们的社会生活真是丰富多采！据新华社6月4日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机械化研究所3日正式聘请了二十一位在北京参加全国农具展览会的“土专家”为特约研究员，这批“土专家”是农具改革运动中涌现的发明创造者，但却都是文化水平不高或者不識字的农民或农村手工业工人。群众发明家进科学院，当上了研究员，这是很高的荣誉，是党和人民对这些“土专家”们的辛勤劳动的高度评价。在我们广东，也有一位名扬全国的“土专家。”新会县的李始美同志只有初中的文化水平，但他成了著名的灭白蚁专家。他在科学上所走的道路是这样的：他因受了白蚁行的敲詐，忿而下决心研究白蚁的防治问题，在三年半时间内，他奔走了数省，除了向书本和别人请教外，还認真地在灭蚁的实际工作中观察了白蚁的生活习性，掌握了它的规律，从而找到了彻底根治的办法，解决了中外科学家所未解决的问题，做到了前人所未做到的事。在他掌握了这门技术之后，白蚁行采取了拉攏引誘的办法，出高薪找他去白蚁行工作，或要和他合伙开白蚁行，甚至还打算替他办出国手續到南洋去开白蚁行。这些引誘，虽然也曾使他引起相当的思想斗争，但他毕竟拒绝了，他决心把这套极其宝贵的技术献给祖国壮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协助下，他努力开办防治白蚁的講習班，公开传授技术，并发动群众，在两个月内，把新会县城的白蚁基本消灭。这一切，使他从新会县城到象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与尊敬。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全国科联和北京科联还特別为他组织了联合报告会，請他向首都一千多名科学工作者作报告。中国昆虫学会理事会要邀请他参加中国昆虫学会，科学界对他的研究成绩給予很高的评价，認為他的研究已超过了国际水平。由于他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获得了人民給予他的高度荣誉。光荣归于社会主义的劳动者！

这些不平凡的打破常规的事情，很发人深思。

我們不禁要問：为什么这些文化水平不高、来自民間的直接生产者会取得这样大的成绩？要从他們那里获得更多的教益，我們科学工作者必須認真而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李始美的道路教导了我們些什么？

李始美的研究工作，并不象許多“洋博士”那样終日坐在科学院和大学的專門研究室里，讀外文書，从世界权威著作中找資料，手拿試管和搞白蚁分类忙个不休，不愿到存在着严重白蚁灾害的地方去搞实际的灭蚁工作，而是一面讀書，向別人請教，搞試驗，从不被什么昆虫学权威著作吓倒而不敢前进，更重要的一面，是他的研究从不脱离实际的灭蚁工作，他甚至因此而奔走了好几省。他不断地在实际的工作中丰富知識，改进工作方法，終于解决了彻底消灭白蚁的问题。因此，他也就是个真金不怕火燒的科学家。他在实际工作中得来的知識要比老是鑽書本的“洋博士”多而可靠，例如他就提出了生物学家們还未发现的新问题：白蚁有两种蚁王。由此可见，科学研究走出象牙之宫，不迷信和不畏懼权威，密切联系生产实际，是何等重要！深入生产实际，会使科学工作者发现許多真正宝贵的資料与实际存在的问题，因此，这才是进行科学研究的真正广阔天地，是使科学研究获得成就的最有效的办法。必須走出象牙之宫，是我們的必然結論。否則就会脱离实际生活，变成書呆子和教条主义者。

对于我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來說：李始美的道路，是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对象，基本上就是阶级斗争，一般都有着强烈的阶级性。如果立场不端正，方向方法錯誤，其結果就必然不可能是正确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其中特别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工作者，必須投入实际社会生活中去，厚今薄古，研究实际生活提出的问题，总结群众运动的实际經驗教訓，才能作出对当前社会主义建设起总结和指导作用的研究成果。如果有人现在还幻想躲在自己的書房里，不管现实社会生活的丰富內容，埋头于書本子上的所謂“研

究”，就一定会脱离实际，变成教条主义者。这是事情的一个重要方面。

李始美的道路，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这就是不要把科学的理论神秘化，不要故作玄虚；相反，要打破学习理论很玄妙、困难的迷信，努力做好宣传和普及工作。李始美同志并没有把自己所掌握的技术据为私有，更没有故作玄虚，把自己所掌握的技术吹嘘得很高深神秘；相反，他却大公无私地主动公开传授技术，并且不断地向全国作示范性的表演，以传播自己的经验，使自己的技术能在全国遍地开花，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跃发展。这样看来，李始美的研究工作，本质上是以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为出发点的，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而服务的。他根本就没有以自己如何成名成家为出发点，并没有以此研究成果来追求一己私利。正因此，李始美的道路是一条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一条社会主义的科学家工作者应走的康庄大道。尽管他不求名求利，而崇高的、比庸俗的资产阶级名利高尚得不可比拟的社会主义荣誉，却降临到了他的头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其中搞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尤须走出研究室，到广大劳动群众中去，破除广大劳

动人民认为理论高深玄妙、高不可攀的迷信，提倡和帮助工人农民学哲学，边学边用，解决实际問題，促进生产关系的改善，并从而促进生产的跃进。据人民日报6月5日消息，上海求新造船厂的职工打破了学习理论的神秘观点，组织了十一个哲学小组，虽然哲学小组的成员大部分只有初中的文化程度，其中三分之二是工人和工人出身的干部，有些人甚至在解放初期还是文盲或半文盲，但他们认真钻研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在体会文件精神的基础上，联系思想、生产、工作中的实际問題，进行讨论。这样学习哲学的兴趣很大，解决了许多思想問題和实际問題。这条消息，雄辩地证明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并不神秘，工人农民也一样可以攻克这个科学堡垒。我们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走出书斋，深入到工农劳动群众中去，做好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宣传普及工作。就象李始美训练灭蚊讲习班一样，发动劳动人民大闹文化革命，使工农大众普遍地迅速掌握马列主义革命理论，指导工作和改进工作，提高思想，以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更大的步伐飞跃前进，而我们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可以在这些工作中得到提高和进一步的改造。

（上接58面）

理”一句话，模糊解决。事实上巡捕都已分别辞职，8月19日下午，马超俊演出“丑表功”，亲自带领罢工工人回沙面复工。

沙面罢工虽然最后由于右派的破坏而结束了，但是，这次斗争还是取得了相当的胜利，工人们通过这次斗争有重要的收获。

第一，罢工达到了它的基本目的——迫使帝国主义者撤销新警律。这就不能不大大鼓舞广东人民进行反帝斗争的信心和决心。而广东工人所表现的雄厚力量，也推动了孙中山决心平定反革命的商团，从而初步稳定了广东的革命政权。

第二，工人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在罢工中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工社，社员发展到200人，这个组织在沙面罢工中巩固发展了，到第二年省港大罢工时，在很多工作中起了核心和骨干作用，以

后成为省港青工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三，罢工工人在斗争中取得了许多经验。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认识了国民党右派出卖工运的真面目。经过这一次，工贼马超俊的伎俩逐渐为工人所识穿。这年10月发生兵工厂工人驱逐马超俊的斗争，到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中，就通过驱逐工贼决议案明白宣布他的罪恶，号召全国工人一致起来铲除工贼。在沙面罢工时，我们党是贯彻了争取国民党左派和中间派，反对右派的方针的。另外一条经验，是认识了经济封锁是打击帝国主义者的有力手段，有时还可促成敌人内部的分歧。这些斗争经验，在以后省港大罢工中对工人阶级有益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就是根据沙面罢工及其他工人反帝斗争的经验，决定了罢工的策略，决定支持国民政府肃清内奸的方针的。

“自尊”？还是“自卑”呢？

一 戈

我們常常听說一些旧知識分子妄自尊大。而一些旧知識分子則不肯承認这一点，他們說：“这是自尊，人都有自尊心嘛？！有自尊心不是坏事”。对，有自尊心并不是坏事。但是，他們拿什么来自尊呢？不是别的，而是那一点点知識。他們認為自己讀書万卷，下笔千言，上通三代，周知万国，的确是頂刮刮，了不起。有了这一点知識，就应该高人一等，誰也不能触动他，否則就会伤及他的自尊心。而他們也就凭借这些知識，向党向国家要优厚的待遇；在他們自己人的中間也凭借这一点去爭名夺利；有时，也凭借这一点去互相吹噓。在坐而論道的时候，他們的确具有一种目空一切的自尊气概，凜然有威可畏。

問題是这些气概，只是他們表现的一面。另一面呢，揭穿了，会使人看到大吃一惊。原来他們所有的知識，只是从書本上来的。書本上没有的，他不敢說，也不敢行。而書本上的东西，为他們所崇奉的，也只是古代封建社会所遗留下来的，或者是从外国資產階級那里販运来的。他們把那些奉为至宝，尊若神明。如果要問那些东西和当前的现实生活有多大关系，有多大用处，恐怕他們自己也答不出来。当现实生活出现了新事物时，他們也許会搬出大部大部的外文書或綫裝書出来，指指点点的检查新事物的出现有无根据。要是他認為沒有根据的，他便晓晓爭辯，拿死人的話来阻撓活人的行动。要是人家不听他的，他也許会惱羞成怒在背后指手划脚地說：“瞧瞧看吧！”

仔細研究起来，書本上的話，根本不是他們自己的話。他們不过是古人或外国資產階級学术的传声筒。他們之中最有學問的，自称是某一學派的大師，其实，也不过是某一學派的大徒弟，說句不好听的話：不过是一个思想上的奴隶而已。这种人从这一面去看他，似乎有自尊心，其实，另一面，是自卑到了极点。

一方面自尊，一方面自卑，这就是这些旧知識分子的矛盾。

一方面有这种自尊心，所以，他們对新事物表示怀疑，态度十分頑固。另一方面，他們对古代的特别是外国資產階級的东西則极度迷信，由迷信而恐惧，在英国、美国面前，他們的自卑感也特別浓厚。于是，在“抗美援朝”的巨浪中，他們之中就有人曾經害了恐美病，說什么“惹火烧身呀”，“以血肉之躯和美国的新式武器拼，一定要失败呀”，等等。

对党对国家，要求有“自尊”，尊到踏在人民的头上。对古代特别英美資產階級的学术就感到自卑，卑到讓人家牵着鼻子走。自然，这样的旧知識分子，对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是有害无利的。因为他违背了现代中国人为人的态度。对古代特别是外国的东西越自卑，就越迷信越恐惧。越迷信、越恐惧也就越自卑。对自己国家的新的事物越怀疑，就越頑固，越自尊；从而又越怀疑，越頑固。試問，这样的人，怎会去革新創造，怎么能“多、快、好、省”地完成建設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跃进再跃进呢？他們自尊或自卑，怀疑或迷信……各方面表现不同，而对社会主义建設的危害則一。

为什么某些旧知識分子会有这些矛盾呢，无他，这是以往的中国历史和他的階級出身造成的。

大家知道：鴉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历史，是一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这中間，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多少罪恶，中国人民經受过多少苦难和耻辱。那时，做为一个中国人的确不很妙，于是，有一些人产生一种民族自卑感，觉得我們万事不如人，由自卑而产生迷信和恐惧。某些旧知識分子感染了被压迫者的悲哀，忘記了自己民族的血泪，更看不到中华民族爭取独立自由而英勇斗争的事迹，一味迷信外国資產階級的学术，恐惧帝国主义国家。或者以古代中国會有过强盛的阶段，因而怀古情深。这样发展下去，就嗜痂成性，連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錯处了。

到了解放之后，有些人因为階級感情的决定，不愿意接受新的东西；有些人則因为对新学术、新

事物知道得不多，又不愿意学习，索性鑽在古代的特别是外国资产阶级的学术里，两眼不看天下事，象条蛀虫一般。

但是，今天的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有眼睛的应该睁开眼睛看看：中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现在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伟大的飞跃发展的时代。历史留给我们的国家虽然一穷二白，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这看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不是吗？目前在农村，在工厂，在林区，在渔场，生产大跃进正蓬蓬勃勃，万马奔腾。时代在跃进，不跃进的人，只有被时代所淘汰，一点也不会留情。

旧知识分子能不能跃进呢？能。因为他们身上一般并不象地主、资产阶级那样背着生产资料的负担。但要跃进，就得在党的领导下，把自己做为一个

普通人，走入群众的队伍，和群众齐一步伐。当“一、二、三”，大家开步走时，就不能因为要自尊，不听时代号角的命令。在这种时候，最好是自尊心不要那么强，少一些怀疑，多一些相信。在六亿人民风驰电掣的跃进中，大河要让道，高山要低头，迷信和恐惧将会抖得一干二净。做一个今天的中国人是值得无比自豪的。

事情摆得很明白：在党的领导下和六亿人民一同跃进，把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了，国家在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赶上或超过英国了，那时，才能得到真正的“尊”。如果仅仅拿外国或古代的东西来吓唬人，向人民要“尊”，人民是不会卖帐的，即使自己真正实行“自尊”，那也不过是妄自尊大了。

对于这样一个很明白的道理还认不清楚的人，事实上就是不“自尊”。这些人还是好好想一想，有错就改，错在那里就从那里改吧！

陶鑄同志到华南师范学院讲课

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鑄同志在百忙中于6月6日下午到该院向全体师生讲授社会主义教育课第一讲。题目是：我国怎样取得彻底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这一讲中，陶鑄同志就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联盟是胜利的保证、和平改造资产阶级是正确的策略、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解决了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消灭资产阶级问题、以及不断革命论等五个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陶鑄同志在讲课中结合分析

了当前的国内外形势，给全院师生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陶鑄同志准备在本年内共到该院讲课五次，作为社会主义教育的“试验田”。本学期结束前将再到该院讲课一次。

陶鑄同志于讲完课后，还应生物系四年级同学要求，和同学们举行座谈，对该系同学毕业后努力方向给予指示和鼓励，同学们情绪至为振奋。

稿 約

(一) 本刊欢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投稿。

(二) 本刊欢迎下列稿件：

1. 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观点和社会科学原理闡述我国当前政治上、思想上、学术上的重要問題；

2. 批判資产階級的哲学思想、社会科学理論等方面的研究論文；

3. 通俗闡明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基本問題的著作；

4. 华南地区的科学研究資料和学术性調查材料；

5. 国内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評介。

(三) 本刊文字以語体文为主，稿長一般不超过一万字。来稿請用稿紙謄写清楚，并示詳細地址。不拟采用的稿件，負責退还。

(四) 来稿发表后，即奉稿酬。

(五) 来稿請寄：广州市德宣西路广东科学館內理論与实践編輯部。

新建设

学术性月刊

《新建设》是在北京出版的综合性学术月刊，于1949年创刊，迄今已有十年的历史。它的内容包括哲学、史学、政治经济学、法学、文艺理论和一般性的自然科学理论，而以社会科学为主。

它的基本任务是：团结全国学术研究人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面对我国当前重大实际问题，从理论上进行必要的阐述和探讨；并大力开展学术问题的自由争论和学术思想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它是我国学术界“百家争鸣”的园地。

读者对象是：全国高等院校教师和学生、中等学校教师、科学研究人员、机关干部等。

每月三日出版 每册定价0.35元

预定三个月1.05元 半年2.10元 全年4.20元

新建设杂志编辑委员会编辑

光明日报社出版 北京邮局总发行

理论与实践

月刊

1958年第6期(总第6期)
编辑者：理论与实践编委会
广州德宣西路广东科学馆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大南路43号

1958年6月15日出版
印刷者：广东人民印刷厂
发行者：广东省广州市邮局
预订处：全国各地邮电局、所